# 毛泽东

# 延安时期文化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陕西人民出版社

A84
62

88347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L68/17

#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

谢荫明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

谢荫明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0印张　6插页　228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129－3/G・4418

定　价：12.00元

#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 总 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驭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

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 年 7 月 1 日

# 目　　录


**导　论** ……（1）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涵义 ……（1）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 ……（4）

三　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方法 ……（7）

**第一章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文化活动** ……（11）

一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11）

二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19）

三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30）

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39）

**第二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要素** ……（54）

一　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状况的认识 ……（54）

二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60）

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65）

四　吸收利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 ……（79）

五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 ……（87）

六　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91）

**第三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 ……（99）

一　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99）

二　面向群众的社会教育 ……（113）

三　适应抗战需要的普通教育 ……（118）

四　军队的训练与教育…… (121)
**第四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实践活动**…… (125)
一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125)
二　毛泽东的文艺实践…… (138)
三　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 (158)
**第五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发展科技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180)
一　毛泽东的科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180)
二　科学精神指引延安科技事业勃兴…… (193)
三　延安时期的科学普及事业…… (204)
四　科学方法在延安的应用…… (219)
**第六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229)
一　开展军事体育运动…… (229)
二　组织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234)
三　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237)
四　推广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 (245)
五　精益求精，救死扶伤 …… (249)
**第七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254)
一　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基本思想…… (255)
二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 (263)
三　党内宣传…… (273)
四　对友党友军的宣传…… (277)
五　对外宣传…… (287)

六　对敌宣传……（297）
七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301）
后　记……（307）

# 导　论

自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辗转万里、长途征战到达陕北始，中共中央在陕北的 13 年，被后人称作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延安时期。由于有了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指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和成熟，胜利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潺潺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成为一切进步人士向往的革命圣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收获还在于：从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30 年代前期产生、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被正式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指导着革命实践的胜利开展。作为科学的体系，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党建、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对于全面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涵，认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具有积极的重大的意义。

## 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涵义

文化，指的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即人类在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又是文明的代名词。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往往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即与物质财富相对应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物质为基础，每一社会都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新社会制度的产生而改变。文化的进步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任何封建的愚昧的教会势力，都不可能阻止人类对天体、自然和自身的认识，任何囚笼、烈火和屠刀，都遏制不住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又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并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新文化不可能脱离旧文化而产生。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它反过来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文化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特征。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文化思想，已随着实践的丰富和检验，形成体系，臻于成熟。它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经验的正确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随着党的活动范围的扩大，涉及到许多方面和领域，譬如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体育、卫生、宣传鼓动等等。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白区工作的恢复与开辟，动员组织群众的需要，国际国内人员交往的增加，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开展等等，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适宜的土壤。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对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需求。在此条件下，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应运而

生。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观点；关于文化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观点；关于文艺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观点；关于教育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的观点；关于注重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观点；关于发扬艺术学术民主的观点；关于批判地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观点；关于普及科学知识，发展科技事业的观点；关于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观点；关于救死扶伤，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的观点；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观点；关于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观点；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观点等等。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容可谓博大精深。说其博大，是因为这一思想涉及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且源于全党的智慧，论述十分丰富。说其精深，是因为这一思想是在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它的许多原则和立论，穷固有之结语，辟崭新之天地。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体现在毛泽东的许多著述、讲话、书信、题词当中，主要的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导人也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形成和丰富作出了重大贡献。

## 二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在特定的国度里、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因此除了同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外，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又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特征，把握这些特征，是学习、领会与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关键所在。

###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研究，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得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正确结论，他们多次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②]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文化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列宁在谈到文化工作和写作事业时认为，这“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针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的具体情况，在文化理论，文化建设，文化工作方针等方面，都

---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②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③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中文第2版，第93页。

提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见解，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的起源和本质；文化的倾向性和阶级性及其社会作用；文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文化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文化状况的详细了解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形成的物质前提，正是有了这两方面的准备，毛泽东文化思想才能够在延安时期形成。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工作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文化发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反过来，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思想文化成果，产生过许许多多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些民族的文化成果，是一笔优秀的丰富的遗产，毛泽东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他对传统文化不是实行简单的否定、抛弃，而是在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形式，或批判，或发扬，或改造，或借用。对具有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的，爱国主义的，艰苦奋斗，为民请命的，杀身取义的事例和人物，大加褒扬，赋予新意。在他的演讲和著述中，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形式，民族的风格融汇其中，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中国的土地之上，集中国优秀文化之大成，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巨斧神工。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在激烈的阶级和民族战争中形成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为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所不容，它的每一点形成和发展，都受到巨大的压迫，面临被取缔和扼杀的厄运。正因为如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不是悠闲文人的产物，它在激烈的斗争的风浪中壮大，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教育，都明确地表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民族的解放服务的。凡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戏剧、歌曲、诗歌、小说，都是描写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都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的产物，就连体育、卫生和科学技术事业，也都服从于民族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为其服务，这是其他的文化思想和理论无法比拟的。

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特别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决定了各类文化事业发展的规模和形式，决定了文化工作的普及性和群众性等等。还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旧思想、旧文化的新生的事物，它在与旧思想、旧文化抗争的过程中，展示了它的勃勃生机。当然，恶劣的战争环境，处于非统治地位的状况，也会带来某些文化政策中偏激和不全面的现象。

**（四）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文化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工作的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是指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科学真理。正如毛泽东思想其他部分的形成原因一样，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产生的，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除了前面所列毛泽东关于文化工作的著作外，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我的修养要则》、《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

话》，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都从不同的方面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使这一思想不仅包括了军队的文化工作经验，也有地方的经验；不仅有党内的文化工作方针，也有针对党外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工作方针；不仅有根据地文化工作开展的方向，也涉及到敌占区应从事的工作。因而，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就是全国解放以后，这一思想也仍在发挥着效用。

## 三　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方法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全面地、准确的、科学地去理解它。研究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在时间、空间、对象上都受到了一些限制，但这种范围的限制又是现代研究难以避免的。为要保证研究的缜密，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方法上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 （一）研究要与当时中国的具体的历史背景相联系

一定的文化思想是与一定的社会存在相联系的。延安时期，正是世界各国人民从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民族解放的事业在全球迅速开展的时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 20 多年的摸索和奋斗，已渡过了它的幼年时期。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开始走向成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中，陕北等地的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越战越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爱国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政治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形势的变化要求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要提出鲜明的纲领，形成系统的理论。帝国主义及

其代理人的污蔑和进攻，也要求我们要有一套科学的文化理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应运而生。因此，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是当时最科学最先进的文化思想。研究这一思想，应注意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斗争的需要。

**（二）研究要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其他思想理论相联系**

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一个革命家，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些理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往往同一篇著作里，要涉及到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在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时，要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掌握它的酝酿、形成和发展过程，它在毛泽东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中还应对相关的毛泽东的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军事、伦理、外交等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容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对文化思想的意义及效能进一步加深理解，也才能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有所预测。

意识形态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和影响的，为要加深对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理解，应当对当时的其他思想理论予以关注，分析毛泽东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与文化思想的关系，多方位、多角度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三）研究要与毛泽东的文化实践相联系**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不是坐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它产生于党和人民的斗争实践。毛泽东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他总结出来的文化思想是为了要反过来指导实践。所以，在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对毛泽东文化实践活动的了解。否则从理论到理论，必然形成空洞的说教。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并不是终极的目标。研究的关键或重点在于：认识文化实践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识这一思想又是怎样指导延安和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工作的，怎样指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事业的，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于全党的工作实践，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注意对文化工作实践的考察，不应仅仅局限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活动，而要着眼于全党文化工作的进程。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四）要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它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今天读起来依然能够感到这一思想的巨大的指导和震撼力量。

同时，也能够理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被“围剿”的文化成为整个社会倡导的主体的文化，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理论也在向前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提出过“推陈出新”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他的一些论著和题词中，多次提出要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1956 年 4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的方针，以后又不断地对此进行说明和发挥。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随着形势的变化，为毛泽东文化思想增添了许多极其重要的新内容。在

“双百”方针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①，应当允许作家在艺术创作上有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只要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文艺工作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和聪明才智去大胆地进行创作。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文化思想方面，党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对封建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想；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作为主旋律的思想；文艺工作者要继续接近人民群众，从中吸取创作营养的思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等等。从渊源上说，这些新的思想内容都来自延安时期或更早时期党的文化思想。从内容上说，这些新的思想比较过去都有了很大的丰富与发展。

在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时，既要看到真理的绝对性，又要看到真理的相对性；既要肯定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科学性，具有普遍的意义，又要认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延安时期的某些文化思想、措施和结论，在今天已经不适应了，应加以改动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工作有一个宽阔的领域，一个光明的前途，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入。

---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9页。

# 第一章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文化活动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清末民初中国文化界的混乱动荡之中，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脱颖而出，接受了新思想，传播了新文化，并以成功的革命活动使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思想文化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全面成熟和发展的时期。对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文化思想进行探讨，有必要首先对其文化思想之渊源加以研究，并对毛泽东到延安前的文化活动进行考查。

## 一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少年毛泽东的文化学习，是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的，是属于封建主义的文化教育。1901 年，毛泽东 8 岁时，开始在其家乡韶山读私塾，直至 1906 年秋。在私塾中，毛泽东从《三字经》开始，读了《周易》、《春秋》、《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也读了《公羊春秋》、《左传》等书籍。1909 年秋至 1910 年夏，毛泽东又读私塾近一年，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书。毛泽东在 1964 年曾经说过：“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 6 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

写过文章。”[①] 孔子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总代表，被历代封建帝王尊为“圣人”，尊为“至圣先师”。封建时代的文人墨客无不对他顶礼膜拜。毛泽东自称“读过孔夫子的书”，“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从“很相信”一语看出，少年毛泽东曾经深受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

少年毛泽东又曾经信佛。1936 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 9 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②]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一位心地善良而又慈爱的母亲。少年毛泽东在这样的母亲身边，思想和行为受到母亲的影响是必不可免的。

此时的毛泽东，与中国当时的芸芸众生在受家庭与社会环境影响方面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毛泽东毕竟又有他的独特之处。他在以超人的智力从容应付私塾先生灌输的“孔孟之道”、“正统”学问的同时，抽出大量时间读了《精忠岳传》、《水浒传》、《隋唐》、《三国》、《西游记》等“坏书”。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允许学生看。毛泽东看这些书时，在私塾要避开先生，在家里更要避开严厉的父亲。毛泽东从 13 岁到 15 岁，由于父亲需要帮手，不得不辍学在家，从事农业劳动。这段时间，他除帮助父亲记账和在田间劳作外，仍挤出时间读书。本地乡间能借到的

---

① 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② 《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2—113 页。

书几乎读尽了，他就设法到远处借书。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的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① 毛泽东自称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小说"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启发他离别家乡，逐步走上了建功立业为民奋斗之路。毛泽东的睿智，促使他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些描写帝王将相活动，描写独霸一方，扯旗造反者事迹的小说，那些栩栩如生而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影响了毛泽东的人生价值取向。毛泽东在实现其人生价值的过程中，登上了社会的大舞台，承担了中国革命赋予他的历史重任，成为一代改天换地的杰出人物的代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读古小说，听旧故事，不过消遣而已。即使从中受到些启发，也未必见诸行动。有启发、有行动者，又未必能够持之以恒。毛泽东却不然。他在受到启迪之后，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少年毛泽东，不仅千方百计读了许多古典小说，还读了《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日知录》等书。1893 年出版的广东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书。这本书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成为弱国的原因，指责当时中国的顽固派泥古不化，批评洋务派着眼于学习西方技术，不注重本国的政治改革，主张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变革以御外侮，抵制侵略，挽回权利。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对

---

① 《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1—112 页。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深表不满，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读了一些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并“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如何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社会变革，思想文化先行。要求变革的思想文化，必然在需要进行变革的社会条件下应运而生。在毛泽东少年时代，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经在为变革中国社会而运筹奔走。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指出：“中华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孙中山决心“集志士以兴中，携豪贤而共济。”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力量日益发展壮大。毛泽东当时虽在少年，但已萌生救国救民的思想。他开始如饥似渴地求索救国的真理。正当毛泽东为此而在乡间搜罗可供其阅读的书籍的时候，他的同乡李漱清从外地回到韶山。李漱清毕业于法政学校，是一位新派教员。他主张废庙宇，办学校，开发民智，是一位具有离经叛道思想的文化人。毛泽东很钦佩这个新派人物，经常去他家里借书、求教或听他讲述时事。李漱清也很器重毛泽东，热情支持毛泽东读书，并劝说其父多让儿子读些书。后来。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成为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共产党组织时的第一批党员之一，随毛泽东上了井岗山，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安排关照过李耿侯的胞弟李介侯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对李漱清，不仅有同乡之情，且有尊师敬贤之情。在李漱清新派思想的启发下，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在乡间借书及问学求教远不能满足其求知欲

---

① 《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 页。

望。他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心外出求学。1910 年秋，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留赠父亲，其中两句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毛泽东投考的东山小学是当时的新式小学。毛泽东在这里学到了历史、地理、文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特别喜欢阅读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开始崇拜康梁。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倡导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和民主进取精神，引起毛泽东极大兴趣。在这所学校，毛泽东向同学肖三借阅了《世界英杰传》一书，在这本书中，毛泽东读到了美国的华盛顿、林肯，法国的拿破仑，俄国的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还书时，他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①

1911 年春至 1918 年夏，毛泽东又渡过了近 7 年的读书生活和半年的军队生活。

1911 年春至同年 10 月，毛泽东就读于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在这里，他成为由著名同盟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的热心读者。通过阅读《民立报》和其他革命宣传品，毛泽东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拥护者。在辛亥革命高潮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从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转变为主张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新政府。

1912 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在这里读书半年。这半年的读书生活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毛泽东在这所学校里写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博得好评。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年毛泽东留有手稿的最早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

---

① 肖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湖南大学出版社，第 22 页。

的故事，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公元前 359 年，为秦孝公所重用的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为取信于民，商鞅在国都南门立一木杆，宣称谁能将木杆扛到北门，赏于十金。众人大惑不解，不予置信，皆旁观而无人一试。商鞅又宣称，谁能徙木，赏予五十金。后终有一大汉，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木杆扛到了北门，当场获五十金。消息传开，老百姓知道商鞅执法如山，说一不二，变法遂得以实行。这件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宋代名相王安石曾写诗赞道："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毛泽东读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后，却从中看出了国民的悲哀。毛泽东写道："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商鞅之法……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俱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从上述引文中的"吾国国民之愚"、"民智之不开"、"民智黑暗"等用语可见，年仅 19 岁的毛泽东，在考查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时，已将目光投向国民的思想文化方面。

1912 年 7 月，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自修生活。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都是在这里读到的。毛泽东这一时期读的书籍，大多数属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文化相对立。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点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赫胥黎的《天演论》却阐明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规律。资产阶级演变的

进化的观点，是对封建的“不变”观点的否定，是一种进步。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启示，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此时的毛泽东，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否定了他以往学习多年的封建主义文化的糟粕，康有为、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的影响也消失殆尽。乐于接受进步的文化，勇于否定落后的旧文化，是青年毛泽东文化选择的一个突出特点。

1913 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一年后第四师范合并于公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这里读书至 1918 年夏。毛泽东考入第四师范时，杨昌济也到此任教。杨昌济留学日本和英国共 10 年，对中西文化均有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见解。他在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和修身课，毛泽东受到他很深的影响。杨昌济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倡言本源。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对大本大源津津乐道。毛泽东在 20 岁以后的六七年间对于本源的探求，是他的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所谓本源，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心目中的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明确地把老庄的“道”和“太极”视为本源。杨昌济则认为，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贯通其间的大原则（本源）而生。毛泽东对于本源，也有一段淋漓尽致的表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大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

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这段酣畅淋漓、议论风生的文字，代表了青年毛泽东对于本源的基本观点。“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在毛泽东看来，本源，是绝对真理，是客观实在，是统驭世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毛泽东所谓“总有几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的宇宙之真理，是客观实在的绝对真理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相对的真理，是本源的文化表现。毛泽东又说过：“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①“倡学”，是在求以文化的发展而达到人的思想与本源之贯通。毛泽东早年的社会文化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此。

接受本源之说，对于青年毛泽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认识事物而注重本源，力求追本溯源，必然头脑清醒，拿得定，见得透，站得高，看得远。青年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写文章，发议论常使老师、同学折服，与他看问题探求本源，高瞻远瞩，因而理解事物深邃透彻不无关系。

其次，本源的探求引导毛泽东寻求真理。本源是客观实在，反映本源的理论却千差万别。其中有的是真理，相对地反映了本源；有的却是谬误，与本源相距遥遥。本源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终端，就其整体而言，不可望也不可及。但是，反映本源的任何层次上的思想文化成果，却是可以把握的。层次不同，真理性则存在差异。一切理论都存在认识层次的问题，存在真理性的问题。毛泽东废寝忘食地读书看报，问教求学，时时以本源的眼光审视他所接触

---

① 毛泽东本源观点均见 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熙的信。

到的理论，以本源的观点批判他所涉猎到的前人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本源之说成为引导青年毛泽东寻求真理的动力，直至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本源之说引起了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一贯重视。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社会文化状况制约着人们对本源的认识，制约着主观反映客观的真理性。要开发民智，使人人心中的宇宙之真理增多几分，必须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青年毛泽东认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思想、道德状况与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文化上的导引，会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人民的文化素质不提高，真理得不到广泛传播，大纛一张，既不能天下心动，更不能万夫走集，号令天下起而救国只能成为空想。

毛泽东从 1901 年开始至 1918 年离开长沙赴北京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中渡过的。17 年间，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这段生活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学生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以及他的人生价值观，他的才智、抱负和能力，已经预示，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将要出现一颗巨星。

## 二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1918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首次到北京，在京停留半年余，并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1919 年 12 月 18 日，毛泽东再次到北京，在京停留近 4 个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

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① 在新思想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文化活动是积极而卓有成效的。

### （一）主办《湘江评论》

五四时期，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造就了一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在《新青年》众多的热心读者中，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五四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新高潮。毛泽东成为这一高潮中的活跃分子。为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与科学，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毛泽东倾注很大精力亲自主编了《湘江评论》周刊。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周刊是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的，毛泽东以学联文牍干事的身份担任主编，首期稿件几乎全部出自毛泽东手笔。周刊主要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创刊号“本报启示”中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署名的“创刊宣言”更明确地指出：“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惧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

---

① 《斯诺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6页。

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在《湘江评论》周刊上，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还撰写了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和杂感共计30余篇。这些文章热情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表现了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赞美与信任。文章深入浅出，切中要害，文笔辛辣，生动有力。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热烈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驱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捷、如德，亦随之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① 当时的反动政府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一概称为“过激主义”，把布尔什维克称为“过激党”，喊叫“过激党”到了湖南。对此，毛泽东辛辣地指出：“过激党到底是什么，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不然，一光眼，过激党布齐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毛泽东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劳农阶级的革命今后定将普及全世界。

《湘江评论》猛烈地揭露和抨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

---

① 本节引文均见《湘江评论》周刊。

东指出："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用了强权打到强权，结果仍然得了强权。"世界上的战争，"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终止。"在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同时，毛泽东对中国的封建主义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毛泽东还对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大声疾呼，号召她们组织女子革命军，打破封建枷锁，求得自身解放。

《湘江评论》大力宣传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人民群众的发动，是决定一切革命胜负成败的关键。为了阐明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湘江评论》上连载三期。他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刻不容缓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毛泽东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对勤劳、坚忍、智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性，作了充分的肯定。

《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弃旧图新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号召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强权、命运等等偶像，扫除一切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文理明达，说服力强，气势磅礴，所向披靡，深得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赏识，群众也争相购买、传阅。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其中的“无血革命”、“忠告运动”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久就为他所坚决抛弃了。

### （二）关于体育之研究

青年毛泽东十分重视体育，主张德、智、体并重，“心力”与“体力”全面发展。毛泽东重体育，与杨昌济的言传身教有密切关系。杨昌济是一位重视全面发展的教育家，主张身心要同样锻炼，并多年实行冷水浴、废止朝食和静坐三种健身方法。他的学生们，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争相效仿。

青年毛泽东对于体育理论也进行过探索和研究，他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中。《体育之研究》对于体育的意义、作用、运动的方法以及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等作了全面的论述。

关于体育的意义，毛泽东写道：“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是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也。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

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为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

毛泽东认为，体育在德、智、体三者中“占第一之位置”。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

毛泽东认为，体育之效，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体育之大效，“足以强意志。”

体育能强筋骨。“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如果不注重体育锻炼，体强者会变弱；如果勤加锻炼，体弱者可变强。

体育能增知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

体育能调感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毛泽东举例说，人遇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心灵受到刺激，心情难以平复之时，如果立即进行剧烈运动，很快就可以使脑筋清明起来。

体育之大效，足以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比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不畏与敢为。

毛泽东在论及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时，首先提出，“讲体育必自自动始”，“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其次，在教育制度方面，“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

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者并重”。但是，“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他强调，这种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必须改变。

毛泽东总结了自己从事体育运动的经验，指出：“此事不重言论，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运动中应注意三点，“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运动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时要全神贯注，做到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概屏去。”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毛泽东还介绍了他自己创编的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运动，以及打击运动、调和运动等 6 段 27 节运动形式。毛泽东每天早起、睡前各做一次“六段运动”。

《体育之研究》一文，不仅有丰富的体育理论价值，而且含有若干辩证唯物观点。毛泽东研究体育具有真知灼见，锻炼身体也从不间断。他爬山、游泳、步行、做自编体操等等，“野蛮”了体魄。他健康的身体为以后适应艰苦战争环境和承担繁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 （三）创办文化书社

1920 年下半年，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发起人经过筹备，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社址设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内。毛泽东为文化书社起草的组织大纲写道：“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书社开办之初，资金少，营业范围小，

购进的书报、杂志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毛泽东多方筹借资金，努力扩大业务联系，扩大经营范围。在毛泽东等人的辛勤努力下，书社扩充了资金，并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数十个单位发生了业务联系。书社在平江、衡阳等处设立了7个分社，并在长沙城内的一些学校设立了贩卖部。书社销售量较大的书籍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社会与教育》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有：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劳动界》，以及《新青年》、《新生活》、《平民教育》等；销量最大的重要报纸有《时事新报》、北京《晨报》等。文化书社为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为湖南创建共产党，在思想准备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文化书社还设立了报刊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为顾客阅览、选购。毛泽东经常为书社撰写“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在报纸上刊登，对新书报广为宣传。毛泽东还以“文化书社同人”名义撰写“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等传单，夹在所出售的书刊里，广为宣传，吸引读者多买新书，多读新书。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湖南成为全国新文化书籍销售量最大的省份。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俄罗斯研究会还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等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学习俄语，然后转赴俄国勤工俭学。

### （四）毛泽东在五四时期的教育活动

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1920年9月，他受一师校长易培基聘任，担任了一师附小主事，并在一师兼教语文。直到1921年冬，毛泽东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社会职业。他同时还被推选

为一师校友会会长。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这个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广交朋友，培养新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实践了他的教育主张。

毛泽东对学校教育素有自己的见解。1919 年底，他写的一篇论学校教育的论文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文章批判了当时的学校教育同社会实际、同生产劳动脱节的现象，指出："学生不熟谙社会，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有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教学之外，应当安排一定的生产劳动的时间。他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之后，设立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目。他还经常向学生讲国家大事，引导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一师附小的礼堂内，挂着由毛泽东新书的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办事要大家来。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主持学友会时，曾主办过工人夜校，努力在工人中普及文化。在一师附小，他又开办了民众夜校，并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他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 18 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主要补习国语、算术，以便使社会失学青年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民众夜校和补习班的国文教材多采用进步的作品，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文化的同时接受新思想的教育。

为了贯彻民主与科学的办学方针，毛泽东在一师教务会议上，提出过三项主张：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师、教学改革、生活管理等，都可以提意见；充分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学校的经济采取公开政策。这三项主张都被采纳。为了搞好教学，毛泽东选择优秀进步作品为教材。他所选印的讲义，外班学生经常自费加印或借阅。上课时，他除了作一般分析讲解外，经常由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讨论，他再作总结性解答。每逢他上课，学生的座位上都坐双人，教室挤

满了，有些学生站在走廊上听课。有的外班学生放弃了本班的课到这里听他讲课。学生作文，也常由自己出题，不拘体裁。毛泽东的教学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法灵活，教材新颖实用，注重联系实际，因材施教，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有用人才。他说：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

毛泽东教育学生要养成看报的习惯，他常把报纸上的重大时事、政治、社会问题，详做分析介绍。在毛泽东影响下成立的学生社团崇新学社，许多人争相传阅《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向导》、《新青年》等书籍报刊。学社成员通过读书会、讨论、演讲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在毛泽东等人辛勤努力下，一师成为湖南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

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家乡湘潭县的教育工作。1920 年 7 月 25 日，他联络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27 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等人起草的简章。简章规定，以促进湘潭教育为其宗旨。毛泽东草拟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指出：“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学款年有增加，黄金尽掷诸虚牝。根源根本，皆由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知自身缺陷，无责任之观念与振奋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宣言还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

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进社会之进化。”1921年5月1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一期出版。毛泽东等在《发刊词》中，呼吁实行“新教育”，“适合人性的教育”。后该会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发生分化，其活动逐渐停止。

1921年8月，为了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自任教务主任，负实际领导之责。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办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因流于社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① 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条文，限于当时条件没有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等开办这所大学的开拓创造精神。一些知识青年在自修大学一边自学，一边从事工人运动。被反动统治者称为毛泽东的“四大暴徒”之一的夏明翰，就是这所学校最出色的一名学生，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湖南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收文化水平偏低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以尽可能多地培养青年革命干部。补习班招收学员人数最多时达200人以上。

湖南自修大学在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影响。教育家蔡元培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称自修大学“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教育家李石曾也称之为“为

① 1921年8月16日湖南《大公报》。

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

毛泽东在主持湖南自修大学时，还以自修大学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的新阵地。

湖南自修大学于1923年被反动政府查封后，大部分学生转到中共湖南省委筹办的一所正规中学——湘江学校，继续学习。

## 三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毛泽东所从事的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主要是：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 （一）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即开始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10月15日至25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又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大会宣言，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一切爱国分子都站入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宣言并指出，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乃是我们唯一的工作。①

1925年冬，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做广泛的宣传。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

① 1925年10月27日广州《国民日报》。

纲》。大纲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写道："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12 月 3 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同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党部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①

宣传大纲和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奉高潮。12 月 20 日，广州举行群众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毛泽东以"石山"为笔名，写了一篇关于这次大示威的综合报道。报道说：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在全国反奉潮流高涨的时候，应领导全国国民掀起大革命运动。中华全国总工会、革命青年联合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游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

这段时间，毛泽东组织和参加了各种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于 1925 年 9 月，以容纳中国信仰孙文主义的革命青年学习深造、培养国民革命的领导人

---

① 1925 年 12 月 3 日广州《国民新闻》。

才为宗旨。拟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第一批招收学生147名。毛泽东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以及学校的宗旨、课程设置等，并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这批学生于1925年12月中旬赴莫斯科。

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后，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该所所长原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廖遇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兼所长约3个月。该所学习的课程主要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到该所讲课。该所学员毕业后，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任营、团党代表或政治宣传干部。

1926年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宣传报告》。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在毛泽东主持下，别开生面，十分出色。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和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① 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大会选举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则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1926年2月28日，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毛泽东代理理事长，李富春任班主任。政治讲习班专门培养从事军

① 1926年4月10日《政治周报》6、7期合刊。

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会上发表讲演。他说："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了。"第一期讲习班学员都是湖南人。毛泽东指出："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学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毛泽东号召全体学员忍苦耐劳，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①。毛泽东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课，每周讲一次或两次。3 月 18 日，毛泽东又在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 55 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时国内颇有些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②

1926 年 5 月 7 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等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人员跳出来挑起事端，欺骗群众，破坏集会。会后，毛泽东等参加大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联名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递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细叙述了集会遭到破坏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办并主编《政治周报》。1925 年 12 月 5 日，《政治周报》出版创刊号，至 1926 年 6 月，共出版 14 期。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

① 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一期。
② 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第二期。

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意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政治周报》上的不少文章出自毛泽东的手笔。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的叫嚣，毛泽东在《政治周报》1、2期上发表了若干篇短小精炼的杂文，他指出：“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反革命派“反共产”的实质。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还发表了若干篇分析资产阶级各派的文章，阐明了他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1. 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没有第三条路可走。2. “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它们秉承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意旨破坏革命。国民党右派从革命阵营中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3.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由于自身的条件和客观环境条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4. 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主持下，深刻揭露了代表国民党右派的“西山会议派”的反动面目，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派对西山会议派群起而攻之。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

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起来，摘要刊登，严厉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的破坏活动，维护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1926 年 5 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毛泽东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积极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他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宣传打倒军阀，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并积极培植革命力量，对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二）毛泽东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曾领导过农民运动，进行过农村调查，对中国的农民问题具有深刻的了解。1926 年 2 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陈公博、毛泽东等 9 人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部长林伯渠提议毛泽东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上获得通过。毛泽东于 1926 年 2 月上旬开始筹办农讲所。经过周密筹备，来自 20 个省的 327 名学员通过考试被录取。5 月 15 日，农讲所正式开课。本届农讲所共开设 25 门功课，理论讲授 13 个星期，实习 2 个星期。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兼授《农村教育》和地理课。

毛泽东一贯注重学生自学，提倡学生针对社会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学生在接受理论教育之后，毛泽东组织他们到海陆丰实习，使学生们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考察其组织，目睹其生活，极大地影响了学生们开展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农讲所还将学生按地区组成十余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周召

开讨论会，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农民问题研究会调查研究的问题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都在调查研究之列。其主要调查研究内容有：租率、利率、主佃关系、田赋、工价、失业情形、教育状况、兵祸、天灾、贪官污吏、妇女的地位、农民的观念、农村组织状况、宗教信仰状况、民歌、成语等。毛泽东以农民运动研究会的方式，增加学生的农运知识，训练学生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们提供的调查研究报告，为毛泽东积累了研究全国各地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翔实资料。毛泽东将这些报告审核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者参考。农讲所的这些教学方法，是湖南自修大学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是农讲所的主课。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毛泽东认为，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够实现其压迫和榨取则全靠封建地主阶级为其统治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在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后，毛泽东又从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等各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农民群起而投身革命的可能性。毛泽东在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把阶级压迫比作一座宝塔。最下层的塔基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剥削阶

级虽然残暴，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团结劳动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大众头上的这座塔就一定可以推翻。人心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

在农讲所，毛泽东还兼授《农村教育》课。在讲授农村文化教育状况时，毛泽东指出：古诗中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儒为国家宝，鱼乃席上珍”的说法，反映了封建贵族式的教育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般贫苦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忠孝主义。孔子的教育思想经久而不衰，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其原因是他们讲的君臣之道有利于君王的统治。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这种教育，应该指示各种农民问题之来源及内容。举办这种教育，只能由农民协会出面，没有农民协会出面，便没有农民教育。

毛泽东的讲授内容，密切联系中国农村的实际，生动具体，常穿插一些鲜明的例证，学员们听课兴趣盎然，又从中得到深刻启示。讲课中，毛泽东号召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去，号召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从农民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也没有用。

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这一时期，毛泽东结合农讲所的工作，深入地研究了农民问题，发表了几篇关于农民运动的著作，解决了农民同盟军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武装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领导者。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束后，毛泽东又开始筹办武昌中央农

民运动讲习所。1927 年 3 月 7 日，中央农讲所先期班开课，4 月 4 日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来自 17 个省，共 739 人。毛泽东要求教师特别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并教育学员做农民阶级急先锋。中央农讲所开设了《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半数以上的课程由毛泽东主讲。毛泽东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编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通过典型分析指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通过对比，毛泽东的观点很容易为学员们所接受。为了广泛深入地了解农村问题，中央农讲所定期举办农民问题讨论会，师生共同就农民的土地、武装、政权等问题联系农村实际进行讨论研究。

**（三）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对文化运动的考察**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 5 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并于 3 月份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中记述了农民的 14 件大事，其中 1 件就是文化运动。报告中的文化运动部分以简短的文字反映了 5 县文化运动的基本状况。

关于中国农村过去的文化状况，毛泽东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 90％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的是农民。

关于农民运动开始前夕的农村文化教育状况，毛泽东指出，农民们所欢迎的文化教育，是能够切合农村需要的文化教育。他说，那种脱离实际的“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的是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

讨厌的人。故农民们宁欢迎他们称之为同农村实际接近的“汉学”的私塾，也不欢迎他们所称之为远离农村实际的“洋学”的学校；宁欢迎私塾先生，不欢迎小学教员。

关于农民运动开展之后的文化教育状况，毛泽东写道：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校，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个乡有一所。农民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象以前，空喊普及教育，没有实际效果。

通过调查，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中兴起的联系实际、切合农民需要的农村文化运动。

青年毛泽东是作为文化人迈入社会的。后来他也曾自称是一个人民的教师，他在率领部队进军井冈山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并以其勤奋工作和真知灼见在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

## 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化工作实践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部队进入井冈山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井冈山斗争以军事斗争为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局面打开后，尤其是 1931 年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后，这里的文化工作得到较深入扎实的开展。

### （一）倡导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

1930 年前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于共产国际反对中国农村刚刚兴起的游击战争，主张实行俄国模式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内一些人视为金科玉律，并据此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

为了反对共产党内和红军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一篇论述调查研究的文章，深刻地阐明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解决问题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以为上了书本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① 《晏子使楚》中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同样的植物，环境变了，果实可能有所差异，原因是水土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办事情，此一地，彼一地；此一时，彼一时，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可能不会收到预期效果。"本本"上的东西既使是别人的成功经验，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有其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状况及各方面条件的差异，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是完全行不通的。教条主义地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或"本本"上的东西，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脱离，必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本本"主义是要不得的。

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1页。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 作为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本本"，既不能弃置不用，又不能生吞活剥地利用。唯我独尊或拿来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会把事情办糟。毛泽东一则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二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正确的成功的道路。

关于如何纠正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指出："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②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③ 毛泽东一贯注意调查研究，一贯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正确的指导思想遭受党内教条主义者攻击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来捍卫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为了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 的论断。为了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文化

---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1—112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0—111页。

③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12页。

④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09、116页。

思想，是扫除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错误指导思想障碍的有力武器。

### （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

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①] 在一贯重视文化教育工作的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在基础薄弱、局势动荡、条件艰苦的形势下，在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毛泽东曾对中央苏区的长冈乡、才溪乡进行过详细调查，调查中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两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情况。

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江西省兴国县上社区长冈乡进行农村调查。毛泽东全面调查了长冈乡包括文化运动、卫生运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情况。

长冈乡辖4个村，全乡437户，1465口人。全乡共有小学校4个，每村1个，时称“列宁小学”。共有在校学生187人，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65%。其余35%的学龄儿童，不是父母不让他们上学，而是他们自己贪玩不肯去。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溜到山上打仗去了。学生年龄在7—13岁，也有14—15岁的，因为忙于生产，只能读半天书。书纸笔墨，学生自备。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其他乡有的由学生家里出来供给老师，有的安排专人做小生意供给老师的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5页。

伙食开销。乡村教员缺乏，充任教员者多是“文墨不深”的。

长冈乡4个村，还办有9个夜学，有的村1个，有的村2—3个，共有学生约300人。其中男约30%，女约70%。全乡16岁—45岁的青壮年共413人，大多数进了夜学，45岁以上也有的入夜学。夜学很爱群众欢迎，都说“夜学顶好”。夜学的书纸笔墨及灯火均由学生自己解决。各夜学均分为甲乙丙三班：甲班读报，学算术，乙班，学成年读本；丙班，学儿童读本。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全乡9个夜学教员，7个是乡苏维埃代表。

长冈乡于1932年建立了识字班。小孩拖累的、年纪大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识字班依住所接近者，3—10人为一组，推举稍识几个字的为组长。组长多属夜学学生。识字班的教法，随时随地地教，起初画地为字，后来各备一本子学写字。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写字本约10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写的字，组长有不认识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认识的，问日学老师。为了认字，每村在路旁屋壁上设一识字牌，由日学老师绘图写字，每次2—3个字，两三天一换，效果很好。

长冈乡全乡每个村都设有一个俱乐部。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各个俱乐部都排练了新戏。

以上长冈乡文化教育情况，出自毛泽东的调查记录。上述调查内容细致入微，反映了毛泽东对苏区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行政领导者，制定了政策还要亲自深入基层了解政策的贯彻实施情况，总结经验，予以推广。通过深入调查，毛泽东了解到长冈乡确实组成了切合农村实际的文化教育组织，其实际效果也是好的。因此，毛泽东号召：每个乡政府

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毛泽东还调查了长冈乡的卫生运动。长冈乡按住所接近将居民编为卫生班，七八家一班的居多，有班长。规定5天大扫除一次，实际7天一次的多，10天一次的也有。需要有人督促。这里的卫生工作，对于厅堂、睡房、水沟、坪场的打扫，饮食卫生，衣服清洁等，都有明确规定。乡、村卫生委员会工作抓得是否认真，直接影响卫生工作的好坏。长冈乡认真抓了卫生工作后，取得了很大成绩，卫生情况大见好转。

毛泽东在调查长冈乡卫生情况后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1933年11月，毛泽东又到福建省上杭县上下才溪乡进行了调查。上才溪乡，共4个村，523户，2318口人；下才溪乡，共4个村，503户，2610口人。毛泽东除对才溪乡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作了调查外，还调查了这里的文化教育情况。

上才溪乡，共有日学4个，学生共141人，多是6—10岁儿童。11—14岁者37人进区政府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尚有145名学龄儿童失学。全乡有夜学4个，学生共120余人，多为女子。因各种原因不能入夜学的，则入识字班。全乡有识字班24组，每组10人，共240人，每5天由夜学教员发5个新字去认。全乡在道路处设有6块识字牌。上才溪乡有一个俱乐部，工作人员50余人，内有新剧团人员30多人。俱乐部内设一读报团，逢圩（集市）日为群众读政治读物。全乡还设有墙报4处，设在日校门外。毛泽东亲自调查的下才溪乡的文化教育情况，与上才溪乡大致相同。

中央苏区上杭县的上下才溪乡，在中央苏区知名度很高，各

方面工作都较出色。毛泽东选取这里进行深入细致的典型调查，其目的显然在于为中央苏区各地树立学习的榜样。

为了提高中央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开展报刊宣读、办墙报、戏剧演出等群众文化活动。从毛泽东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这些办法，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据 1933 年中央苏区 2932 个乡的统计，共有列宁小学 3052 所，学生约 9 万人；实习学校 6462 所，学生 94500 余；粤、赣两省共有识字班 32888 个，155371 人；中央苏区不完全统计，有俱乐部 1656 个，工作人员 49668 人。江西省兴国县扫盲群众运动统计，全县共有乡识字运动总会 130 个，村识字运动分会 561 个，识字小组 3387 个，识字小组成员 22519 人。中央苏区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在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34 年 1 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总结了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对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总结。毛泽东说，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931 年 12 月 11 日创办时共发行 3000 份，3 年间已增到 4 万份；1931 年 7 月 1 日创办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已发行到 2. 8 万份；创办不足 1 年的中共苏区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行量为 27100 份；与《红色中华》同时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发行量为 17300 份。中央苏区已

有大小报纸 34 种。报刊种类和发行量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群众文化生活方面，毛泽东指出，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蓝衫社（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在广泛地发展着。群众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偏僻乡村也有了田径赛，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运动场。

关于干部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指出，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造就领导革命斗争的干部，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央根据地党校），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教育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也应该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地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除毛泽东列举的学校外，中央根据地还有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以及瑞金列宁师范、中央列宁师范、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分别负责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解决苏区知识分子缺少、教育人才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也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毛泽东还明确阐述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造就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青年毛泽东一贯认为，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文化方面积

弊太多太深，必须革除陈腐的旧文化，发展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为毛泽东一展抱负，革除文化积弊，创造群众性的文明的文化提供了机会。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毛泽东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文化教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毛泽东在这里领导文化教育工作的实践，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全国解放后他领导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 （三）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诗词创作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在他的文化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与中国历史上许多诗人相比，现在看到的他的诗作数量并不多，但是，他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不朽之作。他的若干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气势、境界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不愧为一位才华横溢、出类超群的诗人。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共50首，其中从上井冈山到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所创作的诗词有10首。这10首诗词是：《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

毛泽东的这10首词，创作于戎马倥偬之中，描写了许多战争场景，大气磅礴，豪情满怀，充满胜利信心。正所谓“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①]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每一首都是近代诗词文苑中的瑰宝。

---

① 高亨：《水调歌头》，见《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

1927 年 10 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毛泽东扯旗造反，雄踞一方，从一做起，培植中国革命的武装力量。带兵后，毛泽东从戎而未投笔，向世人奉献一篇篇千古佳作。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暴动的农军上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不久，两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此时，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正处于相对稳定时期，湘赣两省敌人于 1928 年 7、8 月先后对井冈山发起两次“会剿”。在第二次“会剿”中，趁毛泽东亲率部队到桂东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之机，湘敌一个师于 8 月 30 日上午向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发起猛攻。红军守军不足一个营，凭借黄洋界的险要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并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的三发炮弹轰向敌群，将敌击退。毛泽东得知黄洋界保卫战获得全胜，十分兴奋，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首词以高昂雄壮、轻松乐观的笔调，描写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实际上，这是对整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和对井冈山革命武装斗争道路的热情讴歌。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其他词作，也无一不与战争有关。“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战地黄花分外香”，“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些战斗诗篇，毛泽东自己讲，有些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些诗篇，有晴虹贯日、声彻九天之势。从这些悲壮激越的

战斗诗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革命战争具有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把为人民解放而进行的战斗看成一种幸福、一种愉快。即使在红军只有数千人，指挥员经常置身战斗第一线，指挥作战，战斗中常处在生与死的边缘的时候，毛泽东仍将对革命战争由衷赞美的心情反映在他的诗篇上。一句“战地黄花分外香”，把毛泽东对革命战争的赞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人民的彻底翻身解放，不经过革命战争推翻反动统治者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所领导和指挥的正是这种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他必然要赞美人民革命战争。毛泽东对人民革命战争的赞美，也是对英勇献身于人民革命战争的革命英雄的赞美。描写战争，赞美人民革命战争，是毛泽东这一时期诗词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毛泽东这 10 首词，思想内容上堪称博大精深。在《西江月·井冈山》中，词的上半阙着重表现了黄洋界保卫战战前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的战斗气氛；词的下半阙，则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了这次战斗的胜利结果及其必然性。“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两句，为红军“岿然不动”的形象作了哲理性的思想烘托。红军的胜利，是“森严壁垒”的胜利，更是“众志成城”的胜利，毛泽东是把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提高到人民战争必然胜利的高度加以描述的。毛泽东的另一首词《清平乐·蒋桂战争》，虽然题为“蒋桂战争”，但其主旨不在于写军阀混战，而在于颂扬革命斗争。在蒋桂战争爆发以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则趁军阀混战之机，率部队先后攻克长汀、龙岩、上杭，发动根据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毛泽东以凝练的语言描述了这段革命历史，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委婉地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

思想和悲观情绪。读了这首词，使人感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毫无根据。在《采桑子·重阳》中，毛泽东在上半阙盛赞“战地黄花分外香。”下半阙写道：“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秋风中的万里霜天之所以“胜似春光”，是有顶风冒霜的黄菊的出现，胜似春光是对菊花而言的。下半阙，毛泽东显然仍在赞美菊花。菊花生在战地才让人感到“分外香”。毛泽东这首词，通篇都是对革命战争的由衷赞美。如此说来，词 的“战地”两字才是全词的画龙点睛之笔，这首词的全部深刻寓意无不与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在《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毛泽东运用明确的语言写道：“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纠正了错误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为实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满怀豪情进军赣东。毛泽东作为决策者，目睹工农群众浩浩荡荡开赴新战场，其势如同燎原之火，使他喜悦，使他自豪。寥寥数行字，包含了深浓的诗情画意。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气势如排山倒海，一泻千里。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只有在反复吟诵品味中去感受。这气势的由来，除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底外，更深层的本源是红军压倒一切敌人的高昂士气，红军士气的升华形成了这首词吐纳大千的气势。毛泽东终于唤起了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形成不周山下的红旗错落招展的景象，革命形势呈现一派兴旺发达的新局面。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前的最后一首词是《清平乐·会昌》。此时，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统治，致使革命形势陷于极端困难，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毛泽东的这首词，却将革命将士引入另一种思想境界。“东方欲晓”，一语双关，表达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之意。“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两句，是诗词精彩的绝唱。中国工

农红军为了人民的解放，转战于千山万水，历尽艰辛，革命意志却越来越坚强。“独好”的“这边风景”，是对革命事业的赞颂，是对正确革命路线的褒扬。“更加郁郁葱葱”的南粤，咏唱了更为辽阔的祖国大地，更深地理解，则是指出了美好的远景和光辉的未来，表明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满怀希望的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对于如何指导中国革命达到成功早已成竹在胸，他产生这种乐观情绪是他的自信心的流露。

诗言志。通过这 10 首词，足以透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浏览这 10 首词，时时感受到作者胸中饱含的喜悦乐观情绪。这种情绪，渗透在词的字里行间。“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听到胜利捷报，喜悦的心情引发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兴冲冲一气呵成，这是可以想见的创作过程。“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显而易见，分得田地的群众高兴，毛泽东也在高兴。“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令人感到毛泽东心里在笑。“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无疑是在开怀大笑了。其他如：“横扫千军如卷席”，“装点此关山，分朝更好看”，“风景这边独好”，“更加郁郁葱葱”等等，无一不使人感受到毛泽东那笑意满怀、轻松乐观的心情。这是胜利者的笑，是充满自信的笑。毛泽东的事业在起步之初，这样的心境，使人感到他不仅是当时的胜利者，而且必定会成为将来的胜利者。透视这种心境，足以顿悟，毛泽东自信已找到了济世良方，到了“大纛一张，万夫走集”，群起而奔向那必将达到的既定目标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应当说出这样的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充满自信的毛泽东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需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他需要发动群众，激励斗志，鼓

舞士气，于是他拿起了文艺武器，以诗词创作抒发激情，教育感染他的同志和同胞。毛泽东的诗词无疑是起到了这种作用的，而且，它的激励作用至今犹在。

创业至艰，毛泽东对此深有体验。创业的艰难，从毛泽东的词中也不难找到某些佐证。请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七百里驱十五日"，"雪里行军情更迫"等等，这些诗句，分明在写创业的艰辛。在艰险倍尝之中，毛泽东却能以苦为荣，以险为乐，大有"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① 的英雄气概。不畏艰险，不怕牺牲，锐意进取，不屈不挠，这种所向披靡的气势，预示着毛泽东终将成为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伟人。

艺术表现纯熟精湛，极具匠心，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又一突出特点。《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猎猎战旗，铮铮鼓角，立即把读者带到当年井冈山前沿阵地；视野推出去，拉回来，画面如生龙活虎。"敌军围困万千重"，为其"宵遁"作了必要的铺垫。《清平乐·蒋桂战争》：用"黄粱"指斥军阀，用"金瓯"比喻国土，用典贴切，通俗易懂，"军阀重开战"，打碎金瓯；红军则"收拾金瓯一片。"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军阀"一枕黄粱再现"，人民"分田分地真忙"，又形成反差强烈的对比。抑扬得体，混成无迹。《如梦令·元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看似轻轻一点，实则寓意深刻，反映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吟咏中耐人寻味。从路上写到去向，又写了一路的景象，读来似有画面的动感。《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以"不周山下红旗乱"结尾，极大地拓展了词的意境，深化了词

① 孙中山：《兴中会宣言》。

的思想。使读者联想到，只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红旗就会处处飘扬，革命事业就会取得彻底胜利。《清平乐·会昌》文字极为自然潇洒，结构严谨而不拥挤，用词浅近而又寓意极深，亦情亦景，情景交融。毛泽东的这几首词作，语言如行云流水，顺畅通达，言简意赅，生动传神；气势如高屋建瓴，高昂雄壮，有“包藏万物之机，吞吐天地之志。”①

读毛泽东的诗词，是享受，是鼓舞，是激励，是鞭策！毛泽东诗词的生命力永存！

① 见《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

# 第二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要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关于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思想，关于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等等，都在延安时期得到了阐明和实际运用。

## 一　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状况的认识

1940年1月，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毛泽东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全面阐明了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状况的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五四运动以后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四个时期以及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也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

### （一）关于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和毛泽东论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

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身上。①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起始于五四运动。五四以前，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与政局的动荡已持续数十年。为了摆脱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的束缚，中国文坛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反映。在资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自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在中国封建文化领域居统治地位的孔子儒家学说，其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又由于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之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698页。

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以所向披靡的雄姿，登上了中国的文化舞台。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取得了节节胜利。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期。

在明确指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作用。毛泽东满怀崇敬与激情地写道："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推崇鲁迅，是因为他在鲁迅的言论和行动中发现，他的愿望和事业，鲁迅一直是忠实而英勇的实践者，他们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毛泽东在延安树起鲁迅这面大旗，是为了推进他们的共同的事业，推进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关系国家和民族之未来的事业。

### （二）关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四个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五四运动后 20 年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划分为四个时期，并作了详细说明。四个时期的划分，客观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 20 年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

第一个时期，从 1919 年五四运动至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文化战线的斗争，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

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发展，不但有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面大旗。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广泛地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中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与反动势力妥协，站到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是从 1921 年到 1927 年，这个时期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并发展了第一时期三部分人的文化统一战线，吸收了农民阶级加入，在政治上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在这一时期中，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参加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时期，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国民党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进步报刊，共同宣传了反帝反封建，提高了以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

第三个时期是从 1927 年至 1937 年。由于第二时期革命营垒中发生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中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此时，中国革命进

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时期。这个时期，伴随着反革命的军事和文化“围剿”，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都得到了深入发展。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的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伴之以全国人民的觉悟。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时期的“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第四个时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再度合作，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武汉失守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阶段，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的不自由。此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抗日的文化在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日益孤立，成为人民公敌。文化方面的革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革命的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①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是以革命文化战线的斗争为先导。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加速了人民解放事业的进程。

### （三）关于文化性质问题

毛泽东在论述文化性质时，反对了两种偏向，明确指出了当

---

① 毛泽东：《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25页。

时的中国文化的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首先，毛泽东指 出，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是错误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如同在政权问题上一样，在文化上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抗日战争时期似乎又在赞助国民党的“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意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意工农群众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主义，没有实现的国内国际条件，它同资产阶级政权专制主义一样，是行不通的。

其次，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其实质也不是完整观念上的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① 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其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国民文化上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还没有形成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4页。

文化。

第三，毛泽东断言："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① 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中国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文化革命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其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主义文化。

## 二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的这段话，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文化的本质，阐明了文化发展变化与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在整个社会 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文化的从属性，二是文化的能动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属于意识范畴的文化，必然从属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是一定文化的根据，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自周秦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是封建的经济，“百代都兴秦政法”，虽改朝换代而万变不离其宗。而从属于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文化的这种从属性也是一种适应性，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只允许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居于统治地位，而排斥与其不适应的属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文化的从属性又是一种依赖性，一定的文化依存于一定的政治经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消亡了，与其相适应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随之失去统治地位。在中国，至圣先师孔夫子的肖像或牌位之所以被逐出学校，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封建文化所依存和为之服务的封建社会灭亡了，人民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统治者。人民政权不允许悖离其宗旨的封建文化继续居于统治地位。当然，一定的文化对其从属的政治和经济是具有独立性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被推翻以后，从属于它的一定的文化还会在很长时期内继续存在。这种已经失去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还会在新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下发生作用，阻碍以至破坏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因此，在一场大的社会变革以后，

必须注重解决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习惯势力的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一定意识形态的文化又是具有能动性的。一定的文化在一定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上发育起来，又对它所赖以发育起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大的反作用。

首先，一定的文化具有巩固政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那样漫长，与中国有发展完善的封建文化不无关系。系统的封建文化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发展。在中国，封建文化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封建皇帝被推翻 30 余年后，中国还在受着封建文化的严重影响，以至于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数十年内要面对反封建的任务，而且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致力于肃清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绳索。统治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孔孟之道，完全是维护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伦理道德说教。孔子大力宣传“仁”的学说，称“克已复礼为仁”，实际上是以维护封建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的；政治上他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孔子的弟子，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论点。孔孟之道所代表的中国封建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难以挣脱的思想桎梏。中国封建社会的官，不习孔孟之道则无以为官；中国社会的民，不尊封建礼法则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数千年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信“君权神授”，人们听天由命，习以为常。“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管用”，成为老百姓的口头禅。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渗透了封建思想。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氛围中，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得以维护，

封建政权得以巩固。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孔孟封建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推下统治地位。代之而起的新文化，又在维护新的政治统治。

第二，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起着维护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①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经常借助于宗教或大肆宣传鬼神来欺骗和威吓奴隶和平民，使他们安分守已，不敢反抗。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还宣扬奴隶主和奴隶都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把奴隶制说成是万古不变的制度。我国夏商时代，统治者宣扬他们受命于天，商王处理国家大事，先要向神问卜。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说，一些人生而为自由人，另一些人则天生是奴隶。就是依靠了这样的奴隶主义文化思想，奴隶主维护了对奴隶和平民的异常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维护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封建统治者利用封建文化，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果报应”、“不修今生，但修来世”等，麻痹人民，使其不反抗、不斗争，在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俯首听命，维护封建的生产关系。

第三，文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人类进步的作用。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 “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

---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83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94页。

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文化工作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文化事业在促进人类进步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事实上，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每一种社会形态服务的某种特定的文化，相对其前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而言，都曾起到过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作用。这种情况，与某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走向反动，变为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功是功，过是过，应当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正确结论。

第四，就广义的文化而言，一定发展程度的文化是社会文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唯物论者从来不主张割断历史，从来都以客观的标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切文化成果，肯定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8页。

②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1页。

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 社会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的成果，除了丧失生命力的糟粕部分而外，都可能成为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继续发展的基础。人类固然在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但是，人类的每一发现、发明和创造，都必须建立在以往已有的成果的基础上。由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所形成的文化成果，更是人类文化的继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在继承和发展之列。即使是被以往的社会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为后来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反面的经验。

## 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所作的定论。毛泽东所说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点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大特点。

###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②] 毛泽东依据中国文化的历史状况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现实状况，强调新民主主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22—6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义文化的民族性，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有着丰富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渗透了独树一帜的民族性。中华民族的文化需要发展，需要创新，但必须在原有的民族风格的基础上创新。创造出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用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才不会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拒绝，才不会引起群众思想上的反感与混乱，才不会使中国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遵循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曾经明确表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毛泽东所指出的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决不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过去的东西。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有些需要扬弃，有些需要批判地继承，就中体现新民主义文化应当具有的民族性。从历史角度看，只有具有民族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是顺理成章的。

从现实角度看，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3—534页。

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①]在当时的中国，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是反民族的汉奸文化。在延安，毛泽东还曾说过：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②] 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行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奇耻大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规模，10余年后已侵占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大片领土。在日本占领区，侵略者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更有必要强调其民族性这一特点。

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特点，并不排斥吸收外国进步的东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③]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盲目排外，优劣不分，拒绝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严重阻滞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国家的兴旺和人民的进步。中国皇帝长期的自我封闭之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优势逐步丧失。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取得了巩固的统治地位，并使综合国力获得巨大发展，在政治、经济、军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事、文化上显出咄咄逼人之势。资本主义列强以侵略手段迫使中国皇帝订立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到了这个时候，一些认识到中国已经远远落伍于世界新兴起的发达国家的人士，开始寻求自强救国的道路。于是，有些人便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伸出一只手打倒封建文化，但主张要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遗产；伸出另一只手打倒帝国主义文化，摈除“全盘西化”，但又主张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具有民族特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没有妄自尊大，也没有妄自菲薄，而是依据于中华民族的特点，最大限度地开阔视野，博采“众家”之长，推动新民主主义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样的新文化，自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延安，毛泽东还曾更详尽透彻地谈及吸收外国文化的问题，他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①

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文化的民族形式，是民族传统使然。任何一个有独立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民族集合体，都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形式的文化。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亦当如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83页。

话?”[①] 既然人数为三亿六千万的中国农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那么，没有民族形式，就难于使广大农民所接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就难于开展起来。在不同的文化传统氛围休养生息的民族，其文化习俗各有差异，甚至思维方式也各有特点。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在固有的民族形式的文化传统面前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新文化的相容性的问题。不解决民族性的问题，新文化运动就失去了基本的落脚点。勿庸置疑，民族的文化是形成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文化

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段话包含三层意思：1. 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封建迷信的；2. 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3. 行动上的一致不等于根本指导思想的一致。

第一，科学的文化就要破除迷信，这是对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而言的。中国的传统封建文化充满了迷信色彩。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一贯以迷信思想麻醉广大人民群众，引导群众听天由命，借以维护封建剥削制度。毛泽东早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毛泽东说：信八字望吉好运，信风水望坟山

---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78页。

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罗，如今是委员的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忽然八字都好了！坟山也突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①] 毛泽东所讲的道理，是能够使农民们信服的。但是，要彻底消除广大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毛泽东所见到的迷信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遍地皆是。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被称为“信者有，不信者无”而实际上信者也无的东西，竟统治人们思想，左右人们的行动达数千年之久，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仍未完全消声匿迹。这是文化落后造成的悲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强调科学性，就是要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发展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科学的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

---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33－34页。

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①

第二，科学的文化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对一切外国文化而言的。外国文化，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科学的，也有反科学的。对于外国文化，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搬用，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即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即使是外国的进步的科学的文化，也不能兼收并蓄。毛泽东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②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恰当地结合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运用它。"③毛泽东在延安时还告诫全党："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7—708页。

② ③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7页。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② 这就是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外国的文化要批判地吸收，即使是被实践检验证明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也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这就是科学。以这样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态度，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第三，某一阶段革命文化统一战线内行动的一致性与其中不同阶级的组成人员指导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是相区分的。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时明确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③ 毛泽东一贯主张，在完成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为此，只要在某一阶段内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目标，就有必要采取统一行动，无论其文化观念相差何等悬殊。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是加入了革命统一战线的。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与根本指导思想毕竟不同。行动可以一致而思想不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98页。

③ 同②，第707页。

能混淆，不能让反科学的思想扰乱无产阶级的思想阵线。原则的坚定性不排斥策略的灵活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主张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行动，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科学的态度；它主张客观真理，客观真理的反映就是科学的认识。这是需要坚守的原则。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对尚有进步性的其他理论的信奉者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容性，有的尚可采取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新三民主义的相容，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但是，共产党人绝不赞同任何反科学的理论和信仰，要在思想上与其严格划清界限。

###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是时刻把人民大众放在心上的。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人民大众，它是民主的；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化必须贯彻到人民大众中去，这也是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而在向人民大众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属于人民大众，它是民主的。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以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动力的人民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然也是民主的、大众的，是为全民族的90%以上的工农劳

---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8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31页。

苦民众服务的，因而也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服务的。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民人口众多。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中国当时有4亿人口，农民占3.6亿。在中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实行大众文艺，开展国民卫生，都必须与中国农民人口众多的实际国情紧密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论述文艺工作时，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①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军，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② 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文艺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人民大众在人民领袖的心目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革命文艺为群众服务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个讲话中所阐明的革命文艺思想，是其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联系实际的最集中最明确

---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3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655—656页。

最生动最具体的反映，为人民大众的精神贯穿于这次讲话的始终。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既然是人民大众的，它就必须贯彻到人民大众中去。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①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都能够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②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至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封建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半数甚至七、八成奉献给地主。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民经常生活在贫苦线上，能够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很少。即使接受一些文化教育，也很少可能触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广大农民的文化思想，通常出自长辈的言传身教。封建社会的农民"蒙昧无知"的状况是封建的反动统治造成的。中国近代出现的无产阶级，大多数是破了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状况与文化状况同广大农民相差无几。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广大人口还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生活，生活状况和文化状况没有得到多少改善。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要使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状态"，就是指此而言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文化，大众的文化就要

---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2页。

②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以大众为主要工作对象，为大众所接受，引导大众摆脱文化上的愚昧落后，走向文明。人民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可以直接服务于人民革命事业。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革命文化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则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 毛泽东在引述了列宁的这个论断之后，接着指出："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② 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是改善人民大众文化状况的需要，是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自身性质所决定了的。

向人民大众普及新民主主义化，要有适当的方式方法。关于如何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延安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涉及教育、艺术、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关于教育，毛泽东说："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③ "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班。不但要

---

①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中文第2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集，第2版，第708页。

③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1页。

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① 毛泽东把教育作为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途径，提出要采用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不正规的业余教育的方式。其教育面也是全民性的，包括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干部教育。在毛泽东看来，必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没有条件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因陋就简，把新民主主义的全民教育办起来。在艺术工作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谈到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只有用工农兵自已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② 毛泽东把提高与普及的统一比作“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1944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了要采用工农兵所便于接受的文艺形式，这就是“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③ 民间文艺形式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以造成新的舆论，树立新的风格和习俗，形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气氛。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有 150 万人口，其中却有 100 多万文盲，有 2000 个巫神，封建遗迹和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起来与迷信、知识贫

---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11—1012 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59 页。

③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12 页。

乏等现象作斗争，文艺宣传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卫生方面，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① 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广大农村，文明程度差，卫生状况差，医疗条件差，许多人沿袭旧习惯，有病找巫医神汉。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农村的医疗状况和文明程度不可能迅速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为人民训练医生，并帮助广大旧医和旧式兽医的进步，根据可能的条件，千方百计提高医疗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关于语言文字，毛泽东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② 由此可见，为了适合广大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在延安时已经提出了改革文字的任务，并提出了语言大众化的问题。打倒"孔家店"以后，白话文在文坛上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仍然存在语言文字力求更加切合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严厉抨击了知识界的语言文字和文风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列出了八条罪状，成为申讨党八股的檄文。毛泽东在讲演中说："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

---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2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8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①] 从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知识界脱离群众的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决心予以彻底铲除。

## 四　吸收利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

毛泽东一贯重视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利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从不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取其中尚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来自西方的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和本质规定。其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毛泽东拿来为其所用时，均不过是表象的，非本质的。

### （一）古为今用，吸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利用，触及了传统的军事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尤以军事文化涉及最多，这是由毛泽东指导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所决定了的。

为了领导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毛泽东在延安十分注重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研究。1936 年 9 月 26 日，毛泽东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请他们设法购买论述战役指挥与战略的兵书，并特别嘱咐要买一部《孙子兵法》。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曾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40—841 页。

引述《孙子兵法》中的著名论断，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的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这篇军事著作中，毛泽东还引述了"声东击西"，"兵不厌诈"等古代军事术语，并列举了见于中国史册上的一些著名战例。他写道："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①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份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战国时吴起的"以一击十"，在毛泽东那里化为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从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和古代"先发制人"的战术中，毛泽东引出"后发制人"的原则，以说明积极的战略退却的必要性。孙子的"攻其不备"，岳飞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等用兵之道，毛泽东都加以发挥，为我所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历数了中国历史上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等等农民起义，指出中国历史上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

---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91页。

革命战争”，并且指出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还注意从优秀古典名著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在延安时，他曾指示延安平剧院根据中国古代名著《水浒传》的有关情节创作《三打祝家庄》剧本，并指出：“该剧要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后来该剧公演，毛泽东称它“很有教育意义”。毛泽东所说的教育意义，分明是指梁山依靠主力军、地下军、群众力量夺取祝家庄，在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娴熟于心，运用自如，创造发挥，得心应手。中国古代军事上的以弱胜强之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黄巢、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失败之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如此等等，是起过作用的。毛泽东在对传统军事理论、战史战例古为今用之中，在总结现实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之上，写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是我国军事文化的经典之作。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革命家，一生酷爱读史。毛泽东读史，主要目的是熟悉历史事件，知兴亡，明事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中国数千年积累的丰富的政治文化，对于治国平天下，处理敌我友等各种关系，能够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宰相李林甫嫉贤害能，说“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揭露帝国主义者象李林甫一样，他说：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实际上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是口蜜腹剑的朋友。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毛泽东引用孔子《论语》中“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的话，指出反动派如

果一意孤行，必先“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毛泽东还引用《列子》一书中愚公移山的故事，教育全党发扬愚公精神，同全国人民大众一道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1944 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后，毛泽东指示印发单行本，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攻陷北京城后因骄傲导致失败的教训教育全党，以期引以为戒，不再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为党招致损失的错误。在政治文化的古为今用方面，固然不能武断地认定，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政策导源于战国时期的“合纵”、“联横”，对李鼎铭“精兵简政”的采用，便是来自汉朝刘邦的“豁达大度，从谏如流”，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来自唐朝魏徵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是，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从类似的古典中得到过某种启示，这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乐于读史，其主要意义就在于此。

在经济方面，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与民休息”的政策。抗战前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休养民力”的方针，取消了几十种捐税，大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严格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并实行了古已有之的军队屯田办法，领导抗日军民共渡难关。八路军第 359 旅在陕北南泥湾垦荒屯田，各抗日部队的“武劳结合”，为解决边区的物质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在 1945 年 4 月 27 日《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写道：“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①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106 页。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借古喻今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① 的论断，指出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并且说，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毛泽东为了说明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及政府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的问题时，引用了《孟子》中“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话（原话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② 明确了与国民党关系中彼此不挖墙角的“不为”与实现联合抗日的“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 （二）洋为中用，吸收利用国外的文化精华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毛泽东的这段话，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外国文化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它的必然趋势是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发展方向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新文化为楷模。列宁、斯大林领导创建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9页。

主义国家。中国必然要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榜样发展自己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所规定了的。但是，如毛泽东所言，对于进步的外国文化，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吸收，不可盲目搬用。

对于外国的古代文化，毛泽东也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文化。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所主张的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更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外国古代文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中国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加以吸收利用。在人类历史上，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等级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具有历史的进步性。18 世纪，以法国的伏尔泰、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这个时期，欧美文学界也涌现了不少著名的进步文学家，不少作品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宝贵财富。对于资本主义启蒙运动时期进步的东西，利用其合理的东西，批判其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无条件地颂扬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洋资产阶级文化的主张，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不相容的。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涉及了一些外国军事文化方面的东西。他提到法国拿破仑的多数战役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在局部，以优势击劣势，以主动击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从全局看，则是以劣势击败了优势。毛泽东还说，历史上的法国军队进攻俄国时，俄国军队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

拿破仑。并指出："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①]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军事著作，以外国军事文化成果教育抗日军民，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作用，正是借鉴外国文化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成功实践

真理是没有国界的。不加分析地盲目排外是要不得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但是，它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当时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部著作，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确立和成熟的标志。一方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一方是执行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者，看似不能结合，毛泽东却把它们完美地、科学地结合起来了。这个结合的结果，形成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在它指导之下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的实践。这个结合，也是毛泽东本人的信仰与他所面对的中国革命任务的完美的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标志着他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的成熟，标志着他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的思想在理论上的成熟，标志着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成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了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危害。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文化会走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主观地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成为教条主义；另一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07页。

个极端是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外国的东西，全盘西化，全盘资本主义化。这两条道路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在毛泽东看来，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依据中国的特点，采用中国方式。

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力量一直是比较弱小的。中国的资产阶级的人数也比较少。当时的中国，又面临“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蚕食鲸吞，已见效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① 的局面。面对这种需要革命而应当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的状况，悲观失望者有之，盲目蛮干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无所事事者有之，明哲保身者亦有之。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与实践，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指导思想的问题解决了，革命领导阶级的问题解决了，革命依靠力量和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性质、步骤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的问题也解决了。毛泽东还指出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异同，阐明了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大政党在纲领上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容性。在毛泽东主导下，有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问题都圆满完善地解决了。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② 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两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的结合点。这个结合成立

---

① 孙中山：《兴中会宣言》。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47页。

了，中国的其他有关问题一概迎刃而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其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范畴、基本方法、内在逻辑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规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既非原封不动的搬用，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复归。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以他为主导，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另方面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革命性飞跃。

## 五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

在延安，毛泽东说过："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①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为什么要与工农相结合，以及如何与工农相结合。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与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走上了革命道路。

### （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

1939 年 5 月 4 日，在延安召开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他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大的，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

①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59 页。

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① 毛泽东的这段话包括三层意思：第一，毛泽东首先肯定，中国数百万知识分子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不是主力军。单靠这支文化大军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是办不到的。第二，毛泽东又指出，工农大众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发动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必须把全国的人民大众动员起来。“全国人民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② 第三，广大群众必须有人去宣传、发动与组织。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这个任务落在了首先接受革命思想的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判断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与工农民众结合在一起。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只是在口头上表示愿意与工农结合而没有实际行动的，不是真正的革命派。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且能够坚持一贯的，才是真正的革命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把工农群众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深入到工农之中，与他们变成一体，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实上，广大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只能见效于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紧密相结合之中。

---

①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65—566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60页。

### （二）知识分子如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在延安，毛泽东不仅为广大知识分子指明了要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而且指明了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第一，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知识分子要完成宣传、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的任务，首先要有一个到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感情融通的过程。高高在上，不了解工农，其思想深处还看不起工农群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在人民革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广大知识分子必须放下架子，脱掉长衫，以自讨苦吃的精神，迈开双脚，到工农群众中去，与他们共同生活，互相了解，建立感情，在此基础上开展革命工作。知识分子这样做，于国于民于己，都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第二，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要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首先需要体察民情。在深入到群众中间后，如果下车伊始，在两眼一摸黑的情况下就指手划脚，乱发议论，群众是难于接受的。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在群众中，知识分子必须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虚心向群众求教，了解群众的心理状况、现实需要以及风土民情，说话办事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从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出发。这样做，知识分子就能与群众迅速打成一片，成为群众的知心人，成为群众切身利益的代表者。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利于组织和率领广大群众向更高的革命目标前进。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790页。

第三，要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毛泽东说：一切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在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还没有达到真正深入民心的时候，虽然客观上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群众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没有深刻地意识到改革的需要，还不愿意实行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一则加强群众的思想工作，二则必须耐心等待，否则便会脱离群众。毛泽东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①

第四，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知识分子，人民生活是他们创作的唯一源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要到工农兵中去收集素材，进行创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第五，知识分子要做人民大众的"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引用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附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认为，鲁迅所说的"孺子"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告诫知识分子，在与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必须

---

①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20页。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按照党的要求去做。

**（三）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纷纷奔向延安，奔向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广大工农民众相结合，走上了革命道路。敌占区的一些流亡学生，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高。他们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后，许多人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重用。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锻炼成长，成为敌后抗战的优秀宣传者、组织者。一些决心抗日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经过短期的教育训练，立即奔赴敌后抗日战场，与敌后军民一起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广大在敌后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战斗，成为群众中的一员，为群众所爱戴与拥护，成长为优秀的群众工作干部。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作演出了大批反映群众的战斗生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毛泽东所指引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上，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型的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的中坚力量。

## 六、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领导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对文化工作仍十分重视。延安时期，毛泽东说过：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

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段话，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的重视程度。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方面。

### （一）关于尊重知识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涉猎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以其博大精深的丰富知识而为世人所仰慕。毛泽东戎马半生，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一贯重视以可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知识面。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自身知识的同时，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又谆谆教导全党全军，要重视理论学习，重视在实践中学习，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学习。

第一，毛泽东在延安大力倡导理论学习。

毛泽东指出："不应当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进一步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 毛泽东还说，马克思主义的"矢"，要对准中国革命的"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党的领袖毛泽东带领全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鉴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实际需要，毛泽东强调要学习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15页。

的立场和方法。以上三点，是延安时期（以后仍如此）毛泽东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所注重的基本点。

第二，毛泽东一贯注重在实践中学习。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 获得知识不仅靠读书，使用中的现身说法、言传身带，实践中的摸索，可以成为学习中的捷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系统地学习书本知识是必要的。但是，在战争环境中，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干起来再学习"的办法是必须的。而且，在革命战争中，干中学得来的知识，常常较之书本知识更实际，更有威力。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敌方，其军事指挥者多是科班出身的，他们却常常败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将领的手下。其中，有灵活实用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威力，也有干中学的威力。当然，军队掌握文化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的将领们如果有可能全部大幅度提高文化水平，他们的战争指挥艺术将能够达到更高的程度。对于军队的文化学习，毛泽东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足以说明他把文化知识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在延安，毛泽东不仅强调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还倡导学习自然科学。他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

---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81页。

②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1页。

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① 在延安，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着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这是新中国的雏型。为了建设好根据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学习经济工作知识，都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尊重知识，尊重一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所能够应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凡是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到的，他就力倡在实践中将其学到手。这个特点，表现了毛泽东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

第三，毛泽东强调学习要有正确的态度。尊重知识是一回事，能不能获得知识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学习各种知识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毛泽东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②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③ 对待知识保持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学习上从不满足，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这是毛泽东本人对待知识、对待学习的态度，是他的经验之谈。中国古代，颇不乏劝导人们学习的名言警句。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荀子的“锲而不舍”，韩愈的《师说》，都是劝导人们尊重知识的。毛泽东经常引用古代劝学格言阐明尊重知识的道理。1940 年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去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一路上，同前来迎接的邓力群等四

---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91 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 版，第 287 页。

③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35 页。

人边走边谈，了解学员情况。分手时，毛泽东对他们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刘开的一篇著名论文《问说》，也不乏至理名言：“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毛泽东对“问”也是身体力行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这就是问，这也是一种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毛泽东不耻下问，曾就讲话内容详细征求过文化界一些人士的意见。向个别人做调查，这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式，一种学习的方式。毛泽东还主张到社会中学习，拜劳动人民为师。1942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对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们说：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 。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①]毛泽东还说，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按毛泽东的见解，为了求得知识而虚怀若谷，虚心求教，不仅不是不光彩的事情，相反，这是完全应该的和必须做到的。

### （二）关于尊重知识分子

在延安，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

---

① 参见《毛泽东谈文说艺实录》。

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战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① 毛泽东还说，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毛泽东提到的应受到尊重的知识分子，是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是否能够被当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人生价值趋向，取决于他们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这一文化伟人的尊重和爱戴。1937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第一圣人，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称他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称他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还总结了鲁迅三大特点：第一是政治远见；第二是斗争精神；第三是牺牲精神。对此，毛泽东称之为“鲁迅精神”，并且指出，“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鲁迅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树立的一面大旗，他是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在延安，毛泽东对他所接触到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概以礼相待，

---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82—1083 页。

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教育鼓舞下以忘我的精神投入人民革命事业，并将毛泽东所给予的礼遇看作是自己一生的殊荣。

1940 年 6 月初，茅盾刚到延安，毛泽东对他优礼有加，亲自到他住的窑洞去问候。两人长时间畅谈中国古典文学，毛泽东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毛泽东建议茅盾搬到鲁迅艺术学院去。他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罢。茅盾则谦称“旗帜我不够资格”。茅盾搬到鲁艺后，毛泽东又把他接到杨家岭长谈了一次，所谈内容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斗争以及抗战以来文艺运动的发展。[①] 1938 年 3 月，鲁迅的学生肖军到了延安。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处看望。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礼贤下士，谦恭友好，使年轻气盛的肖军深受教育和感动。1941 年下半年，毛泽东请肖军帮助他收集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又请肖三、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和诗人单独或集体座谈，征求了他们对文艺工作者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为革命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

著名女作家丁玲，在前线收到毛泽东为她写的“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词，高兴得忘了行军的疲劳，一连几天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后来丁玲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签发任职命令，委任丁玲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对有畏难情绪的丁玲传授了如何做好这项工作的办法，鼓励丁玲学中干，干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丁玲担任了西北战场抗战服务团团长，领导一批热血青年，在抗战前线建功立业。她深深感到，她在工作中大大得益于毛泽东的教诲和中央警卫团的工作锻炼。

---

① 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 年第一期。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经周恩来介绍认识了著名社会言情和章回小说作家张恨水。毛泽东与张恨水长谈两个多小时，并把延安自制的呢料和陕北特产红枣、小米赠送给他。张恨水用呢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开会宴友都要穿上。他对夫人说："毛先生有渊博的知识，是了不起的人物！"毛泽东很欣赏张恨水的文采，请周恩来将他的词《沁园春·雪》送给张恨水，并希望能得到和作一首。张恨水读后，觉其气势磅礴非同凡响，而不便奉和，遂将此词发表在他主编的《新民报》上，并加按语称这首词"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这首词的发表，轰动了山城重庆。

毛泽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事例举不胜举。他不仅指挥了数百万武装力量，而且调动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文化大军。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下列特点：1. 毛泽东一贯注重文化事业，注重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 毛泽东历来倡导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3. 毛泽东心目中时刻装着人民大众；4. 毛泽东办事情总是注意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和力量。他的这些特点，为当今和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 第三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有志于中国的教育改革，由于时代的召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始终对教育工作十分重视，并把教育当作革命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他集中了党和群众的智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理论，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教育领域的实践。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指示，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 一　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涌现出大批的好干部，并初步形成了党的干部教育体系。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进行，我党不仅需要大量地充实干部队伍，更重要的还要提高干部的理论和政策水平，以适应历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为此，毛泽东发展了过去时期干部教育的经验，提出

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思想。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强调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毛泽东指出：“爱护的办法：第一，指导他们”，“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1939年5月，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号召学习马列主义，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紧接着，中央书记处在1940年1月3日作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其中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② 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宣部合并，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改称中央宣传部，有关干部教育的领导、组织及检查等工作都属于中央宣传部。1941年底，中共中央又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方针的提出，不是对干部教育的一般性改进，而是对干部教育的改革，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贯彻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中共中央采用了脱产集中学习和在职坚持学习两种方式。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26—52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 （一）干部学校的建立是培养抗战干部的主要形式

1936年，全国政治形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指示中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① 1940年，毛泽东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②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从延安到陕甘宁边区，从华北到华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干部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其中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华北联合大学，青年、妇女、民族干部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延安大学，中共西北党校，中共北方局党校，中共华中局党校等等。包括高级干部教育，也包括中级和初级的干部教育。培养、训练的有党、政、军、工、青、妇、医学、文教以及科技等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干部。

延安时期建立了科学的干部教育组织领导机构，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抗战需要的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针和教学制度。学校采用政治教育、理论教育、文化教育和业务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教育卓有成效。尤其是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我国教育实践中的重要贡献。

第一，将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作为延安时期干部教育标准，德

---

① 《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4期，第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69页。

才兼备，以德为先。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的培养。他对干部的要求是："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①

陕北公学是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创办给予很大的关注，并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召开的鲁迅逝世纪念会上作了报告，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完成这历史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又为陕北公学开学典礼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② 毛泽东的讲话，为陕北公学的办学方针指明了道路，从而使它成为一所培养既掌握理论知识，又有斗争实践经验的干部学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5页。

② 《动员》第10期，1937年10月23日出版。

“抗大”是名扬中外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最高军事学府。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题词，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①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② 这个教育方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培养干部要德才兼备的思想。为实现这一教育方针，抗大编制出《抗大组织条令》。条令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学校的师资主要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干部兼任。毛泽东讲授哲学，每周二次，每次四个小时，并亲自参加座谈讨论，历时三个多月，共讲授了110个小时。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学员端正了思想路线，提高了工作水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抗大军事专业教材的主要部分。

延安自然科学院和中国医科大学的成立则说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重视。1940年1月，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毛泽东亲笔为学院题写院名。学院的招生启事写明：本院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的技术人才为目的。学院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革命通才、业务

① 见《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28页。
② 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1939年5月30日《新中华报》。

专家。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规定必须保证政治学习，包括政治理论、时事政策教育、党的组织生活；必须扎实学好基础课，即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和外国语。基础课程的师资由科学造诣较高和教学经验较丰富的学者或教授来讲授，以保教学质量。

中国医科大学是在原八路军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所医科高等学校。自1940年9月正式开学，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到学校视察过，对学校的发展及教育方针作过重要指示。1940年秋，毛泽东为医科大学第十四期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① 为实现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且作风艰苦的现代革命医务人才，医大抓了三方面的教育：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和临床实习。医大重视对学员的政治教育，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反复强调学好业务课的重要性并坚持边学边实践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了大批的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抗日战争年代里，出入火线，救死扶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国医科大学晋察冀分校和晋东南分校。

第二，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干部教育的最基本的原则。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因此，在干部教育上提倡什么学风，可以说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讲授。"两论"不仅是制定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依据，而且是干部学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共中央党校是在延安设立的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其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10月进抵瓦窑堡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迁到延安。1938年10月，毛泽东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他同时告诫大家："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 毛泽东在这里为党校指明了办学方向。1941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1943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直接主持党校的组织与领导工作，并进行教育上的改革，对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不断地加以改造。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批评并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号召党校的同志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说："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③ 在这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53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815页。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的部署下，中央党校进行了三年的整风学习。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由于党校的学习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典型，在一定意义上为延安整风运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推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

成立于1941年8月的延安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其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在马列学院作过报告。并在1941年5月针对延安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同志“理论和实际分离。”指出：“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① 报告强调注重研究现状、注重研究历史，以及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的精神，使马列学院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一度出现的片面重视理论、轻视实际的倾向逐步得到克服。在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题讲话，他指出：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军事、文化、党务等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必要的和应有的结论。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学校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研究要有一个方向性的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99页。

本改变，要从书本中走出去，从机关、教室、书斋走出去，到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中去。张闻天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为贯彻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的作风，他亲自率领调查团，于1942年1月离开延安到陕北的神府、米脂、绥德和晋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次年3月返回延安。在调查过程中，张闻天亲自主持调查会，访问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各个阶层的人物谈话，并收集了有关地租、高利贷等帐薄，查阅了大量的契约、家谱、碑记等材料，最后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写出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由于马列学院坚持以《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为指导方针，充分发扬民主，学员的研究气氛浓厚，取得的成果喜人。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先后编辑出版了由艾思奇主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由范文澜负责编写和编选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国文选》，毛泽东还为《中国国文选》一书写了序言。《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出版，正值1942年4月，及时地配合了延安整风，被列为共产党干部的必读书目之一。中央研究院从建院始，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基本原则，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的办学宗旨，制定了一套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周围环境、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聚集人才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方针，纠正了学院在研究方向上的偏差，从而在较短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有相当研究水平的理论人才。

第三，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延安时期根据地干部教育的重要方针。中国共产党从建立革命根据地起，就在教育工作中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方针。延安时期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在总结与继承土地革命时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丰富与提高。1939年1月和5

月，中共中央曾先后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和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大会之后，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敌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机关干部到各干部学校，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6月，毛泽东发表《反投降提纲》，提出了干部学习与生产结合的制度。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及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并重或偏重。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的领导机关和人员。[①] 这一制度的制定，使延安及其它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无论是机关还是干部学校，打柴、种地、纺线织布，处处可见热烈的劳动场面，远近可听到嘹亮的歌声。

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举行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在讲演中赞扬："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②] 毛泽东的讲话指明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40年5月3日，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一所青年干部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旨在培养具有革命理论武装的、有青年工作特长的区县级以上的青年干部。学校的课程除设置了政治、业务、文化和军事课之外，学生会十分活跃，组织讲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68页。

演、运动会，并下到农村搞宣传活动。春播秋收季节学生们下乡帮助农民播种、收获。他们在生产劳动中，不仅锻炼了意志，尤其增加了同农民的感情。这样做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所讲：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

延安自然科学院从开办始，一直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1940年春接收了一个有七八个工人的油灯工厂，经过充实扩大和改造，组建了一个机械实习工厂，隶属自然科学院。学院规定的办厂方针是：为教学服务，为边区建设服务。学生在实习工厂的劳动，创造出延安地区工业和卫生部门需要的工具、模具等，基本满足了边区军民的需要。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实施，不仅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解决了物质困难的现实问题。1941年前后，抗战处在最困难的阶段，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使日本帝国主义由正面进攻为主转而进攻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此时的根据地环境残酷，生活极度困难，粮食经常处于严重缺乏的地步。面对困难，许多干部学校组织进行生产劳动，或种植粮食、或纺纱织布；或奔走贩运，或编篓织筐，大大改善了学校的物质生活。为了不使学习受到大的影响，学校在农业大忙季节停止上课，专门从事劳动。农闲的季节，组织学员边学习边劳动。这个方针克服了根据地的被动局面，顺利地渡过了难关。

第四，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根据地教育事业胜利的保证。知识分子是人类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革命文化的建设与革命运动的发展离不开革命知识分子。毛泽东十分重视他们在文化、教

育事业中的作用。1939 年 5 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① 同年 12 月，毛泽东又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论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是对知识分子的客观评价，从他们自身的价值和对革命的态度，给他们找到了在革命中的正确位置。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尽管在开始的几年里，根据地的各条战线已经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但形势的发展，斗争的深入，对知识分子的使用还远远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一些干部对知识分子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针对 这一情况，毛泽东提醒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批评那些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干校不敢大量吸收青年学生的现象，号召："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应允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③ 毛泽东的一系列有关知识分子的论述，使我党的干部深刻认识到：文化战线的统一战线是整个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它是联合一切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5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61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68 页。

旧知识分子，团结感化、帮助和教育改造他们，从而为民族的斗争和群众的文化事业服务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还为充实根据地师资队伍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为了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在选择业务课的教师时，请来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和教授。如抗大请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知名人士任教，计有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张庆孚等。陕北公学有张如心、李培芝、徐冰、杨松、何定华、陈唯实、吕骥等。鲁迅艺术文学院则团结、教育、组织了一支坚强的艺术教育队伍，有贺绿汀、何其芳、周立波、沙汀、李焕之等等，有的还担任了学校领导职务。

在相信知识分子的同时，毛泽东提倡知识分子应自觉改造自己，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要到实际斗争中与工农相结合，了解他们，增强对工农的感情。许多知识分子自愿到工农群众中去，到艰苦的斗争中去，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变化。抗日战争时期，这种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趋于成熟，制度也更加完善，吸引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走到抗日队伍中来，在全国的文化界、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二）在职干部教育是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采用干部脱产、集中学习的方式进行的干部学校教育，为根据地的干部培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根据地的迅速发展，紧张的工作和战斗，客观上不允许干部都进专门的学校学习。因此，对在职干部的教育依然是个严重的问题。

1939 年 1 月中央开始制订《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第一期计划），3 月正式公布。5 月 20 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还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和“钻”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

求得问题的了解。从1940年10月起，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多次发出有关在职干部学习、教育的决定，如《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等等。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① 工作的实践也证明了在职学习的重要性。许多干部把学习看得和工作一样重要，由被动学习变成了主动学习。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将在职干部教育分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四种。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领导、编制作了规定：边区政府教育厅下设干部教育科，计划领导各分区、县（市）的在职干部教育；分区、县（市）分别成立分区、县（市）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计划领导同级在职干部教育的一切事宜；区设置区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乡成立乡级在职干部学习小组。由于中共中央对在职干部教育有明确布署和指导，使边区的工作开展得既广泛又深入。

在职干部的学习方法尤其注重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提倡自学为主，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习惯。对学习时间，中央也作了规定：实行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以保证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由于在职干部教育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有切实可行的教育制度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作保证，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收效显著。根据地的人们将在职干部教育喻为一所学员最多、师资最少、设备最差，但成效很大的大学校。

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贯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等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文章，对干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孕育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部，这些优秀干部不仅成为抗战胜利的基本因素，而且在以后的战斗和建设中仍起到栋梁的作用。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

## 二　面向群众的社会教育

### （一）社会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社会教育，亦可称群众教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的方针。为实行这一方针，首先要动员、组织起全国的民众。正如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时所说："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

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① 在此，毛泽东引用了孙中山先生的一段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由此可知，“唤起民众”不仅是历史的客观要求、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且是争取胜利的保证。

社会教育是唤起民众的主要形式，它直接面对社会的广大民众，以工、农、青、妇为主。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除汉奸敌特外，根据地的广大群众都是教育的对象。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人民群众的增多，社会教育的规模、内容、方式也都不断地发展，并创造出许多带有各根据地特色的社会教育经验。

### （二）社会教育的内容

进行抗日民主根据地社会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就是毛泽东阐明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具体地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教育。这就是延安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的性质。

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内容根据形势的需要和群众的实际情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64—56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707、708页。

一般从三个方面展开，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

政治教育主要是时事政策教育。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结合对敌斗争和群众运动经常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如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战初期着重宣传持久战、游击战和团结抗战的道理，发动群众参加救国会、自卫团，实行团结自卫。1941 年至 1942 年间着重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宣传敌后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和前途教育，发动群众坚持反“扫荡”、反投降斗争。通过时事政策教育，根据地的群众增强了民族革命意识，坚定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1941 年编印的《冬学政治教材》，针对当时日军对边区实行空前残酷的“扫荡”，群众中产生的一些思想问题，编排了国民誓约、除奸、爱护八路军三方面的内容。其中国民誓约提出“不屈服，不投降，坚决斗争到底。抱定决心，不受敌人欺骗，不怕困难，不怕流血牺牲，要和鬼子拼到底，把鬼子赶出中国去。万众一条心，齐心协力干，打日本救中国，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夺取最后胜利。”① 誓约有十条，要求国民要记牢，每条的意思都知道：第一条，不做汉奸顺民。第二条，不当敌伪官兵。第三条，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第四条，不替敌人汉奸做事。第五条，不给敌人汉奸粮食。第六条，不买敌人货物。第七条，不用汉奸票子。第八条，爱护抗日军队。第九条，保守军事资财秘密。第十条，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与法令。教材将政治性、针对性、政策性融为一体，通俗易懂。国民誓约日，浩荡的民众列队会场，振臂宣誓，气壮山河的场面催人泪下。

文化教育则以识字为主，开展扫盲运动，随着文化水平的逐

---

①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 408 页。

步提高，增加各方面的文化知识。1939年4月19日，毛泽东为《新中华报》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同时发表了陕甘宁边区《为扫除百万文盲而斗争》的社论。根据地的扫盲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和斗争开展得不平衡，各边区的文化自然状况各有区别。如陕甘宁边区处在抗战后方，环境相对稳定，扫盲工作进展较快。1939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了《消灭文盲三年计划草案》，计划规定三年应消灭文盲18万。1940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新文字扫盲教育运动，以寻找一种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达到扫除文盲的目的，并作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实验。11月7日，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新文字协会，还编印了《新文字报》。

晋察冀边区在几个省交界的山区，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大部分地区在抗战前已在敌伪统治下实施着奴化教育。广大农村学校很少，私塾和教会学校占很大比例，入学儿童只在20%左右。为尽快开展文化教育，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文化教育决议案》，指出：将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列为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决议案还规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普遍设立民众教育机关，建立农、工、妇女等各种补习学校、识字班、夜校等；加强民众宣传，组织宣传团，游击教育团；提倡农村各种娱乐，设俱乐部等。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在那里，三四十岁的农夫趁农活休息之暇，坐在树荫下，把细沙匀平，用手指在沙上练习新学会的字。妇女垦荒团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处处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景象。边区的文化教材，主要由边委会教育处或青救会编写。在编写中，他们一方面注意同群众的生活用字、生产用

字、工作用字相结合，一方面尽可能将抗日的政治内容寓于其中，如有：打日本为什么用游击战等课文。

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本地的特点，编写了许多形式新颖的教材，如：陕甘宁边区的《抗日三字经》，晋察豫的《千字课》识字课本，苏中根据地的《万事通》，晋察冀边区的《识字课本》等等，这些课本内容生动、文字活泼，体现出根据地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抗日到底的决心。

根据地的科学知识教育，一方面是为了向广大民众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把他们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中解救出来；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向群众进行防空、防毒、救护常识，以及生产、生活中的一般知识教育。晋察冀边区常以区或中心村为单位，举办技术训练班，向农民传授有关战争、生产的具体技术。从1942年到1943年，边区所有村庄都组织了地雷训练班，由掌握埋雷技术的县区武装干部作教师，讲授地雷的构造与埋雷的技巧。冀中区地道战开始时，不少地区开办了“地下建设”训练班，传授挖地道的方法。为了提高生产，保障人民生活，五台山地区组织妇女参加训练班，学习纺花、织布技术。科学知识的普及与生产技能的培养，使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使他们逐渐摆脱了封建的束缚，看到了自我的力量。

### （三）社会教育的形式

开展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冬学、识字组、民校、夜校、读报社、图书馆、农村俱乐部等。其中以冬学和民校最为普及。冬学是利用科委的空闲时间，向民众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冬学在西北、华北农村有一定历史基础。抗战前，每年冬季，农民自己组织学习或参加补习学校。抗战后，民主政府发展了这一组织形式，开展了大规模的冬学运动。

冬学有冬学委员会制定的学习计划，有专职教师，并有冬学教材。晋察冀边区的冬学一般在每年10月至来年的一二月间，自1938年第一次以冬学形式开展社会教育以来，年年都有发展。如1939年冀中27个县的统计：冬学由2947处增加到5188处，人数由69826人增加到331621人，相当于1938年的5倍。民校多是在冬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坚持长年办学的民众学校。民校安排学员晚上学习，学员主要是村干部和冬学积极分子。这种形式上的进步，促进了农民的政治教育和扫盲运动，适应了战争和生产的需要，并一直沿用到全国解放。

## 三　适应抗战需要的普通教育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思想是党在成人教育上的一大成功，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教育思想在青少年教育上的成功实践。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包括初小、高小，还有个别的中等师范和职业教育。抗战前根据地的中小学同全国的教育界一样，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不仅使贫苦人家的孩子有了上学的可能，而且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还给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带来了清新气象。毛泽东认为，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教育的性质和任务，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普通教育制度也应随着这一任务而确立。

### （一）改变旧的教育制度，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

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毛泽东提出了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

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①] 8 月 25 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改革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②] 并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③] 在抗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可见改变旧的教育制度迫在眉睫。而在抗日战争中，各根据地在残酷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中，始终能够坚持并发展，原因之一，是与毛泽东抗日教育政策的实施分不开的。

**（二）适应抗战需要，为民族解放事业培养新一代**

抗战开始，国民党采取片面抗战方针，结果一触即溃，大片国土沦丧，学校大多停办。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根据地首先要做的是恢复和新办抗日学校。由于斗争环境恶劣，学校的发展不稳定。从抗战开始到 1940 年以前，学校处于发展的阶段；1940 年以后，势态趋于恶化，多数学校处于收缩阶段；1942 年以后，敌后环境好转，学校教育又有一个大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晋察冀边区原有的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大部分停办，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一成立就积极做恢复工作。到 1938 年 2 月，大多数不直接遭受战火威胁地区的小学开了学。到年底，北岳区 16 个县又建立高级小学 15 处，初级小学 204 处，入学儿童 6945 人。冀中区 26 个县恢复并建立高级小学 76 处，初级小学 3445 处，入学儿童 170360 人，大大超过了抗战前的数字。晋绥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4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56 页。
③ 《解放周刊》第 1 卷，第 15 版。

区的教育事业从新政权成立到1940年10月，19个县恢复完小26所，初小1393所。有高级生735人，初级生61203人。还建立了晋西民族革命中学、永田中学和青年干部学校等。陕甘宁边区1937年春，初级小学320所，到1938年春增为705所。1938年前没有完全小学，为推动与提高边区小学教育，从1938年起到1940年，建完全小学47所，学生1586人。

在恢复、新建中小学的过程中，遇到阻力非常大。有些群众认为：兵荒马乱的，连命都保不住，还念什么书。在日军的“扫荡”中，还有许多学校的教员被捕、被杀，校舍被毁。但是，在党的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思想指引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冲破种种阻力，把各边区普通教育的基础工作做得各有特点又扎扎实实。

关于课程设置。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实施纲要》成为各根据地的指导。纲要中规定：边区小学教育，应依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促进儿童的民族觉悟，养成儿童的民主作风，启发儿童的科学思想，发展儿童的审美观念，提高儿童的劳动兴趣，锻炼儿童的健壮体格，增进儿童生活所必要的知识，培养儿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依斗争环境各根据地各有侧重。抗战初期，主要重政治教育，以提高儿童的民族自信心与抗战必胜的决心。随着抗战的深入，课堂的内容不只是政治道理，而且与战争、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中学的课程设置与小学大不相同。课程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日问题、国际问题、政治常识、妇女问题、军事、工作技术等。其特点是与抗战紧密结合。根据需要，还对学生进行了抗战政策教育，培养学生尊重群众，热爱劳动的品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学生也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创建劳动基地和各种作坊。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速度也很可观。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师范学校，有乡村师范、简易师范、联合师范、地区师范等，多属于初级师范。为小学提供素质好、水平高的师资力量是师范学校的职责。因此，根据地十分重视师范教育。根据地师范学校的教育方针，在《陕甘宁边区暂行师范学校规程草案》中有这样的规定：师范学校为依照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培养健全的地方小学教师及区、乡级文化教育干部之场所。规定的训练原则是：培养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民主的工作作风；养成劳动的习惯；锻炼健全的体格；充实一般的文化知识；给予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技能；培养热心服务教育的精神。其教学方法较一般中学更注重联系社会、联系生活。中央宣传部对职业教育也有明确指示：为了提高边区的生产，改善人民卫生及培养职业教育的师资，提议设立农业学校、畜牧学校、手艺学校、中医学校。这一号召，使各边区和根据地相继办起职业学校，或者在中学设职业班、技术干部训练班；或者办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等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学校。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的诸多文章中所体现出来的全民动员、改革旧的教育体制等思想，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制定普通教育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地实施普通教育成功的保证。之所以说它成功，不仅仅在于根据地的孩子有学上，有饭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弊端，满足了抗战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新的一代。

## 四　军队的训练与教育

抗战爆发后，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培

养教育知识青年的任务十分艰巨。1939 年 7 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阐明了抗大及一切由知识青年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的办理方针。其中要求：把知识青年训练成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八路军的干部；学校的一切工作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教育应当是中心。指示中还强调：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必须大大加强，并提出四条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这个指示明确了抗大教育的基本问题和教育原则，是抗大教育方针的具体化。由于抗大是军事学府，因此，它不同于其它的干部学校，除了应具有一般干部学校的培养教育任务外，还带有它特殊的军事色彩。

继抗大总校成立后，相继在西北、华北、华中开办了 12 所分校和 6 所陆军中学，学员将近 20 万。他们当中有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有八路军、新四军及白区地下党干部，还有大批的从学校中来的知识青年。如何把这支庞大的队伍培养教育成抗战的先锋队，《抗大的组织条令》规定："本校之教育中心基于革命的传统，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救国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抗战的战略战术，使之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在实际生活上锻炼艰苦奋斗的作风，以期在长期抗战过程中间，英勇奋斗，完成革命任务。抗大无论总校还是分校，虽然在教育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教育方针和原则都是一致的。

第一，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1942 年 2 月，《中央军委、军委总政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三号）指出：政治教育包括下列内容：党的策略路线的教育，时事教育与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与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教育。还规定：技术专家之政治学习，除自动看报外，每月召集一次会议，报告时事或党的政策问题；营

团军事干部以时事及策略为主，政治干部加政治工作条例；抗大分校之步兵科及特科之军事干部，须学时事、政策及中国革命问题。总之，指示中强调了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施之于各种干部，包括技术、军事干部等。因此，抗大政治机关和共产党组织定期公布政治工作计划，然后下发到党支部、各队政工人员以及全体教职学员手中。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及时宣讲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并联系当前工作进行动员。启发学员重视理论与研究理论的兴趣，逐渐获得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知识，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通过政治教育，使学员明确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军队干部的职责。

第二，从战争出发，学习军事。对军队干部的教育包括：军事理论教育与技术训练；军事业务（战斗、战役、指挥、战斗勤务、军队管理、参谋业务等）；军事生活训炼，并对课程作了详细安排。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抗大的军事教育重点放在战术的教练，特别是团以下的人员。对战争史和战略学，则配合基本战术教练课程，扼要讲授。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著作，不仅被作为军队的政治教育内容，而且也被视为重要的、生动的军事教材，列为教学的必修课程。军事课程安排有步兵技术、战略学、射击与兵器、测绘、参谋、勤务等等。战术教练特别注意讲和做的密切结合，着重实地演习、图上作业和沙盘作业。

第三，把军队办成人民的军队。按照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抗大对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有这样的说明：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因此，抗大在制定第八期学员的教学计划时，将知识青年队的第一年，安排到农村和连队去参加

实际生活的锻炼与考察，给他们创造接近工农群众的机会。抗大一分校的口号是：把学校办成既是一所干部学校，又是一个民运工作队，更是一支武装战斗队。他们把师生组织起来，编成民运队或工作团，配合当地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开展访问、慰问军烈属，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活动。

除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教育外，抗大及抗大分校还进行文化教育和其它专业教育。对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留守兵团）官兵的日常教育，也是从文化学习、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四个方面进行的。在学习过程中，边区部队将基本的政治教育与策略教育联系起来，革命理论教育与实际行动教育联系起来。使边区部队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上有很大提高。边区部队除对官兵进行日常教育外，还对俘虏兵进行教育。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一所收容、教育日本战俘和投降人员的学校。1940 年 11 月在延安筹办，1941 年 5 月 5 日学校正式开学。学校的办学目的是“对日本兵施行政治教育”，其宗旨是“和平、友爱、正义、勤劳、实践”。这所学校从筹办到结束，历时 5 年，先后在校学习的学员约有 300 人。

纵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活动，不难看出，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我国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分析，因而确定了这一时期正确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毛泽东考察了中国教育的实践，研究、探索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教育事业的道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处理中国教育问题的伟大理论成果，不但有力地指导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宝库增添了新内容。

# 第四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实践活动

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也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步入成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实践活动，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的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内涵、强烈的针对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毛泽东思想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一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内涵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部分散见于此时期的文章、讲话和书信中，集中反映在1942年所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从革命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以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为中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一系列文艺观点。这些文艺观点，涉及到文艺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诸多重要方面，是一笔丰厚的财富。归纳起来，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内容。

## （一）关于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文艺。是他提出了“两个战线”“两种军队”的观点，对其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计。他认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 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 “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只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致使革命的文艺运动同当时的革命战争没有互相结合起来。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斗争。”

毛泽东关于文武两个战线、两种军队、两种武器的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共产党还在苏区的时候，由于革命任务和环境所决定，毛泽东强调的是 军事战线，依靠的是拿枪的军队。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任务迫在眉睫，而这一任务，仅仅依靠武装斗争不能完成。毛泽东的目光敏锐地注视着文艺，对革命文艺运动，特别是对同革命战争完全结合起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给予了前所未有充分估评。

早在 1936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毛泽东就称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47 页。

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他说，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组织起来，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他在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①]1937 年 8 月 15 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要求团员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②] 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殊途同归，目的是要用两面夹击的方式使日寇覆灭。从这些论述和演讲中可见，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份强调到错误的程度。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毛泽东赞同列宁关于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观点，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这就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既然革命文艺是“齿轮和螺丝”，它和别的重要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对于整个机器是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它，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

在论述党的文艺工作和整个革命事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

---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2 页，艾克恩编，1987 年 1 月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

②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28 页。

响于政治。”① 这里所谓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在当时主要是指抗日。联系上下文的意思全面领会不难看出，它所言“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阶级和政治路线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是指文艺具有阶级属性和政治属性。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问题，在当时情况下，文艺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要为抗战建国的总路线服务，是自然的，也是正确的。当然，“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并不那么准确，特别是对这一提法的狭窄理解、片面强调，对解放后的文艺也曾起过不良影响。但我们认为，像这样个别不准确的具体提法，出现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既不足为怪，也当视为瑕不掩玉。

### （二）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讲话》所言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② 说它是“根本的问题”，乃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不易解决；说他是“原则的问题”，乃是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方向和性质。在阶级社会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决定其阶级性的关键因素是看它为什么人。为地主阶级的文艺叫做封建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的文艺，叫做资产阶级的文艺，为帝国主义者的文艺，叫做汉奸文艺。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区别于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

无产阶级的文艺应当为什么人呢？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为人民”。革命文艺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人民大众”。这就是说，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57页。

于革命文艺来说，继承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遗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目的是“为了人民大众”，改造过去时代旧文学形式，加进新内容，目的还是“为了人民大众”，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上四种人，工人是革命领导阶级，农民是革命中最坚决最广大的同盟军，兵士是武装起来的工农，革命战争的主力，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占了全国人口的 90%以上，当然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当然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① 毛泽东还告诫人们，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当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其实“为工农兵”也就是“为人民”的同义语，“为工农兵”是毛泽东根据当时情况“为人民”所作的具体说明。今天，由于革命任务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再继续沿用“为工农兵”的口号自然不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文艺为什么人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文艺为人民的方向和目的都是正确的。

### （三）关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转变立足点问题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63 页。

且是一个文艺实践的问题，不能只挂有口头上，而要落实在行动上。为此，首先要解决立足点问题。转移立足点，是革命文艺工作者实现文艺为人民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① 这是因为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不可能真正为革命的工农兵服务，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比工农兵还重要，他们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在他们当中找朋友，着重表现他们；他们同小资产阶级情趣相近，因而对小资产阶级寄予满腔同情，甚至原谅鼓吹他们的缺点。实际上，这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对于工农兵，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研究，缺少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爱他们的感情、姿态和萌芽状态的文艺，甚至公开表示鄙弃。毛泽东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与文艺工作者立足点问题的这种透彻精辟的分析，同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思想是一致的。你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无论时间怎样长，立足点问题必须解决，"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②

怎样才能把立足点转移过来呢？毛泽东提出了两条途径，这就是"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57页。

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转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① 在这里，首先是要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那么，第一位的工作就是要了解他们，懂得他们。对他们不熟悉、不懂，自然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所谓不熟，是指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所谓不懂，是指对人民群众丰富的语言不懂。所谓英雄无用武之地，是指你讲的一大套道理，群众不赏识。怎样才能又熟、又懂、英雄有用武之地呢？毛泽东指出，你要群众了解你，你就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否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都是格格不入的。

### （四）关于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

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是《讲话》提出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在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回答“怎样去服务”时，首先必须解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当作基本问题提出来，还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存在一些糊涂观念，有些同志是相当地或者是严重地轻视和忽视了普及，而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其结果，必然是脱离当时革命的总任务，脱离工农兵，脱离人民。

毛泽东在《讲话》中深入地阐述了文艺工作中普及与提高的正确标准和辩证关系。所谓普及与提高的标准，也就是指确定普及与提高关系的出发点和目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来说，对待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正确标准是：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57页。

务。在这里，出发点是工农兵，目的还是工农兵。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只有用这个正确的标准来衡量，才能正确决定普及与提高的位置，才能找到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用什么向工农兵普及呢？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向他们普及。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工农兵呢？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比如一桶水，是从地上去提高，而不是从空中去提高。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① 这个论断既是从当时的革命任务和工农兵的现实出发的，又具有普遍意义。普及的东西比较浅显，容易为人民大众所迅速接受，迅速流传。1942 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的艰苦斗争年代，广大工农兵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的斗争，抗日的战士迫切要求用他们所易于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以便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地去同敌人作斗争。从广大工农兵的角度看，由于长期受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启蒙运动，他们第一步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把普及工作的任务摆在更迫切的地位，并不是不要提高。问题在于“提高和普及统一”。所谓提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一是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干部所需要的提高，文艺工作者所需要的提高。在论证普及和提高的辩证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228 页。

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①]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去提高，也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就是普及与提高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确定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之后，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说，应当重视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宝贵的。而且，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当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 队和农村的通讯文学，应当和在群众中做普及工作的同志发生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同时向他们学习，注意吸收由群众中来的营养，充实和丰富自己，才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生气、毫无内容的空中楼阁。

### （五）关于文学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文学艺术种类繁多。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虽然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虽然社会生活较之文学艺术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文学艺术并不等于社会生活。革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2页。

的文艺是把到处存在着的事实，人们看得很平淡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以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作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因而，毛泽东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就更带普遍性。”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人类生活当作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所谓唯一，就是说只能有这样的源泉，不存在第二个源泉。对于此时此地的文艺工作者来说，过去的文艺作品，包括书本上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都不是源，而是流。这些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从他们根据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今人只能继承借鉴，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而决不能将这些作品当成自己进行创作的源泉，毫无批判地硬搬模仿，决不能替代自己的创造。正因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所以，毛泽东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是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嘱咐他的儿子万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1页。

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①

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呢？毛泽东说，唯物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世界是没有超阶级的功利主义的，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以占全人口 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② 到人民群众这个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吸收营养，创造出为人民服务，受人民欢迎的文艺作品，这种革命的功利主义，当然值得大力提倡。

### （六）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文艺批评是发展文艺的重要手段，是促进文艺发展的繁荣的主要形式。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使其得到健康的正确的发展，首先要明确基本的批评标准。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进行了集中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标准，一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进进步的东西，便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团结和抗日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凡文艺批评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好的、美的。那么，应当如何来判断作品的好坏美丑，究竟是看作家的动机，还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60—8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64—865 页。

是看作品的效果呢？毛泽东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有为大众的良好动机，你就应当顾及效果；不顾及效果也就很难实现良好的动机。为个人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不受大众欢迎、对大众无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他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① 毛泽东还以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为例，说明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的关系如何呢？毛泽东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政治和艺术是有区别的，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第二，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第三，我们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是有害的，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没有力量。因此，毛泽东指出，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有“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艺批评不但需要积极开展，而且需要正确地进行。正确进行文艺批评的目的，是要使低级的艺术品逐渐提高成为高级的艺术品，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8页。

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毛泽东指出当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忽视政治的倾向，一是忽视艺术的倾向。对于忽视艺术的倾向，应该注意艺术提高，对于错误的政治倾向，更必须引起注意。他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糊涂看法，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的超阶级博爱观，对于歌颂与暴露关系上存在的糊涂观念，进行了深入的评论。他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统一的“人类之爱”，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怎样歌颂，怎样暴露，也有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他指出，你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当然，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不等于不写他们的缺点。人民大众是有缺点的，对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① 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的这些见解是相当精辟的。

### （七）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中，都谈到了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对于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不论是古代的，外国的，毛泽东都主张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创造作品时的借鉴。这里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应当继承。他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72页。

东西。他还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许多珍品。对于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任务，有这个借鉴与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第二，继承和借鉴不等于硬搬和模仿。“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的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① 正确的态度是，对于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不论是古代的、外国的，都应当“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第三，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作为我们创造此时此地作品时了解人民生活中文学艺术原料的借鉴。总之，继承和借鉴是必要的。但继承和借鉴决不是为替代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创造是不能替代的，继承和借鉴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创造。

## 二　毛泽东的文艺实践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和诗人。延安时期，他的文艺实践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既有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而做出的杰出贡献，又有热情关怀作家、精心指导文艺批评的大量活动，还有自己写诗做文的创作实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60页。

### （一）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和党的文艺政策奠基

五四以后兴起的革命文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更需要动员一切力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运动之中，需要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共赴国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去拼搏。文学艺术在宣传民众、组织民众、鼓舞民众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文学艺术应该而且能够成为抗日救亡的先锋。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使中华民族遭到了空前的大灾难。这种灾难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随着大城市相继沦陷，中国的文化中心被破坏了，文化人相继离乡背井，移至内地；中华民族的进步文化受到毁灭性浩劫，特别是在那些被敌人侵占的城市，成千上万的进步书籍被焚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艰苦的条件下，中华文化界人士大抵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用文艺作武器去投身于抗战的洪流。

但是，当时的文艺界也存在许多遗憾，妨碍了文艺担负起抗日救亡的任务。1938 年 5 月 22 日，《解放》第 39 期发表了题为《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意见》例举当时文化界存在的问题有：有些人疏忽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特点，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了解，用简单的“否认”旧文化的空洞口号来代替具体的、最需要耐心的、复杂的、接近人民大众的文化工作；有些人把文化当成“超人”的东西，当成孤芳自赏的东西，当成与人民大众无关的东西，或厌恶与人民大众接近的文化，或把“大众文化”当成概念式的口头禅；有些人把文化从抗战中孤立出来，不了解文化存亡与民族存亡的关系，反对把文化服从于抗战；有些人不喜欢新时代知识的书籍杂志，不了解这是唤起国民觉醒的重要工具，不愿意去创造这种东西以供大众抗敌和改造自己生活的需要。以

上种种，与抗战救亡对文艺工作的需要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这些问题不解决，事实上文化界就不可能在抗战中坚守自己的岗位，也就等于放弃了革命文艺在民族抗战中应负的责任。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战以来，它已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的文化随着边区的革命而发展。边区的文化运动在抗战爆发后迅速发展起来，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绩表现在：从数量上看，产生了大量的作品。据边区美术救亡协会 1940 年初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以来的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等创作，数量在 3500 件以上；音乐创作从小调到大合唱共 300 个以上；戏剧作品，由活报、杂要到二三幕的大戏，共 100 种以上。诗歌、小说、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从质量方面看，边区的艺术界大胆尝试了利用各种形式；创作中摒弃了艺术至上主义的无病呻吟，以抗战现实为内容；提高了边区、特别是延安干部和群众的鉴赏水平；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足为全国模范的抗战文艺作品。边区不愧为模范边区，这是本质的一面，主流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在全国的文化出现倒退逆流，复古的、反民主的、破坏团结的、甚至主张和平妥协的言论在文化市场上大大流行起来的时候，边区的文化运动也受到影响，遇到困难。在已经产生的作品中，能够最具体最灵活地反映现实的还不多；公式化或接近于公式化的毛病还存在；艺术工作者和现实斗争生活还接触得不够，大多未能亲自深入体验民族战斗的实际生活；不注意不善于表现工农兵，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或歪曲工农兵的作品；在文艺理论争论中，反映出许多模糊和混乱的观点。总之，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轻视普及和宗派主义情绪存在，“暴露黑暗”、“演大戏”等关门提高的不良倾向抬头。

抗战时局的发展越来越迫切要求延安的文艺更加有所作为，而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又严重地阻碍了延安文艺的发展。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系列糊涂观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个涉及到延安文艺发展方向的根本问题，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约请诗人艾青去叙谈时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① 毛泽东以革命家特有的敏锐和高瞻远瞩，及时地、牢牢地抓住这个问题，并着手解决。他亲自关心文艺界的创作、演出和文艺批评，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多方搜集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寻找症结，以便着手解决。

为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作了充分的准备。1942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请舒群等人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人员名单，并作了补充，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邀集延安百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座谈全。座谈会于 5 月 2 日如期召开，毛泽东作"引言"报告。5 月 16 日是大会发言，会上展开了争论；5 月 23 日的大会由毛泽东作"结论"报告，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应运而生了。它为马克思主义文艺中国化和党的文艺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在《讲话》中讲的两个基本问题——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正是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问题之症结所在。1979 年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时曾对毛泽东为什么要讲这两个问题作了一个很中肯的说明。抗战开始之后，无数的艺术家、剧团、演出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355 页。

队、知识分子从国统区的大城市辗转来到延安，其中不少人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他们到了延安，到了一个新地区，这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很落后，却是一个新时代，工农兵掌权的时代。可是，许多文艺工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在他们面前有一个熟悉工农兵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候的思想，以为工农兵头脑简单，没有什么可写的，老是想着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东西，要和文艺界往来，还要过那种生活。总之，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种状况跟新的时代、新的群众脉搏很不协调。特别是在延安被封锁、处于反共高潮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愿望与现实之间的格格不入就越来越突出了。要从根子上解决这种格格不入，便是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初衷，也是《讲话》讲两个基本问题的依据。

《讲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无论是在苏区、在白区，还是在国外，都发生了很大反响。《讲话》之前，延安文艺界也深入生活，如1939年民众剧团“羽毛未丰”时，就在团长柯仲平的带领下为各地群众演出，步行2500里，人称“小长征”。但《讲话》前，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面还不广，目的还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搜集写作材料。1943年3月10日，《讲话》的部分内容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前夕，中共中央文委、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人开会，动员作家“深入群众，改造自己”，“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会后，延安作家纷纷下乡，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诗人艾青、肖三，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作家陈荒煤赴延安县工作，高原、柳青出发到陇东；刘白羽、丁玲及其他文艺工作者也相继下基层，很显然，这次深入生活的运动，较之《讲话》前，其面广泛，为工农兵服务、转移立 足点的目的更明确，也更自觉。此后，由于中央大力提倡，政

策明文规定，作家深入生活后的丰硕成果，使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成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必修课”，并因此带来了延安文艺繁荣的新时期。

1944 年 1 月 1 日，即《讲话》在延安全文公开发表后两个多月，《新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首次在国统区摘要发表了《讲话》。4 月，党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去重庆，向大后方的进步文艺界传达《讲话》，并调查国统区文艺情况。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虽然日理万机，仍花费精力领导进步文艺界学习《讲话》，号召国统区的作家学习延安文艺运动的先进经验。《讲话》在国统区文艺的思想论争和文艺创作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正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指出的，《讲话》使“国统区的文艺思想渐渐有了向前进的正确轨道”。《讲话》成为整个中国进步文艺的战斗纲领。

《讲话》在海外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945 年 12 月，朝鲜咸镜南道就出版了朝文译本；1946 年，《讲话》的日文本问世；1950 年左右，《讲话》在印度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讲话》开始在西方出版，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英文、波兰文、捷克文、匈亚利文、意大利文、古巴文、巴西文、俄文、保加利亚文、罗马尼亚文、越南文、瑞典文、芬兰文等相继问世。《讲话》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发表评论。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福克马在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中谈到：在 1942 年那样紧张复杂的工作条件下来抓文艺理论，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文艺，“在西方，还很难找到一位政治家对文艺有如此高的期望。”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尔参考 80 余种中外《讲话》版本，用英文翻译了《讲话》，由美国密西根大学出版。他为本书写了 42 页长篇导言，称毛泽东是“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

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说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高于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担任蒙古作协主席的著名诗人小说家达母丁苏伦在题为《文艺工作者战斗纲领》一文中写道：“它不是古圣贤的珍宝，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纲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给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也给世界各国的先进文艺工作者和蒙古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密切结合实际的工作方向。”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写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读一遍这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定会发现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个二、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① 毛泽东的《讲话》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文献。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构架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的中国化和党的文艺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它是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最精彩的篇章。从此之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出现了历史性的繁荣。

### （二）热情关怀作家、艺术家，精心指导文艺批评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和革命团体内部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②这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写下的名言。他又在《讲话》中提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③

---

① 《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讲话在海外的影响》，孙国林、曹桂芳编著，1992 年 4 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第 85—9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5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868 页。

并提出正确开展文艺批评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不但理论精深，而且率先垂范。毛泽东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其文艺理论的实践和补充。他通过书信、个别交谈、撰文等多种形式，对作家作品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评论。其评论之多，之深刻，之坦诚，委实令人感动，固而留下了许多佳话。毛泽东的文艺批评，实践了他为无产阶级文艺制订的基本原则，又反过来丰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准确地说，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既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实践，又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补充，其本身就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率先垂范开展文艺批评，具有以下九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特别重视政治标准，大力提倡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还是音乐、美术，概莫能外。1938 年，鲁艺文学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业余文学团体，取名“路社”。9 月，新成立的“路社”组织诗歌座谈会。毛泽东致函座谈会，信中说：“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1938 年 6 月 17 日，“毛泽东在看了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主任肖三的一本诗稿后，给肖三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他读了“大作以后”，“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1944 年 6 月 30 日，作家丁玲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报告文学《田保霖》，欧阳山写出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文章的题材都是写合作社的。《田保霖》记述了陕北靖边县新城区民办合作社主任的先进事迹；《活在新社会里》记述了合作社英雄刘建章的故事。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后反映新生活、新主人公的作品，引起了毛泽东极大兴趣。他在当天洗澡

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第二天（7 月 1 日）天快亮，他提笔给两位作者写信，抑制不住的喜悦流露在字里行间。信中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下午，毛泽东又专门派人送信给两位作家，还请他们吃饭。进餐时，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后来在延安的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对大家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第二，不排斥写古人、演古戏，但要用历史唯物观，要有益于革命。毛泽东主张文艺要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并不排斥写古人。但他要求写古人要反映历史的真实，恢复历史的面目，要有益于革命。毛泽东这一观点表现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看过平剧《逼上梁山》后对该剧的评论。1944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看完《逼上梁山》，不顾疲倦，在午夜灯下给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他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①

1945 年 2 月 22 日，延安评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该剧说的是《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们攻打恶霸祝朝奉的故事。这部戏是继《逼上梁山》后评剧贯彻新方向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它从始

---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481 页。

至终是在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诞生的，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思想的体现。创作人员从毛泽东处借到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开始构思，几易其稿，历时七个月。1 月 26 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彩排。毛泽东说过："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打了胜仗。"《三打祝家庄》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确定指导精神和主题思想的。《三打祝家庄》公演后，受到赞誉。毛泽东又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们祝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第三，重视树立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型。毛泽东重视普及，也重视提高。为了能让艺术家们学习借鉴优秀作品的写作技巧，同时开阔延安观众的视野，提高鉴赏水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还提倡引进一些国统区和外国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文艺作品。据 1939 年 12 月 6 日报载，毛泽东把负责这一工作的张庚找去，说延安也应当演一点国统区名家的作品，曹禺的《日出》就可以演。他还提出应当集中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演好戏还应当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排练。《日出》很快便在延安公演了，产生了轰动效应。据 1940 年 1 月 17 日报载，《日出》自元旦演出以来，8 天内观众达万人，获得一致好评。毛泽东、张闻天对于这部戏很赏识，由衷地赞许曹禺先生。

1944 年，肖三译出了苏联 A·考涅楚克获斯大林奖金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作品中戈尔洛夫大将军是一个无知、迂滞、顽

固、不愿追随军事科学发展的人，而这一切又隐藏在傲慢和虚伪的自尊自大下面，结果垮台了。剧本针对这些指挥官的所作所为予以辛辣而严肃的批判，号召人们同骄傲、顽固、夸耀作斗争。作者通过剧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工程师米朗的口说："人民欢迎和要求懂事的和聪明的领导者。"无疑，这是一部极富典型性和教育意义的作品。经毛泽东建议，这部剧作全文在《解放日报》连载，共载了8天。《解放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称赞这部剧"价值无可比拟"，公演有很大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教育出许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并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寇，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第四，强调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大力扶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家作品。1937年8月，丁玲、吴奚如等作家，为加强抗日战地服务工作，联合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参加《母亲》、《回春之曲》演出的主要演员及青年三十余人，组成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任主任。毛泽东多次对丁玲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到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他要求服务团在"宣传上要作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他还说："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的倡议和扶持下建立起来的。那是1938年的4月间，陕甘宁 边区工人 代表大会举办晚会，演出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戏。边区的群众爱看、爱听、爱唱自己祖传下来的秦腔。老百姓打扮前来看戏，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男女老少把个剧场挤得满满的。毛泽东主席也来看戏了。见到如此盛况空前的情景，他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

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陈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他又对在场的柯仲平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根据主席的指示精神，柯仲平开始筹建剧团，自任团长。剧团组织起来后，毛主席给了300元钱买毛驴和气灯。贺龙从晋西北回来给了20块法币。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飞回来，每人给了50元法币。后来，贺龙、张鼎臣又特意把缴获日军的战利品带给剧团。毛泽东关注着剧团的发展，他在看了剧团演出的《中国拳头》后，亲笔题写“简单、明了、动人”六个字；看了话剧《国魂》后，建议将该剧改为秦腔，并易名为《中国魂》。

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民众剧团迅速成长，成绩裴然。1943年秋，毛泽东邀请剧团负责人到枣园一见。会见时，毛泽东称赞他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称赞民众剧团和抗战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剧目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对中国的民间艺术，毛泽东很重视。他提倡作家“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好好看书学习”，“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对于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毛泽东爱看爱听。韩起祥是个盲艺人，书说得特别好，深受延安老百姓喜受。有一次，毛泽东特别请他去说书。得知毛主席要听他说书，韩起祥高兴得换上新衣、背上三弦便快步来到中央大礼堂。毛泽东听完韩起祥说书，握住他的手说：新书要推向全国去，鼓励韩起祥好好带徒弟，培养曲艺的接班人。

第五，强调革命之风，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对文风问题很重视。他不但将文风归入三风之一，列入1942年整风范围，而且将革命文风贯穿于自己的写作和文艺批评之中。以《讲话》为例。这

篇讲话是1942年5月在延安讲的，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从准备到最后成文，历时一年有余，可见其精益求精，慎之又慎。毛泽东不但对涉及方针政策性的文章慎重发表，对于文字、标点，也一丝不苟。1938年，毛泽东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修改完毕后，将手稿交给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郭化若时附了一封信。信中言道："第一节最后修改完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字。"事情发生在严酷的抗日战争环境里，发生在肩负重任、日理万机的领袖身上，不能不令人钦佩了。

对好文风大加赞扬，对不好的文风严肃批评，是毛泽东提倡革命文风的一种手段。《解放日报》创办初期存在党性不强，反映群众活动不够的弱点，1941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读了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后，特意写了一段批语。对文章给予极高评价："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同时，毛泽东又在批语中针对时弊尖锐地批评脱离实际的坏作风，指出，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类党八股"。毛泽东的这段批示，发表在1941年9月14日的《解放日报》上，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革命文风的爱和对党八股的憎。

反对党八股、打击党八股，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陕甘宁政府秘书长周文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改革之风的建议。毛泽东于收到信的当天——1942年2月1日致函周文。信中肯定周文

的意见“很对”，并告已将信转中宣部、《解放日报》各同志一阅。毛泽东还在信中告诉周文：“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门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痛陈党八股之罪状，狠狠打击党八股，为革命文风鸣锣开道。

第六，用讨论的方法，商量的态度，循循善诱地帮助文艺工作者。抗战初期，延安有两支文艺队伍，一支是“上海亭子间来的队伍”，一支是“山上的队伍”。由于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发生变化，文艺工作者要用文艺作武器为抗战服务。这对两支队伍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实现立足点的转移，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转变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思想，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是重视的。但他并不采用生硬的、训斥的态度，而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从爱护作家出发，用满腔热情去帮助，其循循善诱、坦诚平等，十分感人。

1941 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肖军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延安存在的无数坏现象，以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其中，含有不全面、不正确的看法。毛泽东于 8 月 2 日给肖军回了一封信，信中首先坦诚地告诉肖军，“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接着，他肯定肖军看法中的正确一面：“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当改正。”然后，指出肖军看法中不正确的或应引起注意的一面，“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整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痛苦甚大。”最后再次

说明，信中开诚布公地谈这些问题，是因为“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并表示，如肖军同意，还愿与他再谈一回。细细咀嚼这一封短信，耐人寻味，亲切感人，至诚之心跃然纸上。看得出，毛泽东写这封200余字的信，是斟酌再三的，有肯定，有否定，有劝告，有希望，既指出了问题之所在，又充分考虑了对方的接受程度。

对艺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大多采用研讨的方法，说服的方法，不以势压人、以高位压人。1942年2月15日，延安美协在军人俱乐部主办了讽刺画展，展出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位专家的60余幅作品。这些作品揭发了生活中“那些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一幅幅妙趣横生，切中要害。毛泽东在画展的第三天莅会参观，并对作者予以赞扬、勉励。事后的一天，他邀请三位画家到枣园谈意见。有一幅画是华君武作的，题名曰《一九三九年新植的树林》，画面上的树长得不好。这幅画显然是为讽刺种树不顾及效果者而作。毛泽东认为，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植的树都说成是不好的，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了。他问华君武：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画一幅长得好的，欣欣向荣，叫人学的，画一幅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啃光的，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回答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接着，华君武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了，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不是交给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华君武问毛泽东，这样的画能不能画？毛泽东回答，这样的漫话在鲁艺内部可以画，也可以展出，而

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边区的报上，要慎重，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更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他说，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以上这幅领袖和画家平等、和谐地探讨艺术问题的生活画面，该是多么动人！

毛泽东常常看发表在延安报刊上的文章，及时给予指导。1942年6月12日，毛主席给作家罗峰写信，说他已经读过了作者自1941年3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指《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是好的，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其余的文章和这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有些不明朗化，有些论点似乎有毛病。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以考虑，为盼！"完全是商量的口气，字里行间，并无一点强迫接受的意思。

对于同志，即使写了有错误的作品，毛泽东决不采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1942年3月9日，作家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将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发泄出来，自然不妥，有错误，作家自己也承认。第一次高干学习的总结会上，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只在中央研究院的会上作了一次检讨，组织上未受任何处分。

以上六个方面的简述，已经充分展示了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主席，对作家的关怀是多么热情而无微不至，对文艺批评是多么重视而精心指导，这种热情、这种精心，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延安文艺批评健康蓬勃的发展，进一步给予文艺繁荣以积极的影

响。

### （三）喜爱诗文，留下千古绝唱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文章大师和诗人。他一生写了数百篇文章，数十首诗词，记述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足迹，留下了不少流传后世的佳作。他写的文章、诗词，除内容的博大精深外，本身就是实践其文艺思想的典范。其中，延安时期的文章和诗词又独具风韵，各领风骚。

第一，泼墨作文，写出了指导当代、留传后世的政论华章。

毛泽东提倡干部“能看能写”。他在1941年9月14日为《文化课本》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也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①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领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恐怕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善写文章“这个基础”不无关系。

毛泽东的文章，多为政论性的，延安时期亦然。这自然是由其领袖的地位和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所决定的，他没有也不可能去做那些抒发闲情逸致的作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的150篇文章中，延安时期100篇以上。这些文章，现实指导性强，内容博大精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风清新生动，堪称楷模。

第二，赋诗言志抒怀。

---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279页。

毛泽东不但文章写得漂亮，诗词也出色。从青年时代他便对诗词，主要是旧体诗产生了兴趣。从1925年写出《沁园春·长沙》这样非凡的作品以来，不论革命形势如何变化，环境怎样险恶，他始终与诗结有不解之缘。他喜欢读诗写诗，在战斗间隙、工作之余，甚至在征途上无纸笔时也能“于马背上哼成”。他既有革命的壮怀，又有诗人火热的心和激情，毛泽东无愧于“革命家和诗人”的称号。

对毛泽东来说，诗不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抒发心志的手段。他主张“诗言志”。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实现了“和平建国”方针。在渝期间，他曾给诗人徐迟题词：“诗言志”。“诗言志”的意思是主张诗歌要有内容，应表达自己的心志。“诗言志”三个字，就是毛泽东的诗歌创作理论，也是其诗歌创作实践的重要特色。

毛泽东一生创作了数百首诗词，已公开发表的就有50首。这些诗词中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精品，是立足深厚生活底蕴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得益彰的佳作。他的诗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活泼，无一不是言志抒情的。如若将毛泽东诗词连起来，简直就是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

1935年10月，在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率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豪情满怀，接连创作了《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这些诗词既写景，又写意，意境很美，气势不凡，创造了烩炙人口的精彩佳句，表达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对革命胜利充满的无限的信心。

第三，适时组织集体创作，培育了史诗般的不朽作品《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上海字林西报曾登载过这样的话，大意是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这位帝国主义代言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破例惊呼红军的奇迹，但又恶意嘲笑红军的粗陋无文。于是，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受到刺激，便萌发了编写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书，并开始策划。最初计划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的日记，由几个人负责编写。但被指定写的人很忙，无暇顾及，一直延宕到8月。现实状况迫使改变原计划，将由几个人负责写，改为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发出征稿电文和信。征文启事说，现在有极好的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由各首长动员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民俗、奇闻轶事，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于9月5日前汇交总政治部。组稿电文最后指出，“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以毛泽东、杨尚昆名义发出的电报和信，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解放》一卷三期（1937年5月11日）刊登丁玲的文章《文艺在苏区》记载了当时来稿盛况。征稿启事发出后，组织者也无一点把握，可在忧心忡忡之中，却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腊光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游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的，都伸开四肢，躺到了编辑的桌上。几百只手在一些没桌子的地方，在小小的油灯下写成的稿子寄来了，集了一尺高、两尺高。乞至十月底，编辑收到稿件200篇以上，约50万字。写稿者中，有1/3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

都是“桓桓武夫”和从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同年底，中国文艺协会的丁玲、成仿吾等担任红军历史编委会委员，对我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红军长征记》进行了艰苦的编校工作。丁玲写道：“于是，编辑的人失去了睡眠，日夜整理，誊清着这些出乎意外，写得美好的文章，从出发前写起，一直写到陕北。一段一段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夜渡乌江，抢渡大渡河，娄山关前后，再占遵义，有声有色地被描绘了出来。1937 年 2 月 22 日，经过主编的努力，30 万字的巨著完工。编辑在《关于编辑的经过》一文中写道：“现在这部破世界纪录的伟大史诗，终于在数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写出来了，这是要使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失惊的，同时也是给了他一个刻骨的嘲弄。”

《红军长征记》的确是一部不平凡的著作，其作者之多，其反映生活之真实，其史诗般的力量，恐怕都是举世无双的。同时还必须这样说，没有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发文征稿，在当时条件下，这部巨著是难以成功的。《红军长征记》编好后，没有立即付排，直到 1942 年 11 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宣传部在延安出版。

除了《红军长征记》，毛泽东和朱德还于 1937 年 5 月 10 日发出过征集红军历史资料的通知，旨在大规模地编辑十年来全国红军战史，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十周年。1939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肖劲光给新四军各总部机关发电报《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作为对外宣传、对内教育的材料，并提出，今后军政杂志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这些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报道，在革命进程中起到了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

## 三　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的延安文艺

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特别是《讲话》发表后，文艺在延安、在解放区发生了革命性的、质的飞跃，真正新的属于人民的文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观。延安文艺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延安文艺运动发生了革命性的质变主要表现在：其一，广大文艺工作者遵循《讲话》的精神，纷纷下基层、上前线，深入工农兵，真正开始了文艺与现实生活结合、文艺工作者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苦心探索。这种探索、这种磨炼，是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首的进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理想。这种探索，这种磨炼，使文艺家的世界观、立足点发生转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开掘了文艺创作的丰富源泉。

其二，正因为延安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实践了《讲话》为新中国文艺指出的方向，延安各种文艺创作出现了全新的面貌，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的语言。据周扬依据《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 177 篇作品主题所作的粗略统计：写抗日战争、人民战争与人民军队的 101 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的 41 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 16 篇；写历史题材的 7 篇；其他 12 篇。这一组数字，是解放区文艺面貌的缩影，也反映出了延安文艺面貌的轮廓。这种新面貌，有力地发挥了文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

其三，实践证明，延安文艺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结出了丰硕之果。一大批革命文

艺家脱颖而出，一大批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佳作相继问世。延安文艺运动，开中国无产阶级文艺之伟业，创革命文艺百花争艳之盛世。

蓬勃发展的延安文艺运动是广泛的、全面的。它既包括各种门类的文艺创作，如戏剧、诗歌、小说、音乐、美术、木刻，又包括文艺批评；既包括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成果，又包括生动活泼的群众民间文艺。这些成果都是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它们各具特点，交相辉映，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它们的成功和经验，又丰富了延安文艺运动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 （一）延安文艺运动中的戏剧

戏剧在延安文艺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视戏剧、繁荣批评，是延安文艺生活中的一个特点。延安人喜欢看戏，特别喜爱秦腔，它是延安戏剧运动发展的群众基础。

30年代初，延安的戏剧很落后。没有健全的组织，戏剧内容陈旧，甚至带有封建、迷信、色情的成份。毛泽东，党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讲话》之后，边区文艺协会、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等边区的文艺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人民抗日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部队的峰火剧团、陕甘宁边区文协领导的三个艺术团体：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延安杂剧团，延安平剧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相继应运而生。延安戏剧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1943年3月22日，中央文委开会讨论戏剧运动方针问题，会议确定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剧运总方针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这标志着边区戏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戏剧改革是延安戏剧运动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重要一环。延安的戏剧运动始终沿着毛泽东1942年10月给延安平剧院的题词“推陈出新”方向前进。最初，评剧院既演出《群英会》、《玉堂

春》、《四郎探母》等大量传统项目，又演《松花江》、《钱守常》、《小过年》等反映抗日内容的新戏。自从毛泽东为《逼上梁山》写信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赞誉这出戏“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又写信称赞《三打祝家庄》“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后，延安的平剧不断推陈出新，创作演出了不少新的剧目。其中，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贡献最大，成绩最突出。他们接连推出秦腔剧《好男儿》、《查路条》、《中国魄》、《干到底》等剧目，其中以《血泪仇》和《穷人恨》最为优秀，最受欢迎。

马健翎创作的大型秦腔剧《血泪仇》，通过农民王仁厚一家的悲惨遭遇，揭露国民党血腥统治，歌颂了在党领导下人民翻身解放的斗争。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其中，近情近理，感人肺腑。作者说：“《血泪仇》是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愉快、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来的东西。剧中那些受难人的情景和哀鸣，在我脑子里演映与哭诉时，我自己禁不住滚滚泪下，常常滴湿了纸。”由于作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尖锐地表现了阶级斗争这个主题，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群众性和震憾人心的力量。这部戏由民众剧团演出后，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1948 年 1 月，为配合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诉苦”和“三查”（查立场、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民众剧团排演了马健翎编导的大型秦腔现代戏《穷人恨》。这是一部对广大战士和解放区人民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此剧演出后，文艺界对剧中的主题人物有不同意见，但它深受劳苦大众和革命战士欢迎。彭德怀司令员在新解放区洛川国民军冒雨观看了《穷人恨》后，给剧团写信，赞此剧“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武器。”同年 11 月，王震将军看了《血泪仇》和《穷人恨》演出后，给作家马健翎写信。信

中说，他前后看过五六次，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多次看它，使我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至于对俘虏兵激发阶级觉悟的效果，是特别大的。我们千万的观众们，希望你这位作家，有表现今天大革命运动中伟大的党和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自觉的伟大英勇斗争的新剧本上演。”①

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歌剧，在延安戏剧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笔。这个歌剧，缘于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新传奇。被村中恶霸逼到荒山上的受苦人——白毛仙姑被八路军和村干部救出山洞，重新开始了人的生活。这个故事从老百姓的口头创作，经不断修正、充实、加工而形成完整的故事。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把它写成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线晋察冀时，将它带到了延安。

1945年2月，鲁艺工作团赶排了27场大型歌剧《白毛女》，向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献礼。从剧本创作到排演，历时三个多月。其间，讨论了用什么语言、什么音乐、什么表现形式演出等问题。最重要的是将主题确定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反封建的主题，要比破除迷信的社会意义升华得多。

1945年4月，《白毛女》在延安上演。6月10日，鲁艺为党的七大代表演出《白毛女》，获得了巨大成功。毛主席为之热烈鼓掌称赞。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这个剧“非常适合时宜”，“艺术上是成功的”，提出黄世仁应该枪毙，并解释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既然反映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传起来。中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71—722页。

央书记处的估计是正确的。《白毛女》第一轮前后共演出了30多场，在延安产生了轰动效应，反响强烈：老百姓谈论着《白毛女》的故事；唱着《白毛女》的歌曲；参与《解放日报》开辟的“专题讨论”。据贺敬之回忆，从演出开始到结束，他们收到了供参考的批评文字40余件，约15万字。根据演出效果和各方意见，同年10月又对《白毛女》进行了修改，从1946年1月起，又在张家口演出了30余场。

《白毛女》是解放区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是新中国歌剧的奠基之作，其思想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报纸上不断报道当时的演出盛况和强烈反响。称此剧是“相当成功的剧作，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在延安是罕见的”，是“适时生动的阶级教育”，“是突破既成形式的创造，是有建设性的创造”。每到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到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散戏后，人们无不交相称赞”。有的村看了《白毛女》，很快发动群众展开反霸斗争。一些部队看了演出，战士们迅速唤起杀敌立功的热潮。1947年2月22日，郭沫若在看了《白毛女》剧本后撰写了题为《序〈白毛女〉》的文章，说他“如饥似渴地立刻把《白毛女》捧读了一遍。故事实在动人”，就剧本论剧本，“已经就是一件富于教育意义的力作了。这是在戏剧方面的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尝试得确是相当成功。这儿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虽然和旧有的民间形式更有血肉的关系，但也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从新的种子——人民情绪——中自由地迸发出来的新的成长。”①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50页。

继《白毛女》之后，孔厥、袁静又写成了16场反封建大型歌剧《蓝花花》，由中央管弦乐团排演。同时，《刘胡兰》、《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歌剧也相继问世，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受服装、道剧条件的限制和观众欣赏水平的制约，话剧要搬上延安的舞台，较之平剧和歌剧更加困难些。但戏剧工作者也为延安时期的话剧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9年的10年间，延安上演了225个剧目，其中话剧有135个，占总数的60%。这里面，有毛泽东提议排演的曹禺的《日出》，毛泽东推荐上演的苏联话剧《前线》。此外，还产生了沙可夫等人编导的《广州暴动》，朱光、左明等人编导的《血祭上海》等历史题材剧。《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又从群众斗争中获得题材，创作出了《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保卫边区》、《同志，你走错了路》等表现现实题材的作品，四川方言喜剧《抓壮丁》，轰动了延安的敌后根据地。

### （二）新秧歌运动的兴盛

秧歌艺术包括扭秧歌和秧歌剧。它本是一种农民艺术。延安的老百姓十分喜爱这种艺术。特别是旧历春节前，农闲期间，爱好者便聚在一起，弹、拉、唱、跳。许多农民从七八岁跳到五六十岁，艺术造诣越来越深，秧歌艺术也就一辈一辈地流传下来。春节期间，几乎每个村庄都组织秧歌队，相互拜年，自娱自乐。群众秧歌的广泛开展为延安秧歌运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旧秧歌与新的秧歌有许多不同。旧秧歌中存在着许多不健康的东西。从内容上讲骚情与调情在旧秧歌中普遍存在。所谓骚情，在陕北就是拍马屁的意思，上地主家拜年，就要骚情地主，所以老百姓习惯地称旧秧歌为“骚情秧歌”。恋爱是旧秧歌的主题，调

情几乎为其本质特色。所谓调情，是指一男一女扭唱，其内容不乏打情骂俏趣味低级的东西。旧秧歌里丑角是重要角色，丑角都是劳动人民，旧秧歌中的劳动人民被丑化，化装时，丑角头上朝天翘着小辫子，眼睛上画两个白圈圈，老婆子戴两个大辣椒当耳环……专为惹人发笑。从形式上看，旧秧歌比较单调。新秧歌则全然不同。新秧歌有比恋爱更重要百倍的主题，骚情、色情、丑化劳动人民的现象得到纠正，内容健康、积极。新秧歌虽然以旧秧歌作基础，但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新型的秧歌舞剧。

对于秧歌这种农民固有的民间艺术，一开始并未引起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和重视。1942 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 5 月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在考虑如何转变立足点，如何使文艺反映老百姓生活，让老百姓喜欢看、看得懂宣传的内容问题时，鲁迅艺术学院中原本对民间艺术就比较熟悉的王大化、安波、贺敬之、李波等同志，便凑在一起，开始了创作并演出新秧歌剧的试验。通过花鼓、小车、旱船、挑花篮、大秧歌等群众熟悉的形式，在街头、广场演唱新秧歌，群众看得懂、喜欢看，工、农、兵、干都满意。群众对新秧歌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热情，给了文艺工作者极大的鼓舞。于是，延安的秧歌闹得红红火火。除鲁艺之外，还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剧团都闹起了秧歌。此外，部队的文工团，一些机关、学校也相继搞起了业余秧歌队，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就这样普及了。

1943 年春节期间，延安的秧歌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特点是专业剧团下乡。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鲁艺等五个专业团体分别赴陕甘宁边区工作，一为劳军，一为给老百

姓演出，普及秧歌运动。鲁艺百余人的秧歌队连续在杨家岭、中央党校、文化沟、联防司令部等处表演。他们以拥军优属、宣传生产为主题，推出了一大批内容新、形式新的节目，大秧歌的领头人手持斧头镰刀，秧歌队员化装成新社会的工、农、兵、学、商各类人物，真是别开生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大砭沟的一场演出，聚集了上万人。鲁艺每天在延安农村演出五六场，群众奔走相告，亲昵地称呼“鲁艺家来了！”秧歌队从延安南门外到北门，从古老的城墙外到东区的乡村，人们都跟随着，好像看不够。许多群众还给鲁艺秧歌队写信，热情赞扬他们演出的《改造二流子》、《兄妹开荒》等歌剧，“发挥了革命艺术工作者的威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领导同志看了《兄妹开荒》后，也很满意。毛泽东赞曰：“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1944 年春节期间，延安的秧歌运动掀起了第二个高潮。这次高潮的特点是群众性新秧歌运动的兴起。1944 年新年、春节期间，为了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延安各剧团都下乡演出了，各机关、部队承担起新年文艺活动的任务，这便促进了群众性新秧歌运动的开展。各地秧歌队如雨后春笋：清凉山秧歌队、留守兵团政治部秧歌队、杨家岭春节秧歌队、中央党校秧歌队、西北党校秧歌队、南区秧歌队、安塞秧歌队、延安市民秧歌队、马栏秧歌队、延属分区秧歌队……等等，相继组成。新年春节期间，27 个秧歌队一齐出动，到处可闻锣鼓声、歌唱声。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己教育自己，延安群众性的秧歌运动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2 月 23 日，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中央领导和二千多观众看了演出。这次会演，是对《讲话》公开发表一年零九个月来延安文艺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新方向的检阅，出现了《动员起来》、《牛永贵挂彩》、《女状元》（即《一朵红花》）等较优秀

的新秧歌剧目。从1943年的“秧歌下乡”到1944年的“下乡秧歌”，大大推动了延安秧歌运动和文艺运动的普及。据统计，几年之内，仅见报的文艺歌剧就有400多出，各路秧歌大军，各种形式交汇，争芳斗艳，五彩纷呈。延安的秧歌运动，是《讲话》发表后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典范。受延安的影响，大后方的秧歌运动也盛行起来。

### （三）延安时期的音乐运动

同秧歌、戏剧一样，延安时期的音乐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冼星海在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曾指出：“边区音乐运动成了全国的中心。”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在这里，荟萃了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有成就的音乐家；从这里，产生了大量激励人民、震憾人心，堪称号角的歌曲。这些歌飞出延安流传到全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艺术界赞誉我们中华民族是“歌咏民族”，延安的音乐运动在其间的功绩是不可没的。

延安音乐运动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建立了开展音乐运动的核心组织。1983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音乐系，培养了学生分配到前方后方工作，成为音乐运动的骨干力量。鲁艺音乐系成立不久，又成立了边区音乐协会，组织音乐晚会等群众性的音乐活动。此外，还成立了民歌研究会，搜集整理了数千首民歌，整理和写作了大量音乐理论。

第二，人才荟萃，创作了大量反映边区人民生活、激励抗日救亡的优秀歌曲，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抗战时期荟萃于延安的著名音乐家颇多，其中有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马可、李劫夫、时乐濛……等等。这些著名音乐家到延安后，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创作了大量雄浑有力、情深意切、打动人心的

新音乐、新歌曲，传遍全中国。人民群众百唱不厌、越唱越添劲增力的歌曲有：《南泥湾》、《大刀进行曲》、《共产党，像太阳》、《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等等。据1940年的统计，抗战以来的救亡歌曲超过千首，发行全国的歌集和歌曲刊物有：《大众歌声》、《民族呼声》、《战歌》、《解放歌声》、《西北号角》等。在延安音乐运动中，大合唱的贡献和影响最大。如《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青年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其中又以《黄河大合唱》流传最广、最久。

第三，歌咏运动普及到边区的每个角落。包括前线。在边区，新歌一问世，会很快在学生、机关干部及民众中流传；只要是公开唱过的歌曲，士兵和老百姓都会唱几句。党中央曾动员200多位艺术干部上前线，他们毫不犹豫地用歌曲作为一种武器投入伟大的民族战争之中，同时将抗日歌曲传播到前线和敌人后方。

延安的音乐运动，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战斗性。音乐再也不是无谓消遣的工具，而是一种激发同胞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热忱的工具，是一种宣传抗战、配合抗战的战斗武器，救亡歌咏起到了启迪民众抗日救亡的先导作用。

在回忆延安音乐运动的时候，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黄河大合唱》的创作和演出。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是一部杰作，它由8首歌曲组成。这8首歌曲曲式各异，有独唱、齐唱、对唱、轮唱、合唱。作者以黄河象征祖国，歌颂了抗日军民同惊涛骇浪博斗乘风破浪的雄姿，歌颂了在万山丛中、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士，抒发了中华儿女誓死保卫黄河的决心。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一文中，道出了这部音乐作品的真谛。他说：《黄河大合唱》歌曲的创作，虽

然在一个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产生，但已经是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提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

《黄河大合唱》于3月31日完成创作，5月11日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上正式公演。冼星海亲自指挥着百余人的合唱团和乐队。台上一时唱出船夫的挣扎，一时传出河东父老的哀鸣，一时发出黄河的怒吼，一时道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呼声。这歌声发自肺腑，道 出了民众的心愿。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据冼星海日记载：“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里面有几首非常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远忘不了今晚上的情形。”① 周恩来由重庆返回延安，听了《黄河大合唱》后，于7月8日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郭沫若在《序〈黄河大合唱〉》一文中指出，“《黄河大合唱》是抗战中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就像风暴中的浪涛一样，震憾人的心魂。”② 茅盾说：“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还忘不了延安音乐运动的辉煌，它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依然魅力无穷。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4页。
② 《郭沫若文集》第13卷，469页。
③ 《茅盾文集》第10卷，第113页。

## （四）延安时期的美术运动

延安时期的美术运动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开展美术运动与其他艺术比较起来，需要具备一些特有条件。艺术家们出于对抗战人民的服务热情，战胜困难，使延安的美术运动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独树一帜，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局面。

陕甘宁边区聚集了160多位美术家。边区创作的自由和精神生活的解放，使他们充满了建设抗日艺术和边区艺术的热情。于是，美术团体组织和刊物应运而生。文协内设立了美术部门。延安鲁迅艺术院内设有进行研究和创作的美术研究室，还设有美术系，系下面分为若干组，包括绘画、木刻、雕塑、工艺图案等等。其它各解放区也都设有美术人才分别参加到八路军中去，或在部队政治部，或在军区剧团，或参加“战地服务团，”或组织“木刻工作团”、“美术工场”，根据战时需要或边区军政工作的任务，及时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这些美术人才除发表单幅作品，还共同编印了刊物和画报，其中有延安的《抗敌画报》、《前线画报》。

随着延安美术组织、团体的建立和美术创作的逐渐兴旺，延安和边区的主要城镇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会：生产展览会、文教英雄大会展览会，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展览会……美术工作广泛地运用于这些展览会中，产生了大批反映边区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美术作品，其中有人物画像、历史画、招贴画、讽刺画，还有陕北生产的新图案地毯、民间剪纸艺术、具有乡土气息的年画和泥塑玩具等。此外，延安还举办过法国画家毕加索的画展。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2月15日——17日由延安美协主办的讽刺画展，展出了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的60多幅作品。为什么要举办讽刺画展呢？作者在文章中表达了初衷：“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新的社会”，对于

这一切，漫画工作者的任务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这次讽刺画展盛况空前，三个展室挤满了人，参观者不下数千，报纸上发表了很多评论文章。有的说，这是“对延安生活的各样不够处加之以友爱的指责”，是十分必要的，“不但起了镜子的效用，并且会引起造镜子和照镜子的风气。”张谔的《老李，还你一根大葱……》，蔡若虹的《和平鼾声》，华君武的《当主席报告第三部分第二点的时候》，都是针对不正轨的集会制度、调查研究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蔡若虹的《醉了的自由》、《爱神坐了飞机》，华君武的《群众大会》、《因此大会总要延长三小时》，张谔的《老子天下第一》、《文化水平提高了》等作品，揭示了生活中“那些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热情而善意的讽刺画，使人们在会心的微笑之中，加深了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的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延安美术作品的种类较多，主要有版画、漫画、木刻、雕塑、年画、连环画、剪纸，艺术家们还改造了皮影戏，改造了“西洋景”。不论哪一种类型的美术作品，均以其独特风格和民间形式宣传抗战主题，反映新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其中，木刻的成绩更为突出。

延安的木刻，在《讲话》发表之前就有相当的基础，作家注意写生、写实。《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掀起了一个向民间文学艺术学习的浪潮。艺术家们从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从民间文学艺术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延安木刻出现了新气象，产生了众多优秀的作品。其影响不仅在延安，在中国，而且享誉国外。1945 年 6 月 4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延安的木刻作品到了美国杂志上》的文章，这篇报道说，美国

《生活》杂志今年4月9日介绍了延安鲁迅的木刻选，大小共15幅，有反映敌后场面的《抢粮》、《最后的一颗子弹》、《夜行军》等，有的反映群众日常生活的《识字班》、《冬学》、《村选》、《卫生》、《结婚登记》、《八路军生产》等。美国《生活》杂志编者在介绍中说："当日本在1937年进攻中国时，木刻家们组织了一个抗敌艺术协会，散布到全国各地，从事唤醒人民的工作。现在这个协会已经改为中国木刻协会。总会设在重庆，但其中主要的艺术家都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在国民党区域中，艺术家只能在暇时工作。在延安，他们得到政府的支持。"①

在谈论延安时期的美术运动时，我们还不应当忘记宣传画。宣传画是就其作用而言的，各种类型的美术作品都可以成为宣传画的手段。抗战初期的宣传画，很多是画在城乡房屋的墙壁上或大幅白布上。后来采用石印和套色木刻较多。宣传画的用途很广，成绩很突出。最宝贵的是随军艺术家们将宣传画用于对敌伪的斗争。在华北，我们的大幅画曾屡次神气地出现在敌人的堡垒上和营房上；我们的小幅宣传画、传单，更是经常出现在日本式的"慰问袋"里，被送往日本、伪军士兵的手里。这些宣传画，以抗战为主题，以鲜明的、强烈的浓墨重彩宣传抗战，发挥了唤醒民众、激发日本士兵思乡厌战情绪的积极作用。

### （五）延安时期的诗歌运动

作为文艺花园中的一支奇葩，诗歌被喻为匕首、投枪、号角。较之戏剧、木刻等文艺种类来，诗歌运动显得迟到了些，但迟到并不排斥繁荣。延安时期的诗歌无愧于匕首、投枪之美誉，无愧于它所处的伟大时代。

---

① 转引自《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602页。

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和诗歌朗诵运动。这一运动“开全国之风”。因为当时纸张缺乏，印刷困难，出诗歌并非易事。但诗歌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有责任服务于抗战。这种要求在战地更加迫切。神圣的使命同客观环境的矛盾孕育着街头诗自然问世。街头诗最初出现在陕北、晋西北一带的街头或路边石崖上，这些诗虽然显得幼稚，但它较之标语有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和情感，有大体可念的音韵。这些诗显然不是出自诗人之手，而是为了鼓舞士气、教育群众而作。街头诗已经出现了，需要有人去提倡，去利用，去创造。

柯仲平等作家是街头诗运动的倡导者。1938 年 8 月 7 日，边区文协“战歌社”的柯仲平、林山等人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战地社”的田间、邵子南等人公开倡导街头诗运动。他们打着“街头诗运动日”的红幅，发布《街头诗运动宣言》。《宣言》昭示了提倡街头诗运动的原因和宗旨，它引用了一首无名氏的短诗作开头：“高山有好木，平地有好花，人家有好女，莫钱别想她。”《宣言》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啊，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①

《宣言》的发布者们，不但号召别人写街头诗，自己就带头写。在 8 月 7 日发动街头诗运动这一天，他们大胆地把自己写的诗歌贴到街上去，挂到街上去，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街头诗运动。几天之内，有几十人写出了百余首诗，其中出现了一批好作品。如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田间的《假如敌人来进犯边区》，骆

①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 85 页。

方的《我们向你们致敬》、高敏夫的《边区自卫军》、刘御的《小脚婆姨》、张季纯的《给我一支枪》等。“给我一支枪，我要上战场；国仇家恨千万桩，哪个能够再忍让!”像这样明白、晓畅、朗朗上口并富于鼓动性的街头诗，其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延安的街头诗运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在延安的诗歌运动中，长篇叙事诗成绩颇佳，出现了若干诗坛明珠。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延安诗歌运动最早最有力的发起者、诗朗诵放头炮的“呐喊诗人”柯仲平。他创作的两部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和《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是陕甘宁边区最早用长诗歌颂工农兵的佳作，毛泽东在听到柯仲平自己写的《边区自卫军》后，当即批示：“此诗很好，赶快发表。”1943 年 3 月 9 日，艾青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长诗《吴满有》。吴满有是当时延安著名的劳动英雄。长诗记述了吴满有的一生，把翻身农民“皱纹里也充满了阳光”的欢乐和幸福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艾青因写歌颂劳动英雄的诗受到表扬，只可惜吴满有后来出了事，艾青的诗也就中止了流传。

在长篇叙事诗歌的明珠中，还有李季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该诗发表在 1946 年 9 月的《解放日报》上。李季是从三边山沟里崛起的新秀，时年仅 25 岁。《讲话》发表后，李季利用工作余暇，不间断地进行民歌搜集整理工作，辑录最多的是陕北三边一带的主要民歌形式“信天游”。无数优美而震憾人心的诗篇，深深地打动了李季，他对民歌产生了爱情，并从中吸取了十分丰富的营养，创作出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共分三部十三章，作品以 1930 年前后三边地区农民群众在中央领导下展开的激烈斗争为背景，记述了青年农民王贵与

李香香的爱情故事。诗一开头，就给读者展现了“三边”农村阶级压迫的一幅血淋淋的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在苦难中一道长大，他们之间的爱情在苦难中产生，在革命斗争中发展。作者通过王贵与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纯朴的爱情挫折，真实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解放与革命斗争胜利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

《王贵与李香香》一问世，就以深刻的主题、优美的故事和人民群众喜爱的“信天游”形式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广泛赞誉。陆定一在 9 月 28 日《解放日报》上发表诗评《读了一首诗》，说他以极大的喜悦读了《王贵与李香香》，称赞该诗用丰富的民间语汇来做诗，内容和形式都是好的，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郭若沫赞它是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贺敬之说，李季“确确实实是诗歌新园地上的一位开拓者。他的经久传颂的杰出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标志着我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在延安文艺运动的诗歌园地里，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也是十分活跃的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民歌在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传统，苏区产生过大量优质的革命歌谣。《讲话》之后，文艺工作者高度重视普及工作，群众诗歌创作活动得到更好的组织和指导。群众诗歌创作的主题，一类是表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的，一类是歌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领袖的。前者如《赵清泰诉苦》、《揭开石板看》、《进了地主门》、《短工》、《印子钱》等；后者如劳动英雄、农民诗人孙万福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孙用“蟠龙卧虎高山顶，万丈高楼从地起”起兴，歌颂边区的太阳，人民的领袖。这首歌曲流传至今。《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东方红》）是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带领

70 人的移民大队南下到延安开荒，途中为鼓舞士气一路走，一路编，一路唱而形成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配以“骑白马挂洋枪”调的著名歌曲家就这样产生了。这些工农兵创作的诗歌，产生在火热的斗争中，形式新颖活泼，抒发的是真情实感，语言质朴、自然、流畅，因而很容易流传。

各类诗社和刊物，在延安的诗歌运动中起了组织领导、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战歌社”成立最早；抗大，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诗歌爱好者组织的“山脉诗歌社”，出版过几期油印诗刊。1940年 9 月 1 日，由肖三、公木、刘御等发起组织，柯仲平、何其芳、李雷、天蓝等积极参加的延安新诗歌会，除研究创作，还出版了油印刊物《新诗歌》，于 1942 年 1 月 25 日终刊，延安版和绥德版各出 6 期，延安版由肖三主编，绥德版由高敏夫主编。1941 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高敏夫、郭小川等创办了新的《新诗歌》，出了六七期。这可能是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份铅印出版的诗歌刊物。肖三在《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里，阐述了出版《新诗歌》的主要原因是要让诗歌以声音更大、更宏亮、达到更远。他写道：“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流在中原沙场上。/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延安的《新诗歌》的出版，对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新诗歌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六）延安时期小说的丰收

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它与戏剧、音乐不同，没有形成广大群众直接参加的艺术实践，而较突出地表现

为作家们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实际斗争后的创作成果。延安文艺运动中小说的成果，犹如一朵朵鲜花，组成了小说创作繁荣的美丽花环。延安小说创作的繁荣，带动了整个解放区小说的繁荣，并为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小说佳作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创作领域的活跃，表现在作家队伍的进一步成熟和扩大。在延安，既有像丁玲、欧阳山、周立波、刘白羽等积累了写作经验的作家，又有像马峰、西戎、康濯、秦兆阳、束为、杨朔、柳青、孔厥、马加、孙犁、王愿坚等崭露头角的大批新作家。老作家突破原有的风格，获得了新的成就，新作家给小说注入了新的内容、新的风格、新的色彩。表现在作品的质量上，延安时期的小说创作都是空前的。

在短篇小说方面，不少新人新作相继问世。就题材而论，这个时期短篇小说成就最高的作品大多是来自农村的题材。其中，因反映农村新生活和农村阶级斗争题材较早成名的作家是孔厥。《受苦人》中，他善于表现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已引人注目。《讲话》之后的作品，与原先格调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歌颂解放区，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气象，具有明朗、乐观的气氛。如《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写的是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圻成长为英雄模范、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的故事。小说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孙犁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的短篇小说而著称。他特别善于刻化农村劳动妇女。他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其作品量多质好。《讲话》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秦兆阳也以描农村生活而著称。

反映人民的武装斗争的题材也是这个时期短篇小说题材的一个重要方面。写成较早而影响较大的是邵子南的《地雷战》。此外，

还有崔璇的《周大娘》，于黑丁的《母子》，西虹的《英雄的父亲》，杨朔的《月黑夜》，玉林的《五月之夜》等等。以人民子弟兵为主人公、直接以描写部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出色的佳作。其中描写部队生活的、影响最大的小说家是刘白羽。他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战火纷飞》、《血缘》等作品，取得了较大成功。此外，还有师田手的《活跃在前列》，谭虎的《“四个半”》，刘石的《真假李板头》，胡田的《生长》及李尔重的《落后的脑袋》等。

延安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还有反映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一类题材的。较好的作品有韦君宜的《三个朋友》和思基的《我的师傅》等。

从以上蜻蜓点水式的简述中可见，解放区的短篇小说确是色彩纷呈，以其全新的内容、高昂的姿态、明快的色彩，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中长篇小说方面。延安时期的中长篇小说较之短篇小说毫不逊色。其中出现了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马峰、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优秀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虽然有的成书于解放前后，但它们反映的是延安时期的生活，是《讲话》之后深入生活的硕果，因而也将其列为延安时期的作品。

欧阳山的《高干大》成书较早。作者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同其妻一道在延安南区合作社工作了一段，当过秘书、会计，同农民生活在一起。《高干大》是他深入生活的成果。作品写的是陕甘宁边区任家沟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主人公高生亮是一个平凡的人，真实的人，真正的革命农民。为了办

好农村合作社，他敢于为集体事业献身，敢于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贫穷疾病作斗争。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

柳青的《种谷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王家沟组织集体种谷的事件为线索，展示了解放区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种谷记》写于1949年5月，也是作家在《讲话》后深入生活的产儿。柳青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整风之后，带着一封“长期在农村做实际工作”的介绍信来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岭乡政府任乡文书。吕家岭乡是一个离县城三十多里路的山村，经常要翻山越岭，跨沟蹚口。柳青不畏艰苦，扎根农村的决心不改，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除完成乡上交给的各项任务外，还写成了长篇小说《种谷记》。

柯蓝创作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后改为《洋铁桶的故事》）是解放区第一部以章回体形式创作的作品，发表于1944年延安的《边区群众》报上。作品写了洋铁桶（真名吴贵）领导的民兵小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政权、对伪军进行政治攻势，以及如何捉特锄奸的故事。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也是采用章回体形式反映抗日的长篇小说。故事以吕梁山下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庄为背景，描写晋绥边区人民建立民兵武装、实行劳武结合，反对汉奸维持会、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康家寨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康家寨民兵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便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过程的写照。用章回体小说写抗战题材的，还有孔厥、袁静合作的《新儿女英雄传》。该书以白洋淀为背景，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八年的英勇事迹。

延安时期的中长篇小说作品，基本上都是写工农兵的。千百年来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兵，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也堂堂正正

地步入了文学殿堂，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这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大大迈进了一步。在创作方法上，这些作品基本倾向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中长篇小说所具有的这些鲜明特征，证明了毛主席的《讲话》指引方向的正确。

赵树理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成就最大、特点最突出的作家。出身贫农家庭的赵树理，从小参加劳动，从小喜爱民歌民谣等民间文艺，还参加过家乡的“上党戏”班子，领着一个“娃娃班”去赶庙会。扎实的生活基础和浓郁的阶级感情，为他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成为新颖独创的大众化风格的人民艺术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赵树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工作的。他当过小学教师，当过区长。1941 年到华北党校专门从事通俗文化工作，后来参加八路军，担任随军报纸和书店的校对、编辑，1943 年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写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报及其他通俗文学。《讲话》发表后，赵树理更加自觉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最早取得丰硕成果的作家。1943 年 5 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10 月，又完成了《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作”。1945 年冬，赵树理又完成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此外，还有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福贵》、《小经理》、《邪不压正》、《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等。1947 年 7 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次月，边区政府又授予赵树理的小说文教作品一等奖。他的作品还被迅速介绍到国外。

赵树理以反映农村生活见长，以小说的民族化、群众化强为其特色。所谓“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也就是文艺创作向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向民族化、群众化的方向迈进。

# 第五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发展科技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从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开始萌生，经过逐步发展变化，到延安时期，已达于成熟阶段，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技术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影响的思想体系。在毛泽东的科学思想指引下，延安的科技事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科技史上十分辉煌的一章。

## 一　毛泽东的科学思想的基本内涵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科学思想，是从毛泽东青年时期对科学的认识逐步发展而来的。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早晚要烧香拜佛。受母亲影响，毛泽东少年时也信佛拜菩萨。后来受到新思潮影响，他逐渐走到唯物主义立场上来。当时，他的家乡“韶山冲本地出了一个‘维新派’教员。这个人反对迷信，打菩萨、办学堂，劝人用庙产兴学，乡人都反对他，毛泽东却钦慕

他，赞同他的意见。”① 在学校，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唯物主义教育，抛弃了封建迷信思想。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毛泽东的自然观、社会观都在向辩证唯物主义方向转化，待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后，他的自然观、科学观都马克思主义化了。

### （一）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

毛泽东认为：天地自然是不依人或神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② 必须斩而断之。但是他主张，共产党在反对传统性的崇奉神灵等宗教习俗的具体政策上，应采取启发人民自己起来反迷信的做法，不能操之过急、简单从事，也不宜越俎代庖。他把这种做法比喻为“引而不发，跃如也”。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毛泽东深入阐述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过程。他认为，自然及社会始终处于运动状态，“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引起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举了各种例子来加以说明：“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③“即使是外力推动的

---

① 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②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30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70—71页。

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① 毛泽东还用在同等温度下，鸡蛋与石头的不同变化，来说明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并作出下列判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② “内因”，就是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外因”，则指引起事物变化的外部条件。只有当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已经具备了产生变化的根据时，外部条件才能起作用。显然，内在矛盾是引起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这样的解释，既讲清了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动和消亡的根本原因都是事物本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与唯心主义观点尖锐对立；又讲清了引起事物变化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事物内部，与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科学的自然观是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助于树立对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 （二）重视科学文化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已培养起对科学的热情。由于国势濒危，救国急迫，加上个人的偏好等原因，他未能花更多时间钻研自然科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对科学的认识更趋完善。他认为：一个最好的革命者，要研究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就包含有自然科学。如果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③ 1940 年 2 月 5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时讲话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 版，第 30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02 页。
③ 《新中华报》1940 年 3 月 15 日。

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他还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① 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科学作用和对科学社会功能的认识，表现了他对科学的重视。讲话中提到“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要求人民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提倡人们拿起科学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还因为反封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在反封建中，科学武器是很得力的。这一点，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毛泽东是体会颇深的。因此，他对科学的作用是很看重的。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把科学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既是对五四运动中“提倡科学思想，反对封建迷信”传统的继承，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重视科学文化的态度。五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报告时，更明确提出“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同时提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②这里所说的“进步的外国文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毛泽东对科技的重视，推动了延安科技事业的发展。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第5页。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64页

### （三）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

毛泽东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把科学粗略地作了一个划分，并且讲到了它们各自应用的范围。即“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而“为着要在自然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这说明，自然科学是用来认识与改造自然界的科学理论，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社会科学是用来认识与改造社会的理论，反映着对人类社会的看法。这是传统的科学分类，虽然比较准确，但是似乎太简略了点。其实，早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对科学分类原则发表了精辟的论述。他在《矛盾论》中，提出了用事物中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作为科学分类划分标准的正确论断。毛泽东指出：“自然界的各种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都是由各种物质本身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人对物质的认识，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不仅要注意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共同点，更要注意他本身的特殊性，“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与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对象。”因此，要区分科学门类，就要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

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① 科学分类的过程，也就是科学工作者探求研究对象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的过程。找准了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有了进行科学分类的依据。科学分类不是盲目地、凭主观臆断进行的，它必须符合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规律。正确的科学分类是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如果对某一门学科的性质、位置搞不清，将直接影响人们对这门科学的认识，也就影响了这门科学的发展。但有时科学划分并不容易搞准确，就是因为没有抓住事物的特殊矛盾。毛泽东关于科学分类的思想，有助于人们进行正确的科学分类。

**（四）科学来自社会实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写到：“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② 一切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现象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当然离不开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活动。实践是科学认识产生的源泉，也是检验科学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3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82—283页。

毛泽东的论述，点明了实践对科学的重要作用，把科学理论放在了实践的基础上。这对自然科学工作，对社会科学工作，无疑都具有哲学思维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对实践历来很重视，早在求学时期，在业师杨昌济的指导下，就树立了“知行合一”、“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的思想。终其一生，对实践始终是重视的，并努力去身体力行。① 他认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② 科学的抽象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这些知识才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因为离开实践，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产生的。

毛泽东依据人类认识事物的实际过程，把认识分为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并科学地指出了两个阶段的联系。他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性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必须把它再用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③ 这个论点对纠正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偏向，不啻一副良药。

### （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

毛泽东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

---

①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20 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287 页。

③ 《实践论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292 页。

出了“自然科学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但是，由于“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① 毛泽东关于社会科学要指挥自然科学去改造自然界的主张，是对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的继承和发扬。自然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界的一种认识活动，这一活动从来离不开哲学指导。因为哲学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最基本问题的深入思索和高度概括。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本质和规律往往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靠思维来把握。因此，理性思维在科学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越需要理性思维，抽象思维的程度越高，就越要有哲学的正确指导。科学工作者的认识，始终要受到某种哲学观念，特别是自然观的支配。对此，恩格斯曾经论述到：“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支配。”② 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的观点，对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活动十分重视。在延安，他发起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哲学运动，提出新哲学要面向抗战，面向科学。要在哲学的发展的观点上，来研究一切其他的科学。

他提倡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工作，同时认为，搞哲学的也要搞点自然科学，又提出，要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③ 毛泽东对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很感兴趣，他经常和徐特立、艾思奇、郭沫若等一起研究讨论一些哲学范畴及方法问题，磋商讨论牛顿的古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哲学问题，并专门到陕北公学与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第5页。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周扬等，《新哲学会的缘起》，《解放内参》第3集，第53期。

③ 于光远：《科学的光耀在延安闪耀》，《光明日报》，1981年7月8日。

高士其讨论古典自然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在他的倡导下，延安科技工作者学哲学蔚然成风，他们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指导科学技术活动，取得了较大成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发展，这是延安时期科技事业兴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毛泽东科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 （六）毛泽东在延安的科学活动及其影响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科学的重视，推动了延安科技事业的发展。科技事业的持续、稳步发展，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毛泽东的建议下，1938 年，由艾思奇、周扬、何思敬、成仿吾、张如心等人发起，经中共中央批准，延安成立了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新哲学会。该会宗旨是：团结“一切在实际活动中的人们以及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家、考古家等，来共同合作”，推动科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① 这个会的成立适应了发展指导科学事业的理论的需要。毛泽东、陈云、徐特立、高士其等作为普通会员，先后参加了该会。1940 年，新哲学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召开了第一届年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到会讲话，强调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陷。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为了推动干部学习，毛泽东带头学习理论、钻研理论，撰写文章，讲课演讲，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他的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以及《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等，都是在这个

---

① 周杨等《新哲学会的缘起》，《解放内参》第 3 集，第 53 期。

② 《新华日报》1940 年 8 月 1 日

时期相继问世的。它们既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又是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理论著作。有时为了给红军老干部讲授半天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要准备几天几夜。他带研究性质的学习，带动了干部学哲学的热情，为边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理论的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以毛泽东为榜样，先后成立了读书小组、读书会等学习组织。其中最有名的有洛甫（张闻天）小组和陈云小组。还有八路军军政学院的何思敬等人组织的《资本论》学习小组和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徐特立支持的自然辩证法学习组。中共中央宣传部学习小组在艾思奇辅导下，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以及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朱德、肖劲光、李维汉、莫文骅等，都是小组的固定学员。他们在讨论中，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起来，学习兴致颇高。

毛泽东不仅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认识科学，而且特别强调要学习自然科学。在陕北，毛泽东始终没有中断学习自然科学和宣传自然科学的工作。他还在机关干部和部队小战士中普及自然科学，提出许多颇有趣味的科学常识来启发大家的学习热情。在他的模范作用下，延安城乡普遍建立了识字班、读书组。延安各机关组织了“自然科学普及小组”。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学校专门开设了自然科学概论、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一个以传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核心的“科学大众化运动”在延安普遍展开。①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第112—113页。

为了使学习更普及、更深入，1940 年，中共中央发出加强干部理论学习的文件，规定每年 5 月 5 日马克思的诞辰日，为干部理论学习的节日。1942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上做题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要求干部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有计划地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1943 年 8 月，审干运动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把社会发展史、自然发展史和联系边区实际的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这三门大课，作为干部理论教育的必修课。1942 年到 1943 年，边区政府组织科技界、教育界和理论界人士，配合延安整风，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一系列整风文件，对生产与科学、工业建设与科研、自然科学的党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科学是“种子”，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土壤”，只有土壤肥沃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抗战建国及建设边区有赖于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只有在抗战胜利、民主成功后才能获得“繁荣滋长的园地”。因此，“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① 科技工作者们还认识到：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不尽源泉，边区的生产实践决定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的规模和速度，因此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边区自然科学的研究同生产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并服务于边区生产建设的实际，“以解决经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② 这种认识的获得正是长期倡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自然辩证法和科学理论的结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延安人学习自然科学理论的活动异常活跃。这对在边区普及科学知识，宣传自然辩证法和帮助干部更好地学习社会发展

① 朱德：《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解放日报》1941 年 8 月 3 日。

② 江泽民等：《经济建设与科学研究》，《解放日报》1941 年 11 月 28 日。

史及马列主义理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指导科技工作开展的最好的哲学论著。为深入钻研这部著作和科学哲学问题，1938 年春，董纯才、高士其、陈康白组织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座谈会主要讨论自然辩证法理论在国防科学上的应用问题，讨论时间一般在星期天，轮流在陕北公学、边区文化协会和入会同志的单位或宿舍内举行。经常参加的有董纯才、高士其、陈康白、艾思奇、柯柏年、龚澎等二十几个人。由于当时条件艰苦，只有一本杜畏之译的中文版《自然辩证法》，大家就轮流传阅。学习中，大家轮流念，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座谈会成员虽然分散在边区各个单位，但每次座谈讨论都风雨无阻，坚持自觉参加。短短几个月，座谈会就产生了较大影响，使自然辩证法在边区自然科学工作者中广泛传播开来。

1940 年，于光远在延安大砭沟（又称文化沟），发起组织了自然辩证法讨论会，有徐特立、艾思奇、何思敬等十几位理论工作者参加。采取分散学习、研究，集中讨论、磋商的形式，每周日讨论一次。讨论前先拟好提纲，根据提纲发言。讨论时，气氛热烈而轻松，年轻的与年老的在一起，完全可以无拘无束地各抒己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讨论的问题比较深入。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发展较快，是与科技工作者重视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研究分不开的。

1939 年后，在毛泽东提议下，武衡、屈伯川和于光远等开始筹备组织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 年 2 月 5 日，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毛泽东到会并发表讲话。大会推选蔡元培为名誉主席，吴玉章当选为会长。共有 320 人参加了研究会，成为会员。会议通过数十件议案，包括成立各种学会、出版

科学杂志、设立科教训练班、帮助改进工农业生产技术、创立延安气象台等。研究会发表宣言，提出了四项任务，作为该会的目标和方向。1. 开展自然科学理论与应用问题的研究；2. 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3. 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4. 加强科学界的联盟工作，与全国自然科学家取得联系，精诚团结，密切协作，共同反对封建的倒退的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现象。

自然科学研究会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注意将科学与哲学相结合，自觉应用辩证法探讨一些学科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会长吴玉章对研究会工作非常认真，很注意把研究会的学术工作与边区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他曾亲笔将研究会秘书处成立的目的，由原来的“是为了开展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改为“为了开展自然科学学术普及与教育和建设科学等活动”，决定把秘书处设在边区工业局，以便使科学技术与边区工业生产密切结合。研究会重视做好科技人员的工作，支持他们搞科学试验，对发展边区经济、巩固后方、支援前线起到很大作用。在学术方面，自然科学研究会广泛开展活动，加强对科学与抗战救国的关系、科学方法论等问题的研究。教职员和学生结合本专业工作中的问题，写出了一些有一定研究水平的论文。研究会还开展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的研究，推动了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合作。

为了配合干部对马列主义理论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延安解放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出版了《大众哲学》、《科学历史观教程》等书。1940 年 11 月，《中国青年》发表了于光远译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章）。这些书籍的翻译、出版，方

便了干部的学习，减轻了他们学习材料短缺的困难。在边区办的学校中，也开设了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等课程。经过学习，广大干部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前进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① 延安科学研究工作在毛泽东科学思想指引下取得了巨大成绩。

## 二　科学精神指引延安科技事业勃兴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学事业，促使它沿着为人类大多数的根本利益服务的方向发展，是科学精神的本质表现。正是在这种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延安科技事业兴旺发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技事业，就要按照科技发展的需要，制定适当的政策；建立一定的科学组织；要尊重科技工作的主体——科技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要因地制宜；要注意把科技工作与其产生的土壤——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成功经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 （一）尊重科学，倡导科学事业

在延安，从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到党政军各级领导，普遍比较重视科技工作。当然，一些干部从不那么尊重、相信科学到比较重视、相信科学是经过了一番思想转化的。开始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是战争时期，只要打胜仗就行，哪有那么多工夫去种地、搞科学。也有的人因对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技术工作的关系搞不清楚，而不愿意从事经济工作与科技工

① 李维汉：《战时干部学校教育》，《中国文化》第1卷，第4期。

作。针对这种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理解和轻视经济工作与技术工作的错误观念，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讲述科技工作的重要性，表彰从事科技与经济工作取得优异成绩的人。1939 年 12 月，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对白求恩“对技术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大加赞颂。同时批评了那种“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①]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发表演说，痛切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根本忽视业务学习的倾向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②] 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马列主义是反对黑暗与落后，尊重科学与文明的”，“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只有自然科学进步，生产能力提高，富源开发与正确利用，才能充实军队战斗力，改善人民生活，取得抗战建国的胜利。[③] 吴玉章、徐特立、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强调了科技工作的重要性。他们的文章或讲话，对纠正人们对科技工作的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使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及军队，都制定了支持科技工作发展的政策。1941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凡在经济和技术部门服务的党员，必须向党内外的专家学习，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为支持科技工作的开展，连续发表社论，大力宣传科技作用的社论有：《提倡自然科学》、《论经济与技术工作》、《欢迎科学技术人才》、《奖励自由研究》等，促进了全体干部对科学技术工作认识的统一和提高。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

---

①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660 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5 辑，第 16 页。
③ 《解放日报》1941 年 8 月 3 日。

会上，一致通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提交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议案要求：发展边区科学事业，加强边区经济建设，加强医药卫生工作，减少人民疾病。具体包括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协助经济及文化建设；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欢迎外来科学人才，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订定条例，奖励科学及技术研究；建立企划机关，统一全边区经济建设工作领导；加强农业行政机构，改进农业牧畜生产，兴修水利、保护森林，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开发各种矿产，提炼钢铁，创造硫酸，发展农工机器制造业，建立基本的工业基础；组织各种专门会议，解决技术问题；聘请专家组织地方病研究会；发展药品制造，提高质量，设立药品检查机关，增进医药设备，普及卫生知识。

在这次会上，科学家们从各方面提出了加强边区科技工作，发展边区经济的建议和意见，受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所提建议被逐步落实。这对边区的建设，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除发展科技的政策外，各级军队、政权机构，还分别制定了奖励生产、经济建设和科学发明的政策，以及吸引科技人才的政策。这些政策文件的实施，对边区科技持久、稳定地发展，起到了有力地保障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知识分子政策、奖励政策和优待政策的实行。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抗日战争兴起后，大批爱国青年来到延安。193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

条件之一。”①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各地分别以各种形式实施知识分子政策。

1940 年 3 月 5 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人才问题的适当解决》，要求各级领导要大公无私地处理好人才问题。1941 年 4 月 23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对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专门家，应充分信任，在物质上给以优待，在政治上给其一定自由。还要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1942 年 9 月 17 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对待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提出对军队中的知识分子要采用“容、化、用”的决策。所谓“容”，就是争取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八路军的优秀干部。“化”，就是将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用”，就是正确合理地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有发展前途。其他各解放区也都制定了贯彻中共中央决定的相应的政策。1944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提出“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今天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决议指出，“我们所培养的知识分子，应该不仅具备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与实际技能，并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现代科学知识。”② 中共中央和各级机构制定的吸收、团结、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带着党和同志的关怀，走上边区建设的战场，投入边区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奖励政策。为表彰科技和经济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树立典型，带动一般，掀起科技、经济工作的高潮，自 1938 年起，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620 页。

② 《解放日报》1945 年 1 月 10 日。

延安几乎每年都举办各种旨在鼓励先进的展览会，在会上对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劳动英雄和模范人员给以物质奖励和大会表彰。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也采用奖励手段，促进工作。奖励逐渐成为经常的制度。典型的示范作用影响是很大的，表彰、奖励了一个人，其他人就会择善而从，很快跟上来。当时，工业、农业、科技、卫生、军队，几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模范或先进标兵。

为使奖励工作制度化，1941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了经常性的奖励制度。其中有《优待国医条例》，①内中明文规定：医药师在医药上有发明创造者，政府应该奖励之，凡制造出精良中成药者，也应该奖励。同年 7 月，《晋察冀边区奖励生产技术条例》②颁布。1944 年 5 月，渤海解放区也发布了对劳动英雄的奖励政策。③奖励政策的施行，促进了科技进步，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关于优待政策的实行对象，主要是在边区从事科技、文艺、卫生等工作的专门人才。这一政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视。最先实行这一政策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该部于 1941 年 4 月决定：给文化技术干部以服装、津贴、伙食等方面的优待。④1942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制定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⑤从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较详细地规定了优待办法。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解放区都先后实行了各自规定的优待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受到优遇的知识分子深为感动，增加了他们的自豪感，起到了推动边区科技文化事业发展的作用。

---

①②③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3—475 页。

④⑤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477—478 页。

### （二）尊重科技人才，凝聚科技力量

发展科学技术，首先要有一批科技人才。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对科技人才的使用。三四十年代，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物质供应困难，但还是聚集了一批科技人才。其原因，一是到边区的科技工作者，一般革命意志比较坚定，对边区条件的艰苦有一定思想准备，能够坚持革命，不轻易脱离；二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人才持尊重的态度，这种热情的态度。无疑是吸引广大知识分子、科技人才的强大力量。

对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党和政府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他们发挥特长的政策，而且注意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经常找他们谈话，或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边区建设，为抗日救国作贡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经常亲自参加科技人员的座谈会，与他们交换意见。1940年3月10日，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技术干部座谈会，到会的有卫生、工业等部门的专家及政工干部百余人。毛泽东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对技术人员的工作给予表扬，说应该提高技术工作者的地位，表现出他对技术工作的尊重态度。这使专业技术人员很受感动。他还鼓励这些同志说："我们是为自己，为中华民族而工作的，我们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大多数人的事业而奋斗的。"①十几天后，毛泽东再次参加技术干部会议，在会上表示：共产党尊重科学。科学是用来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为人类解放而服务的。② 1942年3月23至24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在延安参加八路军所属各单位高级技术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工程师、医师和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56页。
②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58页。

教员。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专家们提的意见，对边区建设中存在的不重视技术，不统一、不合理的现象提出批评，表示必须加以纠正。他认为：专家所提意见，与党中央号召的整顿三风的精神是一致的。朱德在会上对技术干部的工作提出表扬，对他们所提的意见决定分别情况，交有关部门处理。对不合理的现象，要求限期加以克服。①

毛泽东喜好读书，知识渊博，和知识分子谈得来，与很多人交了朋友。1938 年元旦，高士其来到延安。对这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毛泽东很尊敬。一见面就说："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对高士其问寒问暖。以后，又到高的住处，向他请教、商讨关于自然辩证法等哲学问题。② 毛泽东不仅对已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极表关心、爱护，对边区以外的科技人才也尽可能设法将他们吸引到延安和各根据地来。对吸引科技人才之事，他时常挂怀。1941 年 7 月 30 日，毛泽东与朱德、叶剑英签发电文，要求各兵团首长，"今后应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做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电文解释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医务人才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③ 从以上所举，可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科技人才十分关心、重视。古人说得好："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得士者强，失士者亡。"④ 都讲的是招揽人才方能使事业成功的道理。毛泽东等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458 页。

②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 年 10 月版，第 53 页。

③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3 辑，第 36 页。

④ 《警语名言词典》，长征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40—141 页。

领导人关心人才、尊重人才的举措，使陕甘宁边区源源涌入各种科技工作者。如化学家恽子强、机械工程师沈鸿、化学家钱志道、医学家傅连暲、无线电专家李强、地质学家汪鹏、武衡等等。这近 400 名科技人员，在延安仅用短短几年时间，便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他们在边区这块科技荒原上，从无到有建立起轻重工业，改造了落后的农业，发展了林业、蓄牧业、采矿业，创办了高中等教育事业，推动了民众学科学、用科学。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科技人才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必然结果。而科技人才积极性能发挥出来，无疑得益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科技人才的正确方针、政策。

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在科技人员自愿的前提下，把他们按所学专业，分别组织到不同学会和自然科学院等部门中。据统计，在 1940 年 2 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时参加的 330 名会员中，理科工作者 110 人，工科 120 人，农科 45 人，医科 55 人。按在边区参加工作的性质划分，会员中经济建设者 90 人，科学教育工作者 55 人，医药卫生工作者 45 人，在校学习者 20 人，未参加科技工作而参加其他工作的人 110 人（以后陆续归队）。研究会在会长吴玉章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1942 年初，研究会下属的专门学会已达 10 个，包括机电、炼铁、土木工程、航空、数理、化学、农业、生物、医药、地矿。1942 年 1 月成立了绥德分会和关中分会；10 月，成立了米脂分会。各分会分别开展活动，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些成绩。如生物学会开展了对边区生物的调查，发现了新的植物品种；地质学会建立了地质博物馆，向群众介绍边区地质矿产知识；航空学会成员参加了延安机场的部分管理和维修工作；医药学会进行了对边区地方性疾病的研究。各学会将专业人员组织起来，不仅便于

加强对科技人员的管理，也便于集中力量进行多学科协同作战。这种组织方式，完全符合世界科学组织发展的趋势。延安当时处于被围困与被封锁状态，不可能与国外有科技交流，但自然科学研究会组织的出现，具有与生产密切结合、各行业有效协同的特点，这正是陕甘宁边区科技大发展的组织上的原因。这种组织形式，一俟全国解放，立即在全国推广开来。

### （三）按客观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地开展科技工作

实事求是是党中央一再倡导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对待科学技术事业，就要在开展科技活动时按客观规律办事，防止主观片面性。要按客观规律办事，首先要了解客观事物，经过调查研究，对客观事物的外观和实质有尽可能多的认识，延安科技事业的发展，便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结果。

陕甘宁边区处在一个气候干旱、土地瘠薄、灾害频发、野生资源奇缺的环境中。边区北有丘陵盆地，南有关中平原，地形复杂，约有可耕地 400 万亩，但 70%是荒地。边区的高原和山地绝大部分为黄土，对水的渗透性较大，保持水分力量较强。由于大部分地在倾斜度较大的山中，常被雨水冲刷，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里历史上农业就很落后。红军入陕之前，陕甘宁边区已是一派贫瘠，人迹罕至。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边区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对边区的土壤、农作物、森林、矿藏、水利和生产建设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科学考察。科研人员的足迹遍及边区各县，经过一番了解、研究，写出了有价值的考察报告，为边区政府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党中央、边区政府根据对考察报告的研究、分析，制定了可行的农业开发政策，使边区农业得到迅速发展。经过几年努力，到 1944 年，全边区的耕地面积已由 1936 年的 840 万亩，增加到

1220 万亩，当年粮食产量为 175 万石（每石 300 斤）。[①] 边区农民家家有余粮，生活也改善了。这就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后，按客观实际制定正确政策方针的收获。

1942 年，毛泽东在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总结了边区农业迅速发展的经验。他认为：第一，是纠正了经济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实行了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第二，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第三，移民政策的执行，增加了人口。第四，实行奖励政策，对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对劳动模范进行奖励。第五、组织劳动力，改造二流子，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第六，正确的农贷政策的实行，有助于农民购买耕畜和农具。第七，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毛泽东说：“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②] 边区提高农业技术的主要措施是：1. 修水利，扩大浇地面积。采用井水灌溉和渠水灌溉等办法，抗旱保苗。在生产中，老百姓创造了用龙骨水车从井中取水灌溉的办法，以及在小河中修建退水闸，积水灌田等办法，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 增加肥料投入。边区一些地方的农民种地不施肥，造成土壤肥力减退。边区政府号召“多积粪、多施肥”，对各种积肥办法大力提倡、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3. 推广良种。首先从边区内收集各类农作物标本，进行品种分类，然后在农场引进、试种良种。先后试验成功了狼尾谷、金皇后玉米、美国早熟土豆等品种。政府号召推广良种，各地用各种形式引导农民使用良种，取得成功后，逐步形成制度，建立了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2 辑，第 8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 年版，第 955—756 页。

良种推广示范户，使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4. 防治虫害。边区科技工作者对边区虫害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掌握了害虫的种类，继而制定了防治虫害的措施。对不同的害虫用不同的治法，行之有效。同时，还初步使用了生物治虫法。科技使农业生产获得迅速进步。除了粮食产量提高外，边区的棉花产量已达到 300 万斤，可保证全边区 2/3 的用棉量。农业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是尊重自然规律。如陕北少雨，庄稼缺水就要旱死。为此，必须引水灌地，否则就要受灾。这就是自然规律。

陕甘宁边区工业十分落后，原来只有一些晒盐、熬硝、挖煤等手工作坊式的行业，近代工业几乎没有，被人称为“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过的荒原”。除毡靴、毡帽外，其他一切日用品几乎全靠外地进来。1935 年 10 月，红军到达陕北，兵工队伍仅存的 12 个人，与陕北根据地的兵工队伍合在一起，建立了军械修理厂。到 1938 年，边区已有 270 名工厂工人。1939 年 4 月，边区政府公布了施政纲领，规定提高工业生产，建立了一批工厂，边区工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起来。以 1936 年为 100 计算，到 1940 年，边区工厂增加到 533%，资金增加了 534%。仅全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所属各合作社，每月生产的日用品品种就有 20 余种。1939 年新华化学厂成立，主要靠使用边区本地的原料，生产出肥皂、牙粉、墨水、香糊等产品。到 1940 年，边区已能生产的工业品有：药品、植物油灯、纸张、球类、鞋类、毛呢、皮衣服、农具、毛巾、袜子、毛衣、围巾等。机器厂生产出铣床、钻床、车床，还有煤炭、盐、印刷制品等等。

1943 年，党中央提出了“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边区工厂继续增加。当年，职工人数便增加到 12000 人。1944 年，毛泽东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他说：“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侮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建立和发展工业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①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边区开展了技术干部归队、奖励技术发明创造、吸收劳动英雄入党等项活动。到这年底，全边区共织布 24407 匹。绥德分区、延东 3 县其本上做到了布匹自给。边区月生产肥皂 7 万条，并开始生产卷烟，火柴、牙刷、牙粉已可以做到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开始炼铁、烧陶瓷。石油开采也取得了新成绩。其他如建筑、采煤、修路等也都有所发展。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科学技术的支持和工人群众的努力生产。其中，科技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如劳动模范赵占魁所在的茶坊机器厂，是边区比较大的兵工厂。工厂重视政治工作，也很重视科技工作。他们注意发挥每个科技人员的特长，对他们大胆使用，尊重他们的意见。科技人员在厂里能够顺利地领导和指挥他们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中央领导毛泽东、朱德都很关心该厂的总工程师沈鸿、钱志道等，勉励他们努力工作，增长才干，以便待全国解放后领导国家的重工业建设。毛泽东对沈鸿靠自学成才的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②这不仅对沈钱二人，而且对调动该厂乃至调动全边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都具有明显效果。

## 三　延安时期的科学普及事业

科学普及是科学活动的重要内容，是科学研究的继续，也是

① 《解放日报》1944 年 5 月 26 日。

②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1 辑，第 181 页。

非常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离不开科学普及，促进社会经济、文化进步，也离不开科学普及。任何一门科学知识，只有当它为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时，才能成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

在延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科学普及工作，把它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任务去做。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① 毛泽东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内中就包括科学技术事业，包括科学普及工作。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边区的科普工作进展较快。人民中讲究科学，鄙弃迷信的风尚开始形成，一些非科学的陋习逐步革除。

### （一）普及科技知识，提倡大众科学

陕甘宁边区的科普工作是在一个科学文化极为落后的环境中开始的。由于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当时全边区仅有小学120所，在校学生2000多人，② 只占当地总人口比例很少一部分，而文盲却占了边区150万总人口的90%，被称为"文化教育的荒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愚弄，民众中封建迷信观念盛行，长期以来形成了不信科学、信鬼神的各种不良习俗。譬如，在生产上，种地不浇水、不施肥；天旱时不设法引水保苗，反而去求神祈雨；庄稼地出现病虫害不敢治，怕得罪"虫神"。在生活中，不讲卫生，不洗澡，不刷牙，人畜同窑洞，便溺无厕所，有病不看医生而请神巫。当时，全边区共有巫婆、神汉2000多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1页。
② 《延安时代科技史》第432页。

经常利用“跳神”等方法诈骗钱财、欺人害命，给老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直接损害很大。生孩子也不讲卫生，产妇分娩后要坐灰三天，只能喝米汤。婴儿脐带用嘴咬断或用高粱杆、碎瓦片割断，孩子一落生，就用脏布包裹起来，也不洗澡，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很高。当地流传有“财旺人不旺”的说法，真实地表现了那里人口出生率很低的状况。由于不讲卫生，常致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亡率高达60%以上 。据记载，边区每年大约有9万人死于各种疾病，这与边区医疗条件差有关，但主要是源于不讲卫生所造成的疾病高发状况。迷信、不讲卫生的坏习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不利于边区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繁荣。转变这种情况的最有效办法是“向群众宣传科学、卫生常识，开展科普教育，让他们明白迷信和不卫生的危害，提高科学觉悟，自己起来同迷信、不讲卫生作斗争。在党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边区的科普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领导重视是陕甘宁边区科普事业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党中央、边区政府在延安大力提倡科学，一方面，要求科技工作者都明确“科学大众化”的意义，努力把科技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另一方面，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等一些文件，广泛宣传发展科学事业的政策、主张，号召人民接受科学教育，为科普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参与其事。当时，延安开展的很多科普活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

为转变民众中存在的忽视环境卫生的状态，延安开展了经常性的卫生大扫除活动，实际上这也是树新风的广泛宣传。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负责人，每次都积极参加扫除活动。1937年延安举行大扫除，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带队，参加者达千余人，队伍浩

浩荡荡，前面还有化妆宣传的。这样声势浩大的大扫除，在延安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起到了宣传讲卫生、爱清洁的良好效果，对在群众中培养讲求卫生的意识有积极作用。以后，边区老乡也跟着学，纷纷开展大扫除，涌现出不少卫生模范村、模范县。

针对边区群众中识字人少的情况，科普活动采用办展览会等直观形式才能有效地吸引观众。但刚开始时，老百姓认为这是“百怪庙会”，对此持有偏见。党政领导人参加展览会，对消除群众的误解能起较大作用。因此，几乎每次办展览，毛泽东、朱德、陈云等人都去参观。1938 年 1 月，延安要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这不仅是劳动成果展，也是生动的科普宣传。为办好展览会，毛泽东等 43 位同志捐款捐物赞助。闭幕时，毛泽东到会讲话，把奖品发给优胜者。[①] 1940 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业工业展览会开幕，毛泽东不仅出席开幕式，并且被推选为展览会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边区人民“要力求进步”。[②] 领导人的积极参加，使展览会的形式逐渐普及开来。

毛泽东等领导干部十分尊重科学家，重视科普工作。1938 年，著名科普作家董纯才、高士其先后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他们时相往还，关系密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专门同董纯才谈写科普文章的技巧。[③] 温济泽是那时延安写科普作品较多的一个。一次，毛泽东见到温济泽，便同他谈起科学普及的问题。毛泽东说：科普工作很重要，每个人都要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干部首先要学，还要向边区群众普及科学知识，要帮他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443 页。
② 同上。第 445 页。
③ 袁清林：《科普学引论》第 12 页。

们发展生产，讲究卫生，提高文化。我们党内懂得自然科学的人很少。你一定要把这个工作（指科普工作）搞好。①

为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1937年5月，延安创建了中山图书馆。建馆时，毛泽东、彭德怀等纷纷捐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兼任图书馆馆长。毛泽东题写了馆名，并把他每月50元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贴补费捐给了图书馆，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经常带回各种书刊送给图书馆。图书馆影响扩大了，关心它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重庆、武汉，及至香港、巴黎等地，给图书馆寄来各种书报、杂志。馆藏很快达到数万册，报刊100多种，成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阵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促进了边区科普事业蓬勃发展。

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不能单靠文件或颁布政令去推动。清除群众中存在的不良习俗，更不是仅靠行政命令可以做到的。毛泽东说：做好文化工作“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② 为提高大多数群众的科学觉悟，边区采用了行政命令与科普宣传相结合的手段，以宣传教育为主，以行政命令为辅，收到了良好成效。

在科普方面，行政手段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和不得不使用时

---

① 温济泽：《我怎样写起科学小品》，《中国科学小品选》（1934—1949年），第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2页。

才用的。1943 年，陕甘宁边区发生了牲畜瘟疫。一些老百姓按照习俗，不敢去治，怕得罪“圈神”。还把病死的牲畜照往常一贯的做法，扔在路上，或挂在树上，以为可以避邪。结果，造成疫病流行，大批牲畜死亡。据统计，一年内，全边区病死家畜 7800 多头，其中有驴 2200 头。驴是当地主要运输工具，牛马更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依靠。疫病流行，对生产、生活之影响甚大。为及时控制疫情，边区政府立即发布牲畜防疫命令，规定必须把死畜深埋，必须及时报告防疫情况。同时，采用各种形式大力普及防疫科学知识，派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诊治，有效地控制了瘟疫。

边区 2000 多神汉、巫婆是当地一大祸害。这些人大都是当地的“能人”，能说会道、脑袋灵活，一些人还会写一手好字，会诌几句文章，狡猾而残忍，为骗钱财不择手段。一些老百姓却对他们深信不疑；深受其害，还把他们当作“善人”。红军一到陕北，立即开展了反巫神、破除迷信的工作，声势颇大，而且持久。为彻底消灭巫神害人的现象，边区各级政府，一面说服群众破除迷信，一面采取行政手段改造神巫，抓住他们害人的事实，及时给以处理，狠狠打击。为揭穿所谓“请神”、“祛鬼”的把戏，让群众了解真相，干部们让巫神自己现身说法，讲是如何骗人的。有的地方还强制神巫签订公约，让他们保证不再“跳大神”，做“法”害人，公开取缔迷信活动。这样，就从根本上制服了巫神，将大批巫婆、神汉改造成靠生产劳动生活的人。

在采用行政手段的同时，边区把主要力量放在加强科学普及工作上。由科技人员、干部们耐心地作群众工作，同时建立必要的科学卫生普及组织。为解决山地种棉花的问题，科技人员深入山村，给群众算细帐，讲解种棉花的益处，传授植棉技术。最后，征得了农民的支持，经过试种，取得成功。农民中存在着严重的

敬畏“虫神”的迷信观念，这对治理庄稼病虫害很不利。但政府不能发命令强迫农民不信“虫神”，而只能用科学事实去教育农民。为解决虫害问题，技术人员花了两年时间了解情况，蹲在田间实地观察，找到了害虫的活动规律，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然后，在报纸上写文章宣传这种方法。干部将报纸发给每个村，还印了宣传画，广泛宣传，让农民破除迷信，了解、掌握治虫方法，终于治服了庄稼病虫害。①

过去，陕北等地区农民大都沿用传统耕作方法，对选用优良品种不大注意，一些粮种经多年传留后，品质和产量很低了。科技人员为推广良种，先找劳动模范或村干部为良种推广骨干，让他们先试种，成功后再广泛推开。以后又把这种方法固定下来，在村里建立了良种推广试点户，形成良种推广网。依靠事实去感化、教育农民，用对比方法使他们看到科学种田的好处，促使他们自觉地相信科学、应用科技知识，养成科学生产的习惯。在培养群众讲卫生、爱科学方面，科学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市政府为加强环境卫生，扭转不讲卫生的习惯，决定在延安设立卫生事务所，建立了卫生指导区和乡村卫生委员会。这些机构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科普宣传、活动组织，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有针对性地帮助老百姓开展环境卫生活动。如设置垃圾站和公共厕所等公用卫生设施，对改善环境，树立公众卫生意识就很有帮助。象这样的科普活动还很多。经过长期坚持，耐心工作，加上行政配合，边区科普事业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

科普活动只有为群众所理解，才能有所收获。而要得到群众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第282—286页。

理解，科普宣传必须采取多种形式，去打动人心，吸引老百姓。因为考虑到群众的实际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延安的科普宣传，用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很受群众欢迎。针对当时边区文盲多的情况，科技人员多使用口头宣传和办实物展览的方法搞科学宣传。自然科学研究会及各专门学会，经常举办通俗讲座，结合生产和生活中的例子，向各界群众宣传科学常识。他们善于抓住身边的事情，注意及时、生动地开展形象化科普宣传。1941 年 9 月 21 日，延安发生了日偏食。为破除民间“天狗吃太阳”说法，科学研究会便组织老百姓实地观测，边看边讲解，使群众很快了解了日食形成的原理，增长了科学知识。科学工作者赵品三，自己动手制造了地球仪，并拿来作形象教具，供干部、学生和战士们学习地理知识用。延安自然科学院还成立了文艺小组，用演出节目、创作科普小品等多种形式开展科普活动。这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群众性强，便于传播，收效快，有利于科学知识的普及。

边区经常办各种内容的展览，在工农兵群众中普及科技知识，如农业展览、工业展览、生产展览、建设展览、自然科学展览、轻工业品展览、矿石展览、卫生展览等等。这样的展览会，延安每年都举办，参观的人很多。老百姓觉得新鲜，看着过瘾，很快就能了解很多科学技术知识，提高较大。正像一次展览会的《宣传大纲》所言，“展览会是教育群众的良好场所。对于那些‘富于保守性’的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最好办法是用‘具体的事实来证明’，通过‘优劣的竞赛与展览’，使他们提高认识”，促进边区建设前进。①

### （二）开展科学教育，普及科学技术

科学教育是科普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科学知识（数、理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447 页。

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教育，工厂、农场的专业技术培训和民众性科学技术常识教育。

延安学校的科学知识教学具有鲜明特点，“把指导战争和生产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以帮助根据地取得战争和生产的胜利”为办学目标。① 毛泽东提出：要“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必要的课程”，“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积极性为原则。”②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都没有忘记抓科学教育。1939 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决议，规定要“创设技术科学学校，造就建设人才。”③ 1940 年 9 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正式成立。李富春任院长，后由徐特立接任。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本科制理工大学。学院设有大学部和预科，后又增设了补习班、医训班。补习班（初中）学制为 3 年，预科（高中）学制 2 年，大学学制 3 年。大学部设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矿 4 个系，还附设有实习工厂。教员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原来就在大学任教授、讲师，有些还曾经在国外留过学。学校课程设置以应用技术为主，侧重专业学习，意在培养切实可用的技术人才。教材选用当时国内各高等学校通用的课本，也选用一些英文教科书和参考书。几年中，该院先后培养了 500 多名学员，使他们掌握了较丰富的各种专业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了边区科技水平，为抗战和生产提供了急需的人才。学员中的多数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科学教育战线和工业战线上的奠基人或领导骨干。

对生产人员有目的的进行专业科技知识培训，是科学教育的

---

①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1 页。

② 同①，第 69 页。

③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370 页。

重要内容，也是科普事业的重要方面。在办好高等院校的同时，边区还创办了不少中等技术学校和短训班，比较正规的有：边区农业学校、工业训练学校、航空摩托学校、气象学校等。这些学校的课程安排与生活结合比较紧密，对学生注重实际操作训练、技能培养，使他们学会动手去做，学了就能用。

此外，很多工厂、农场也很重视专业技能培训。如边区最大的兵工厂茶坊兵工厂的同志，从上到下都很注重学习、钻研技术。工厂很重视抓技术教育，规定：凡年轻人，每天必须上两个小时课。不少工人刚进厂时还是文盲，经过学习、培训，后来达到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扔掉了“文盲”、“科盲”的帽子。[①] 1940 年 2 月建立的延安光华农场的领导不仅对农场人员的业务学习抓得紧，而且积极向农民、机关干部等推荐优良蔬菜、粮食品种，传授农业知识。农场成立了对农民、干部进行科普教育的科技培养站。他们干什么就学什么，学得自觉又扎实。奚康敏回忆说：“记得有一年，曾试用改良蜂箱养蜂。我就从头学起，看了许多养蜂的书籍，还作了读书笔记。所以，直到现在对养蜂技术还有很深的印象。”[②]

群众性科技常识教育，就是由专业人员在各个适当场合或利用公共媒介，向各界群众宣传科学知识。除了上述口头宣传、举办展览外，最常见的就是在报刊上发表科普文章，利用新闻广播，或印刷出版科技常识小册子。这种教育涉及面广，收获也大。

由于日伪的进攻，国民党的封锁，边区的药品、医疗器械极缺，医疗条件差。为减少疾病发生，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医务科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2 辑，第 229—230 页。

② 同上。第 1 辑，第 153 页。

技人员认真做好“以预防为主”的工作，力求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注意结合医药卫生工作实际，进行科普宣传。如推广新法接生时，医务工作者编写了《妇婴卫生》、《怎样养娃》、《母亲须知》等宣传手册，向群众广泛发放。他们还经常向群众讲解防疫知识和种牛痘、打预防针的常识，以及如何护理传染病人的知识，收到很好效果。到抗战胜利时，边区人口死亡率已从60%以上，下降到30%。在当时缺医少药的环境中，达到这个水平很不容易。这既是医药卫生工作的成就，也是群众性科普教育开展的结果。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报纸，中央规定该报社论必须由中央负责人或主要领导人撰写。为宣传科学精神，教育群众信科学、学科学、用科学，为科普创造气氛，该报曾连续发表有关重视自然科学技术的社论，引起较大反响。《解放日报》还专门辟出科普宣传副刊——《科学园地》，支持科普事业。徐特立写了发刊词。副刊每周出版一期，前后共发表科普文章170多篇，内容涉及范围广泛。譬如有：“为什么雪是白色的?”“为什么队伍过桥时不应齐步走?”“为什么打雷时先看见闪光后听到雷声?”“我们为什么要吃盐?”等等，从题目上看就很吸引人。这些文章通俗易读，文笔生动有趣，经常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从科学角度给以回答，成为很受欢迎的栏目。除《解放日报》外，其他如《边区文化》、《新中华报》等，也登载过不少科普文章。各专业部门和出版部门，还针对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先后出版了很多种科普类书籍，如《农学知识》、《谈谈蓝靛》、《边区气候》、《怎样养猪》、《植棉问题》、《牛瘟和它的防治》、《煤毒》、《改良炉灶经验》、《延安常见的几种慢性病》、《发展边区蚕丝业》、

《如何保持水土、改良土质》等等。[①] 多层次的科学教育，推动了科普事业的深入发展，边区爱科学、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人越来越多。“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最尊重科学的地方。”[②] 不仅在科普宣传和科普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在促进科技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

### （三）让科普事业植根于生产实践的土壤中

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一精神也体现在延安时代的科普事业中。无论是做“科学大众化”的宣传，还是各层次的科学教育，都具有与生产、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特点。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理论与生产结合在一起，正是科普事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表现。

使科学普及与抗战、与生产相结合，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一些同志未能充分认识科普与生产结合的重要性。《科学园地》也登了一些与现实生活联系很少的文章，如《太阳系以外的世界》、《炮打原子》、《地球内幕》等等。这类文章从科普本身角度看无甚大毛病，但在前方抗日、后方生产都很紧张的条件下，科普文章应写与生产实践更具有直接联系的文章。整风中，一些人对此提出批评。陈云提出：“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科学工作。”1943 年，主管科技的李富春写了《给自然科学会的一封信》，要求自然科学工作者“参加边区经济建设的战斗任务，把自然科学应用到边区生产实践中去”。同时，要科技界的同志们帮助解答生产实践中的问题，如怎样使山地改造成水田？如何改进纺纱机？如何提高饭菜营养？如何改良土壤？等等。信中把科技与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447—439 页。
② 袁清林：《科普学引论》，第 9 页。

生产的结合，提到“关系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工作方向、发展方向”和“关系自然科学者与工农兵结合”的高度。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结合当时正在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延安科技工作者就“科学大众化”的意义，科学普及与抗战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董纯才在《谈科学大众化》一文中说：“科学大众化运动，就是请科学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劳苦大众和青少年中间去，和他们结下姻缘，为他们服务。”提倡科学大众化，开展科学普及活动，为的是“扫除科盲，用科学知识武装他们（指民众），启发他们的智慧，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水平，以利发展生产，增进健康。”[①] 文章明确指出了科普与生产结合的重要性，代表了大多数延安科技工作者的共同认识。其他同志也发表了各自看法。讨论是严肃而活泼的。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科技工作者开始注意把理论科学知识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开创了科普、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科普结合抗战、生产，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科学、文化落后的陕北，群众中对科学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为了普及防病知识，科技工作者写了《大家前去种牛痘》；为使人们掌握防空、防毒、防灾疫等方面的知识，董纯才写了《科学与抗战》，高士其写了《防疫的冲锋号》，白华写了《从所谓硫磺弹说起》；结合开发边区矿产资源的工作，武衡、汪家宝、范慕韩等人办了矿物博物馆，教农民认矿、找矿、报矿。自然科学院教师华寿俊研制成功用马兰草造纸的新工艺后，马上向工人推广技术，迅速投入生产。

---

① 袁清林：《科普学引论》第 11 页。

在科学教育方面，学校注意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就接受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延安大学物理系为配合边区建设需要，改物理系为机械工程系，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参加生产。在参加炼铁生产中，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们完成了金属材料这门课程的学习。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是将教学与生产结合较好的典型。该校以培训县区两级经济工作的管理干部为主。学校办有生产自给基地，也就是农事试验场，师生们在这里又劳动、又上课。为改变陕北山区农业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产量低的状况，学生结合实际学习了农作物栽培管理、土壤、肥料、选育良种等课程。在学习、劳动中，培育出各种树苗、蔬菜良种，随后学生们把这些良种交给当地群众推广。这使学生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使学校试验场每年可收获 23 万斤粮食，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

科技人员与工农结合，为抗战发挥最大的创造力。科技工作者有科学理论知识，但一些人缺少实践经验。工人和农民虽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理论知识缺乏，经验中感性知识多，理论性的少。为弥补这两方面的缺陷，应使二者结合起来。经过整风，延安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院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向工农群众学习的自觉性大大提高了。他们面向生产，向工农群众认真求教。康健如在回忆录中写到：为解决高粱减产问题，他向一位 70 多岁的老农请教。他原以为是病虫害导致高粱减产，可老人却说是天下雨太多造成的，但为什么他也说不清。康健如听了以后，大受启发。经过科学理论分析，得知天阴导致高粱无法授粉，造成减产。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了老农和他的儿子，使他们受到了生动的科学知识教育，而康也从中受到了科学实践教育。最后，他们共同解

决了减产的问题。①

科技人员还经常下乡宣传科学知识，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难题。为帮助农民种棉花，光华农场的技术人员每年都背着行李到延长、清涧、绥德等地的棉区去了解情况，一面宣传种棉政策，一面学习、指导种棉技术。既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又推广了植棉技术，普及了农业科技知识。

采用请进来的办法，结合实践请工人、农民传授生产中的实用科技知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科学普及。像自然科学院机械实习工厂，在生产中遇到困难，就把过去在铁路机车厂干过铆工的老工人陈用文请来，教学员们干。终于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造出了设备。

工农群众渴求科学文化知识，在向大众普及科学的活动中，不少工人、农民学习的热情很高，如前所述，茶坊兵工厂就是一个例子。该厂为培训职工，特请自然科学院的同志去讲课，效果很好。被毛泽东誉为“生产是最有成绩的”② 八路军被服厂，也很重视对工人的培训。工厂领导认为，学习是工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工厂规定工人每周要上两次政治课、四次文化技术课、工厂请技术人员教给他们改良剪缝的方法，工人们学习都很专心。八路军制药厂成立了药剂班，由胡博士兼任教育主任，讲防毒学、化验学和制造术。这类结合生产进行的学习活动，既是专业技术培训，又是科技知识的普及教育。

科技人员与工人农民结合，科技工作与生产实践结合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边区盐产量的增加就是一个例子。

---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第286页。

②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2辑，第194页。

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是西北有名的工业。俗谚说："三边有三宝，皮毛、咸盐、甜甘草。"边区的池盐除自己使用外，还远销陕西、山西、甘肃、内蒙等地。抗战中，海盐供应断绝，三边更成为西北民用盐的重要产地。边区靠外销盐，每年可换回大量粮食。但过去采盐全靠人工，费时、费力、效率低。为提高盐产量，科技人员到盐场去实地调查，访问当地盐民，了解盐业生产情况。他们来到花马盐池观察，面前是一片汪洋。老乡说：池中有通天的"海眼"，陷进去就有灭顶之灾。他们根据这个线索，在池边专找"海眼"，发现它是盐水浓度很大的水液出气孔。经过取样分析，决定扩大"海眼"面积，打成盐井，用桶提水晒盐，取得成功。盐民们一辈子也未见过这种像白雪一样的精盐。科技人员及时总结盐民采盐经验，扩建了盐田，制定了简要操作程序，使生产稳步增长，仅3个月就生产出几十万斤盐。《新中华报》较详细地报道了这种筑田引水晒盐新方法的成功，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抗日士气的作用，同时使读者受到一次普及采盐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

延安科学普及事业的兴旺，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边区百姓的健康水平。有助于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为巩固边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 四　科学方法在延安的应用

科学方法是人类从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科技活动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正确法则，反映了人类运用对自然规律的正确把握去改造自然的努力。人们欲获科技事业的成功，必须学会运用科学方法，掌握科学方法论。毛泽东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是什么"与"怎么做"，就体现了世

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因为，世界观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一定的支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解决思想和行动问题的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真正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体，为科技工作者从根本上掌握科学方法提供了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

毛泽东对科技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去指导科学活动很重视，他经常与一些同志漫谈学习哲学的经验体会，与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范畴及方法论问题。他在延安窑洞中写就的哲学名篇，和与此前后，在参加革命实践中提出的科学方法，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提出了“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对立统一的法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哲学和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理论指南。毛泽东的这些科学方法理论，为延安的科技工作者所运用，成为指导延安科技事业前进的强大力量。

### （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概括了人们认识自然与认识社会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认识从实践始，经过理性思维上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又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认识方法。毛泽东主张，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把理论研究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检验理论的方法。要求延安的科学工作者，“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①] 毛泽东指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明的时候。”[②] 科学真理为人们所接受，是

---

①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汇编》。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2页。

在它们接受了实践检验并被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之后。科学离不开幻想和假说。恩格斯曾经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这是科学发展的先导。[①] 但假说、设想、某种科学理论，只有拿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真假、虚实。如果经受住了考验，就会被人们承认为真理，反之，将被抛弃。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并非一次就完成的。根据毛泽东的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无限反复，以至无穷的过程。[②] 就是说，这种方法要求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应该树立实践第一，实践检验理论的观念。通过反复实践、不断实践，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认识研究这种变化运动的科学活动也就没有完结，从实践中产生科学理论，并且又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展理论的认识过程当然也没有完结。而反映这一认识过程的毛泽东的科学方法论就具有绝对真理性，对科技工作具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论指导下，延安科技工作者坚持深入实际开展科学活动，把科学理论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注意向实践中学习，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学习，促进了延安科技事业的前进，也推进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以气象工作为例，以前，陕甘宁边区没有气象站，农业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但农民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表现当地气候变化规律的经验。这些经验反映在一些农业谚语中，如“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就是对预测明日是否降雨的经验总结。再如，“热生风，冷生雨”，则是对未来是否要刮风下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6—2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5—296页。

雨的经验性概括。科技工作者注意搜集这些农谚，并根据科学理论给以合理的解释，然后将之运用于气象预报中，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果。1945 年，延安科技工作者从美军观察组手里接收了气象站，开始建立边区自己的气象事业。当时，气象台的工作主要是为机场提供可靠的气象预报保障在延安起降的飞机之安全。气象台的干部大多不是学气象出身的。为了尽快掌握气象变化规律，做出准确预报，他们一面坚持学习理论知识，一面坚持每日进行观测、预报实践，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善于结合实际问题学习。如听有经验的飞行员讲飞行对气象的要求，向农民学习农业谚语等，很快就掌握了科学的预报方法。①

延安的科技人员针对工作中的新情况，总是先查资料，然后请教有经验的工人师傅。自觉地运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方法，在此过程中，增长自己的才干。

### （二）调查研究方法

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实地考察、采访，找出问题，然后，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作深入分析研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套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人的认识、思想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准确认识、把握事物的现象与本质，就必须首先通过观察，对事物有所了解，然后用正确的理论、观念去分析事物各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最后得出科学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这个过程，正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毛泽东对调查研究法十分看重，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16—21 页。

权”的著名论断。[①] 在延安整风中，他大力提倡并在全党推广调查研究法，抨击那种“下车伊始”，便指手画脚地要改造、指挥人家的不良作风。他号召党员干部动用调查研究法去认识问题，解决矛盾，推动工作。这在科学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延安经济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科技工作者先要了解、掌握延安的经济发展的准确数据。为此他们运用调查研究法，迈开双脚，跋山涉水做科学考察，勘察了陕甘宁边区的矿藏资源、土壤、林业等情况，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为科学地制定边区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941 年 9 月，延安地矿学会组织了地矿考察团。分两路由延安出发，赴子长县、米脂县、绥德县和延川、蟠龙、永坪一带开展以勘察油田状况为主的地质普查。通过调查对陕北盆地的地质状况获得了概括的了解，把握了延安地区地质构造情况，以及当地煤、铁、石油、油母页岩等地质矿产的蕴藏情况，为此后边区地质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徐特立，对此次调查评价道：“此次地矿学会出发考察，不仅了解边区地质，解决了一些开发矿产的问题，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的意义。”[②] 在此前后，边区的地质工作者还对延长油田、关西铁矿、瓦窑堡煤矿，以及三边等地的盐、碱、石膏、芒硝等矿产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些综合的或单项的科学考察，遍及边区各县。科技人员将所掌握的边区的土壤、农作物、森林、矿藏、水利和生产建设情况写成调查报告，供边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之用。这种调查研究方法，不仅应用于科技工作开始之初，也较为普遍地被用于科技和生产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987 页。
②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25 页。

动过程中，效果都比较好。

### （三）古今中外法

所谓“古今中外法”，就是研究工作，解决问题时，要善于运用古代人、现代人、中国人和外国人所提供的各种可行的经验去作广泛、深入地思考，在比较中，融合好的优秀的适合本地情形的方法，去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毛泽东之所以倡导这种方法，是因为他坚持历史唯物论，对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从不忽视和盲目排斥。同时也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受到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有关。杨先生提倡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方法，认为：“作学问，研究问题，要善于“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在学习外国的东西时，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具有批判精神。[①] 毛泽东受到这种思想影响，青年时代就认为：要寻求救国真理，就要学习新文化。主张青年应多读新书，做到汇百家所长，熔铸于一炉，从中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想法后来便发展为古今中外法。[②]

古今中外法是具有较强包容性的科学认识方法，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中外一切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的伟大气魄。延安科技工作者以这种方法为指导，在学习、研究中外科学理论方法时取得较大收获，在使用、引进外国先进科技成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功。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学校，都将数学、物理学、普通化学、外国语等学科列为学生学习的共同课程。[③] 教师在讲课与研究中注意介绍广泛的文化知识，只要不破坏抗战、不破坏团结，不反共反人民，就可以自由讲学，自由争论，互相批评。[④] 为强化学

---

① 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18—120页。
② 《毛泽东青年时代》，第84页。
③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368页。
④ 同③，第386页。

生对专门知识的学习，中共中央将自然科学院的专业课程课时定为80%，纠正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程的现象，目的是要培养出一代具有广博文化科技知识的青年。[①] 不仅在学校课程安排上，而且在对待一般干部的学习中，也运用了古今中外法。1940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规定："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②] 这里不仅没有"政治冲击一切"，相反，给干部学习中外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

在生产实践中，这种方法也被广泛地使用着。延安光华农场从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先后引进了许多优良品种，其中有美国的品种男爵白皮马铃薯、紫圆茄子、甜玉米、露八分萝卜；有四川彭县的黄皮马铃薯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西红柿、葱头、生菜、菜豆、油菜、雪里红、冬瓜、苦瓜、丝瓜、芥兰等等蔬菜；还有甘露西瓜、黄金瓜、小糖瓜、草莓、国光苹果、黄元帅苹果、葡萄、梨等水果；还引进了美国的黄金烟和古巴雪茄烟品种。[③] 在粮食、棉花生产中，也引进了不少中外优良品种。这些优良品种的引入、试种，都比较成功。科技人员还接收了从反动军阀手中缴获的荷兰种奶牛40头，美利奴种细毛羊240多头，以此为基础发展起延安的畜牧兽医科研工作。他们将研究与生产相结合，每天向延安部分老、弱、病人、婴儿供应鲜牛奶。当时，连日本统治的大城市北平也好久见不到牛奶，而在西北偏远的延安，却出产牛奶和各种优质蔬菜、水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④] 这个奇迹的出现，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387页。
②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387—388页。
③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53—63页。
④ 同上书，第53页。

正是延安人运用古今中外法于科研与生产活动上的必然结果。

古今中外法不仅用于在科研中对研究对象，从各种角度进行比较、对照，用于生产和科学试验中，而且也被运用于科普活动和宣传扩大科学影响的活动中。1942 年，是著名科学家伽利略逝世 300 周年和牛顿诞生 300 周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本着学术研究一定要继承历史遗产的精神，在延安召开纪念大会，举办纪念讲座，会上介绍了伽利略和牛顿的生平事迹。徐特立做了《对牛顿应有的认识》的报告。报告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剖析了牛顿的科学体系，指出："批判地学习他（指牛顿）的方法，把它变成自己的方法。""要用辩证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象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为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狗肉。"① 徐特立的报告，表述了他和延安科技工作者对古今中外法的理解。这一方法的精神实质与鲁迅的"拿来主义"精神相类，体现了对一切优秀文化都要吸收的积极态度。我们对这一方法在延安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不应低估。

**（四）实事求是法**

实事求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也是一种科学方法论。毛泽东在延安首先采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并将它具体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真实事物；"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的规律。"实事求是"，即通过研究客观事物，去寻找和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从根本上、本质上认识事物，掌握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② 提

---

①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知识出版社，1983 年版，第 6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801 页。

倡实事求是，就要根据客观条件去确定开展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而不能凭主观去臆断，不负责任地作决定，提出脱离实际的主张。实事求是法，要求人们在解决问题时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去确定正确方案。这个方法说来简单，做起来颇难。因为客观事物本身是变动不居的，表面现象与本质内容往往有很大差距。如果不善于观察、研究，而错把表象当作实质，就会产生误差，做错误的判断，干出蠢事，就谈不到按实事求是的方法行事。

在发展边区科技教育事业和经济方面，如何依实事求是法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此，延安的科技人士曾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关于如何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的问题上，一些人认为：延安的科学教育应该办成正规的高等教育，而办高等教育没有理论是不可能的。因此，主张学生应系统地学习基础理论课。[①] 这种观点引起了争论，后来发展到全延安科学技术界。各经济部门、工农业和国防工业的科技工作者都参加了讨论。一部分人认为：边区教师、学生水平差，设备条件差，不应当办高等教育。而应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解决困难”。[②] 另一部分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边区没有条件办自然科学高等教育，主张取消延安自然科学院，只办中等职业学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边区的实际工作中，正是由于缺乏基础科学知识，才遭到挫折或失误。所以，尽管边区条件差，但也并非不能办自然科学的高等教育。[③] 双方经过近 9 个月的争论，最后得出初步结论，即应本着实事求是法，按客观条件制定出可行的教育方针。教育要与生产结合起来，理论要与实践相统一，科学要与建设、与国防挂钩。学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377－378 页。
② 《解放日报》1942 年 11 月 9 日。
③ 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第 29 页。

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科学技术干部，给他们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徐特立认为：那种“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与“社会即学校”的主张都是偏面的看法，都是应该加以反对的。徐老的结论，给延安科学技术界以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原理的启示。[①]他那既注重基础知识教学，又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地办教育的看法，正是运用实事求是法的结果。由于实行了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延安自然科学院为党培养了一大批科技教育干部和专家。

对如何进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延安科技界也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有的人提出办大工业的设想，认为边区石油开采业的规模与前景可观。一些同志还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和“飞机满天”、“坦克遍野”等不切实际的计划。这无疑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方法，因而是行不通的。对此，毛泽东曾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这种思想。[②] 在延安整风中，通过学习、讨论，科技界人士澄清了模糊认识，纠正了不切实际的想法。他们根据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般原则，“提出了三十四个问题”，认为主要应该“把学与用紧密联系起来”，把“科学教育和各种实业教育联系起来”，“将科学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③] 以实事求是法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找到发展边区经济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培养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的园丁。他们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论述和活动，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和他的科学实践活动，是推进延安科技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驱动着陕甘宁边区的科技巨轮滚滚向前。

---

① 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第 37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93 页。
③ 《如何联系实际》，《解放日报》1942 年 10 月 11 日。

# 第六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工作的思想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内容丰富而精深。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工作的思想随着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日益成熟和完善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体育工作和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工作的思想对于理解他的整个文化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开展军事体育运动

毛泽东历来对体育十分重视，既有亲身的大量实践活动，又有理论上的探讨。他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体育思想，总结我国体育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我国实际的体育理论——毛泽东体育思想。毛泽东的体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论著、指示、题词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体育工作的文件里，表现在毛泽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实践中，内容极其丰富。

毛泽东 1917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和毛泽东的有关信件和指示，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体育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他关于体育本质、目的和战略地位的精辟见解。

毛泽东在丰富的体育实践和革命活动中，对体育的本质作出了唯物主义的概括。首先，他对体育的涵义作了科学的解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

言者也。”① 这就说明体育是人类特有的锻炼身体的方法，体育能使人体均衡全面发展，其本身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其次，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② 毛泽东对体育的见解，一方面指出了体育的基本作用表现为自然的，即增强人的体质，起着“强筋骨”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指出体育的作用又表现为社会的，即参加体育活动还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砥砺人的意志品质。因此体育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对于国民素质的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体育的目的，毛泽东一贯认为，体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人民体质进而保家卫国、振兴民族。青年时代，他针对“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可忧之现象”③，提出我们搞体育不是为了当选手、出风头，而是“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为国也，此大言之也；”④ 可见当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体育活动固然有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一面，但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的历史条件下，实施体育更重要的目的是唤起民众从事体育，增强体质，保卫国家和振兴民族。

基于对体育的本质、目的的清醒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明了体育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战略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体育的认识已由青年时代为振兴国家民族而倡导体育，发展到直接把体育同中国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主张开展体育运动要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服务。延安时

---

① 《体育之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 2—3 页。
② 《体育之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 9 页。
③ 《体育之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 页。
④ 《体育之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 年版，第 6 页。

期，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对体育工作十分重视，积极推动体育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服务，把开展体育运动，尤其是军事体育运动作为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措施。1942 年 9 月，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写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①] 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1942 年 9 月，毛泽东在接见一二〇师篮球队时说：你们一面打仗，一面开展体育运动的做法很好，我们的军队是很需要体育的。并举例说明战士具有强壮的体魄和运动技巧，对于克服战地困难的作用。鼓励运动员们除了坚持锻炼身体外，要忠心耿耿地为无产阶级打仗。[②] 1942 年 10 月 27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在《开展部队中的军事体育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是目前我们训练部队的迫切重要工作之一。的确，假如我们的军事体育进行得更好的话，那我们的技术和战斗力，无疑会比今天更加提高一步”。朱德总司令也亲自撰文强调军事体育的重要性及其开展方法。他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中写道：“为提高部队的技术学习，尚有二事是需要举办的。其一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锻炼体力，养成尚武精神的问题。其二是部队中……以连或团的单位，挑选几个好的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做为大家学习的标准。”[③]

在毛泽东为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大力开展军事体育运动的思想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军队中掀起了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潮，广泛开展了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当时八路军中开展的体育项目有射击、跑步、刺杀、投手榴弹和梭镖、越障碍、过独木桥、爬

---

① 《新体育》1977 年，第 6 号。
② 参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G8，1985 年第 3 期，第 13 页。
③ 《解放日报》1943 年 8 月 18 日。

竿、爬绳等许多种。有一种名曰“爬云梯”的比赛项目，规定战士背着枪，医护人员背着药箱，炊事员背着铁锅参加。还有“抬担架”、“背人赛跑”等项目都是根据实战需要创造的。除军事体育项目外，田径、球类、游泳、滑冰、打猎等体育活动也十分盛行。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便是在全师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成立的。该球队是陕甘宁边区最具实力的一支球队，在1942年“九一”扩大运动会上夺得篮球冠军。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领导在鼓励战士们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同时，也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常进行冷水浴，带头做操和跑步。他不但爱打篮球、踢足球，还特别喜欢打乒乓球。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及早年体育生活时曾说：“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① 而且毛泽东对体育的提倡和参与，一直贯之以终。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全军的体育锻炼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37年，红军第十五军团驻陇东一带整训时，举行了一次为时两周的运动会。张学良的东北军闻讯要求参加，于是展开了一场两军对垒的体育竞赛。红军七十三师的战士们全副武装，扛着机枪和小炮，一小时内跑完十多里路，仍然个个精神抖擞，而东北军的士兵跑完同样的距离后，累得纷纷躺到在地。其它项目如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东北军也都输给了红军。旁观的一位东北军高级军官感叹道：你们两个月的整训，胜过东北军几年的训练。②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在军事上

①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9页。
② 参见《中国体育史话》第234—235页。

彻底取得胜利，在1945年冬，基本上组成了未来解放全国的几支野战军。次年，各野战军根据党对练兵工作的指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练兵高潮。在练兵热潮中，各野战军部队都十分重视实践中必备的劈刀、刺杀、投弹、射击的技能训练，同时也广泛采用了木马、杠架等军事体育内容。仅从陕北边区保卫团的一次技术表演中，便可看出练兵运动的成绩。该团有的战士能原地屈身把手榴弹掷出57.6米，有的能携带驳壳枪、炸弹及大刀于6—7秒内通过全部砍杀障碍，其刀锋劈入木人2寸余。对这样的成绩，团队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投弹要求无论从窑洞内向外，或从地上向窑洞顶；从围墙前投向墙后都能打中目标。射击要能击中混在群众中的敌人，还要学会白刃战时的打斗、夺枪、摔跤等技术。[①] 经过练兵运动的推动，部队战士的作战技能迅速提高，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概括说来，延安时期毛泽东体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关于军事和体育相结合的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体育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把体育作为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强调了体育能增强体力、体质，培养部队勇敢、顽强、机智灵活、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良好的战斗作风，有利于丰富部队文化生活，活跃部队；三是强调从实战需要出发开展体育活动，把军事训练与体育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开展的练兵项目既是军队训练课目又是体育运动项目，既练战斗技能又练体力，获得一练二得的效果，使体育在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① 参见《体育运动史》，人民体育出版社，第416—417页。

## 二　组织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体育”蓬勃开展。虽然因环境和物质等条件限制，水平略显“偏低”，实施尚欠“规范”，但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却不可低估。这种体育的影响表现在：

其一，如上文所述，对造就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革命军队，捍卫民族独立，推翻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作出了贡献。

其二，在中国体育史上第一次以劳动人民为对象，并以其根本利益作为体育方针、政策及具体实践的出发点，在一定范围内使劳动者享受到体育权利，结束了剥削阶级垄断体育的历史。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摧残工人及其子女健康的，工人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们，应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要为争取包括体育在内的教育权而斗争。在旧中国，工人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和体育的权利，一般学校的体育设备很差，贫穷落后的农村则更为甚之。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是极为恶劣的。为改变这种状况，争取保障人民大众健康的体育权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的健康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把争取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子女健康的体育权利，视为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任务之一。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致力于革命活动的同时，对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发表了许多见解，对体育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如小学教师的知识结构，健康及薪金，公共体育场和娱乐设施的建设，劳工住宅及娱乐活动，女子放脚问

题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除了注重工农红军的体育外，还十分重视苏区的体育事业，积极支持群众体育运动，以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群众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思想。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广泛发展群众的体育运动，根本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一切人民都逐渐地离开愚昧和不健康的状况。①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得到极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各部队、工厂、机关、学校的体育活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每天黎明，四面八方的哨声、号声、钟声、锣鼓声响成一片，人们纷纷起来活动筋骨，早操锻炼。延安地区不但各学校、机关成立有若干球队，兵工厂、纺织厂、肥皂厂、印刷厂和纸厂等也都成立了球队。滔滔延河水，是红色体育蓬勃开展的历史见证，它岸边宽阔的沙滩，是天然的田径场。夏天，延河成了天然游泳池，突出的石崖成了理想的跳水台。每年举行的水上运动会都要表演骑兵武装渡河、步兵武装泅渡、潜水、跳水、水球等丰富多彩的项目。冬季，延河又成了天然溜冰场，每逢周末的夜晚，雪亮的汽灯高挂，滑冰能手们穿着延安兵工厂用炸弹皮做成的冰鞋往来穿梭。

当时，在延安城内，县城的居民经常在群众运动场参加篮球、排球、乒乓球、象棋、军棋等娱乐活动。在农村，体育娱乐活动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据 1937 年 3 月 16 日《新中华报》载，在群众体育广泛、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涌现出了象延安西区一乡

---

① 参见《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 52 页。

这样的全县闻名的体育模范乡。全乡23个村，村村有体育场。在乡所在地的体育场，每隔5天，全乡少年儿童便来此进行军事性质的体育训练。

在根据地，大、中、小各级学校中都设有体育课。有些学校，在一学期20周内，12周安排了与体育和学生身体有关的各种活动，如乒乓球、排球、滑冰比赛等。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医科学、青年干校等学校都设有俱乐部，负责组织体育活动。在艰苦的条件下，延安大学还设立了体育系，开设有十多门课程，为解放区培训了一批体育专门人才。

随着群众体育广泛深入的开展，边区的竞技活动也越来越盛行。从1937年起，“五一”运动会（1937年5月）、陕甘宁各机关的“五卅”运动会（1937年5月）、“八一”运动会（1937年8月）、绥德警备区司令部“九一八”运动会（1937年）、后方直属机关“九一八”运动会（1939年）、“九一”扩大运动会（1942年）等相继举办。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是延安的“九一”扩大运动会。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42年9月运动会在延安青年运动场开幕。大会通过了定9月9日为体育节，成立边区体育总会等决议。参加比赛的健儿，除延安地区外，还有三边、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等地的代表，一千多名男女运动员中，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少数民族的运动健儿，不仅有八路军战士，还有日本反战同盟的志士，可谓人才济济。在历时6天的比赛中，进行了100米、1500米、1万米跑，跳高、跳远、铅球、篮球、排球、游泳、射击、投弹、爬山、超越障碍、网球、足球、棒球、武装泅渡、跳水、举重、单杠、双杠、团体操、集体舞、武术、骑术等项目的比赛和表演，各项运动均获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次热火朝天的群众体育盛会，在中国体育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体育史

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延安时期的红色体育，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有广泛群众性的体育。它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不分高低贵贱，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都来参加锻炼。它为革命斗争服务，目的在于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体质，这是体育宗旨的真正体现，也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一体育思想的体现。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体育思想在延安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不仅使体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体育为国防服务”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 三　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百业凋敝，经济破产，广大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到处哀鸿遍野，疫病连绵，医药卫生状况极端落后。上海市在解放前 50 年内，有 12 次霍乱大流行，从 1937 年至 1946 年不足 10 年间，患霍乱的病人前后约有 25 万人，死亡在 10 万人以上。东北地区于 1910、1920 和 1947 年三次发生鼠疫，死亡人数亦逾 10 万。据北京市第一卫生所统计，从 1915——1925 年，城市居民结核病死亡率达 2—4%（农村比例更高），居当时世界高位。此外象天花、性病、伤寒、疟疾、麻风、黑热病、钩虫病以及各种地方病也肆虐八方，危害甚剧。

旧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残缺不全，许多省市根本不设卫生行政机构，到 1945 年止，全国 22 个省中仅有 16 个省设立了卫生处，即使设置了卫生机构的地方也丝毫不管人民的死活。至于卫生防

疫机构则等于没有，就是医院也少得可怜。以解放前数字最高的1947年为标准，全国仅有大小医院2000多所，卫生技术人员23000多人，病床90000张左右，其中公立医院只占2/3。这些医院几乎全部设在大中城市，医院里设备简陋，技术庸劣，而诊费又十分昂贵，除了少数官僚、士绅及地主资本家，一般工人、农民看不起病，农村从未设过医院，连诊所也很难寻觅。

旧中国的医学教育也很落后，不仅高等医药院校凤毛麟角，就是中等卫校、护校也稀少得很。据统计，到1949年全国仅有公私立医科院校38所。从1928年到1947年的20年间，只培养出2万名正式医生。这些医生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与广大农村几乎完全绝缘。

旧中国的医药工业十分可怜，就连普通药物和一般医疗器械的生产也是量少质差，至于抗菌素药物或大型精密医疗器械就完全仰仗于外国进口了。

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卫生状况，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后就把卫生事业的发展，列为党的斗争纲领之一。毛泽东对党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历来极为重视。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领导创办了第一所红军医院。他认为“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是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必须做好的大事。① 在1933年《长冈乡调查》一文中，还专门写了“卫生运动”一节，强调卫生工作要大搞群众运动，指出“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② 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也提出了要关心群众生疮害病的问题。③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54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第320—32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37页。

延安时期中国革命逐步从低潮走向高潮，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建立起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革命队伍日益发展壮大，开辟了更广阔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医药卫生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批伤病员需要救护，许多经过长征的老红军积劳成疾，甚至重病缠身，急需治疗。而地处偏远山区的陕甘宁边区交通不便，贫困落后，缺医少药。1940年，全边区各种程度不同的中医合计千余人，工作在机关、部队的西医只有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群众患病医治难，只好求助于神灵，这一年巫神招待费高达2361万元（旧币），59个巫医治死病人278人。一些地方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年人死亡率达3%，牲畜死亡率也很高。

为了尽早消灭愚昧与不卫生的陋习，提高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水平，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发展人民医药卫生事业的思想。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① 1944年5月，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要提倡卫生，要使边区一千多个乡，每乡设立一个小医务所。"②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指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③

"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是毛泽东卫生思想的核心，它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11页。
②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5月31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83页。

含了丰富的内容。

首先，它包含了毛泽东提出的预防为主与群众卫生运动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的思想。遵循毛泽东这一思想，中共中央提出“救命第一”，要求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放在群众文教工作的第一位。军委卫生部也明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方针，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940年5月5月，边区民政厅、八路军军医处共同筹备的延安防疫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委员会是延安防疫最高领导机关，负责推动延安地区的卫生防疫运动。1941年《解放日报》的《卫生》副刊创刊，延安医学界知名人士纷纷撰稿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反巫神、反迷信的斗争。延安中央医院还举办了大型展览会，宣传医疗技术和卫生防疫知识。1944年春，延属部分县瘟疫流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再次强调大力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边区政府随即组织大批医务人员下乡，扑灭疾病。并分别召开卫生防疫会议，举办卫生展览会。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通过了加强卫生工作的提案，兴起了一个群防群治的卫生运动，涌现了许多群众卫生模范工作者，发现并培养了许多卫生模范村，出现了一大批卫生模范家庭，及时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1945年4月，为进一步提高卫生防疫工作，毛泽东同意有关同志提出的中央卫生工作应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并命有关人士撰写社论、文章进行宣传。4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的社论，提出了医药工作要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1946年延安总部卫生部，明确提出了“预防医学设施自1946年起，应成为解放区医学界的主要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克服了单纯治疗的观点，奠定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基础。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群众卫生运动的发展。

其次，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包容了毛泽东大力倡导的健全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的医疗卫生机构的思想，在党和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下，延安时期，人民医疗卫生机构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医疗卫生机构的设置、医疗条件和水平的提高、医学教育和医药工业的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救护和医治伤员，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成立了许多医院，如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延安中央医院、边区医院，各根据地也各自建立了医院，如晋察冀边区医院、八路军一二〇师野战医院、晋绥解放区贺家川医院、新四军皖南小河口后方医院、云岭南保村前方医院、新四军一支队神塘圩医院、新四军三支队大王庄医院、苏中军区后方医院、苏浙军区野战医院和盐城军部海圣庙医院以及新四军二师大柳营医院等。由于敌人反复不断地进行“扫荡”，医院难于比较集中安静地工作，只能因地制宜，分散隐蔽进行治疗。因此，多种形式的医院应运而生，如华北地区的“地下医院”，山区的“山林医院”、“山洞医院”等，据统计各根据地共创建了 50 多所医院。其中许多医院已颇具规模，如延安的中央医院已成为一个足以担负起各种疾病治疗的比较先进的医院。它不仅是中央的直属医疗保健单位，也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医疗中心。它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为医治延安党政军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病伤，为根据地培养医务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从 1939 年至 1945 年该院共收治病伤员 12677 人，接受培养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来院实习医生 115 人。抗日战争时期中，上述医院共收治了 30 万名伤病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这些较为正规的医院以外，陕甘宁边区还按系统、行业设立了各种类型的医院、医疗站、疗养社，各分区均设有较大的卫

生院和医疗点，连队有卫生员，各县设有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每区有1个卫生所，还设有防疫、妇幼保健机构。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医疗卫生网。这些医疗机构不但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治病，而且还面向群众，为单位所在地区的群众看病。据统计，边区医院在1943年一年间，为当地群众治病高达9611名，占病员总数的30%，治愈9322人，达97%，这些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上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健康，有力地支援了抗战的进行。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医疗机构和设施进一步完善。在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将原在民政厅下的卫生处扩大为卫生署，管理全边区的卫生工作。从而加强了各解放区部队的卫生组织和力量;并吸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伤治疗上的新经验，采用了合理的适合大兵团作战的卫生勤务组织，顺利完成了部队各项卫生工作，救治了一百多万伤病员。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军委也加强了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总卫生部，各野战军和纵队设有卫生部，旅设卫生处，团设卫生队。野战军卫生部下设野战医院、手术队、基地医院、野战区兵站卫生所、野战军转运总站和转运站。在部队的基层卫生组织中，连队设卫生防疫委员会，每班设卫生战士。在战伤救治中，建立了由火线到兵团与后方医院的阶梯治疗和医疗后送制度，并开展了火线“普遍包伤运动”和“战伤自救互救运动”及要求人人都会救护裹伤的群众性战伤救护运动，由过去部队卫生机关各自分散的治疗、救护，而发展到组成“联合抢救组”、“团联合绑扎所”和“师联合手术队（站）”，做到“高度运动，大量收容，哪里作战，哪里收容”。顺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卫生和救治工作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随着边区和各根据地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医护人员缺乏问题日益严重，许多伤病员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而丧失生命，造成残废。为提高医疗水平，缓解医护人员缺乏的问题，在毛泽东关怀下，边区政府和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了医药院校。原军委红军卫生学校于1940年改为中国医科大学。该校是八路军创办的一所医科专门学校，该校分设四个班，共有学员300多人。设有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生理、解剖、病理、诊断、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药物、处方、妇产、护理、调剂等课程，还设有生理实验室、解剖实习室、化学试验室等10个实验室。学校隔壁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被作为医大学员实习的场所。学员们边实践边学习，大大提高了医务技术水平。毛泽东对医科大学极为关心与重视，多次亲临学校视察。1941年春，毛泽东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宿舍、厨房、实验室，听取了学校领导人的汇报，在实验室外的广场上对全体师生们讲了话。他说：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就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了生命力，就会枯萎、死亡。他还指着山边的小树比喻说，中国医科大学就像这棵小树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目前的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将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学校会发展得更大更好的。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①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党的医学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继中国医科大学之后，相继开设了延安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华中医科大学、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第292页。

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华中医学院、晋冀鲁豫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学校、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和苏中学校及苏浙医务职业学校等，培养了 3000 多名卫生干部。

在解放战争中，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各级部队卫生部门，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医训队、轮训队等，解放区的医学教育有了很大发展。1946 年，延安医科大学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为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卫生学校也扩充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军委卫生部设立了 3 个军医大学，各大军区成立了 5 个军医学院，各省军区也开办了卫生学校，总计全军所办的学校毕业的医生和司药近 6 千人。如果将短训班和在工作中培养的卫生人员计算在内，全军护士以上卫生人员中，70%以上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他们组成了解放区卫生工作的骨干队伍。

在边区和解放区医疗机构与医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医药工业也有所发展。1938 年建立延安制药厂，每年可生产丸剂、片剂、水剂等各类药物十几万磅，其中主要是中药。各军区成立的药厂，不仅进行中药炮制和西药制剂加工，而且还能制造某些玻璃器具等医疗器械。以后兴办的许多药厂已能制造原料药、特效药，如葡萄糖、磺胺、麻醉药、疫苗、血清等。

为了不断地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在陕甘宁边区还陆续成立各种医药学术团体。如：陕甘宁国医研究会、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中西医药研究会等。医药书籍的出版工作也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仅在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出版的医药书籍、杂志、画刊就超过国民党统治区同一时期出版的同等书刊的数量总和，其质量更远胜于国统区。

在毛泽东消灭愚昧与不卫生的状况、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的思想引导下，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在延安时期获得了大发展，

它不仅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四　推广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中医中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数千年来，形成了一套完整、全面的中医中药理论体系，对人民的健康和祛病延年起着重要作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保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840年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医地位日渐衰落。辛亥革命后，在维新思潮与全盘西化的影响下，中医中药日益受到歧视和排挤，当局也歧视中医，不准中医办学。1908年，“太医院”医官被革职，连贵族式的医学教育也停办了。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发表谈话，竭力主张“废止中医不用中药”，遭到中医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利用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正式宣布废除中医。在议案中还规定许多具体消灭中医的办法，如“禁止旧医学校”等。国民政府这一议案一出台，当即引起全国中医界群起反对，并组织起请愿团，公众舆论也给予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在中医药界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中医中药未能取消，但政府当局仍然对中医药活动多方限制，如禁止中医使用听诊器等。一直到1933年，国民政府才被迫由立法院颁发了《中医条例》，卫生署中设立起中医委员会。但中医教育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支持，致使这一事业濒临绝境，中医中药后继乏人。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

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祖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中医中药是中国优秀文化中的一枝灿烂奇葩，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传统对改变旧中国落后的卫生状况，提高群众的医疗水平，防病治病，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有着重要作用。

然而，面对滚滚如潮的西学的冲击，走什么样道路才能更好地保持和发扬中医中药之所长，一直是人们不断探索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结合中国既有中医又有西医的实际情况，根据人民防病治病的需要提出推广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方针，发展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所谓中西医结合，从广义地说，就是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方法与西医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体系，在防病治病上各有长短，中西医结合就是在中医学、西医学各自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取两个不同医学体系之长，取得既源于中医又高于中医，既源于西医又高于西医的治病疗效，并进一步从大量治病的实践中探索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知识和医学理论。

毛泽东这一思想，不仅为中国医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而且对延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医学事业的兴旺发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毛泽东倡导的中西医团结合作，“用中西两法治疗”① 的思想指导下，各革命根据地的中西医团结一致，密切合作，自力更生，自采自制中草药，战胜了敌人封锁所造成的困难，缓解了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65页。

疗药品的不足，挽救了许多干部和战士的生命。同时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提高了医疗水平，促进了边区医学事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长期恶劣的物质生活，前方和根据地伤病员数量很大，加之敌伪对根据地的封锁，造成根据地的药品奇缺，少量的贵重药品只能重病伤员使用，对于一般伤病员均采取土法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例如，没有消毒、消炎药品，就把粗盐熬成细盐，再加一定比例的水过滤，做成“生理”盐水，用来治疗外伤；拉肚子也常常服以当地生长的马齿苋等中草药，再让患者吃些稀饭，面条汤逐步恢复。伤员手术后，多采用中草药治疗，痊愈很快。部队中都配有用布制成的长方形中药袋，装上各种中草药，随身携带，应用起来颇为方便。用中草药制成的白芷膏，用于治疗外伤，疗效甚佳；用柴胡制剂代替消炎药，用红升丹、白降丹之类的中草药辅助外科治疗，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缓解了西药极缺的问题。

1944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讲话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① 毛泽东这一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进一步强调了“中西医合作”，反对巫神，推动防疫卫生”的重要性，组织了边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12 页。

区各县的医药研究会和座谈会，交流经验，提高技术，公开了许多秘方、验方，打破了门户之见，更好地实现了中西医合作。

1945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暂行组织简章》规定：（一）该会以团结和提高边区医药人员、助产人员、卫生人员，实行中西医长期合作、协助政府推广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为人民服务为目的。（二）确定在延安设立边区中西医药总会，各分区设立分会，各县设立支会。总会由边区政府聘请边区医药界有声望者35人组成，并由总会推举13人组成常委会，设正副会长各1人，下设秘书处、中医部、西医部；分会由专署聘请9至15人组成；支会由县府聘请7至11人组成。各级研究会的任务是：受同级政府之委托，帮助卫生行政机关与卫生技术机关解决卫生、医药问题；宣传、组织中西医药人员与助产人员以加强边区医药建设工作。1945年3月，陕甘宁边区中西医研究总会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词说："边区中西医研究会的成立，是毛泽东主席文教统一战线政策及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关于中西医合作方针之具体实现。"①

在边区政府这一行动的带动下，各地成立了中西医药协会、中医小组和县区医药社，还组织中医培训班、研究班及老中医带徒弟等，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解放区的中医不仅参加各级医疗机构，而且有不少中医担任卫生领导工作，其地位与国民党统治区有着天壤之别。在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医学院校里，学员们中西医兼学，不论中医、西医，都要学一些人体解剖知识及中草药知识。许多医务人员也极为重视中医的学习，他们四处奔走，学习总结当地中医经验，搜集、整理、推广家传验方和民间传统的治疗方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第225页。

法，然后应用到医疗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中医中药的作用。

在延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广大医务人员坚持毛泽东推广中西结合的医疗方针的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医中药的发展，而且走出了一条中西结合的治疗的新路，为根据地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新中国的医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 五　精益求精　救死扶伤

精益求精，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卫生工作思想的一大特色，是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的新发展。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长期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为了党的建设的需要，为了战争和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量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① 毛泽东对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尤为关注。他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做到"德才兼备"。这就是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不仅在医德上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而且在医术上要精益求精。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纪念白求恩同志逝世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纪念白求恩》的演讲。他号召广大干部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号召大家学习他对技术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26 页。

端的热忱。”他进而引伸道：“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般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般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①

白求恩1938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期间，以火一样的革命热情在前线抢救受伤的战士。在冀中战场的4个月中，他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实施大手术315次，行程1500余华里，出色地进行战地救护工作。为了抢救八路军战士的生命，白求恩从不顾及个人的安危。1939年4月，在河间、齐会战斗中，手术室设在离火线7华里的温家屯的一座小庙内，白求恩不顾日军炸弹的威胁，全神贯注，连续69小时，为115名伤员施行了手术。白求恩不仅用他卓越的医疗技术抢救了许多八路军伤员的生命，而且还用他的热血挽救垂危的普通战士。一次，一名伤员做断离手术，急需输血。白求恩毫不迟疑地伸出胳膊要求输他自己的血。他重视实践，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出色地进行工作。当时，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残酷“扫荡”，医药器械十分缺乏。白求恩说：一个战地外科医生必须同时会做木匠、铁匠、缝纫匠的工作，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他千方百计地改善各种设备的器械。为了给伤员作热敷，他用毛巾包着开水煮过的砖头代替暖水袋。有些重伤员起身困难，需要别人帮助，但医务人员少，往往照顾不过来，他想出了在屋梁上悬吊环的办法，帮助伤员起身。为了使伤员的伤口不化脓，不感染，他发明了“毕普”药剂，并制定了“消毒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59页。

十三步法”减少了伤员感染。

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抢救伤病员，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的革命精神和他对医术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当时战争环境中所迫切需要的，也是毛泽东历来提倡和推崇的。面对物质条件艰苦，医疗设备简陋，工作量大，医务人员缺少的情况，如果缺乏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革命热情和对医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将会给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毛泽东通过纪念白求恩的活动，号召大家学习他，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树立了政治思想上严要求，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典范。1940 年秋，毛泽东为医科大学第 14 期毕业学员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指明了医务干部培养的方向和成长的道路。

正是在毛泽东医药卫生思想的指导下，延安时期党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医务工作者。他们不仅医术精良，而且医德高尚，完成了百万以上伤病员的治疗任务。延安中央医院建院初期曾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郁彬回忆说：“延安中央医院办得好的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们以“救死扶伤”为己任，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主动性。工作中知难而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他们时时处处为伤病员着想，把病房当战场，病情就是命令，当遇急、重病伤员时，不讲条件，不计报酬，闻风而动，全力以赴。为了及时抢救伤病员，在医护人员中组织了义务献血队，许多同志献出自己的鲜血。据统计 1947 年延安中央医院工作人员献血 13150cc，1948 年献血 6920cc。那时的医患关系，亲密无间，如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伤病员出院时总是热泪盈眶地向医护人员谢别，医护人员把治愈伤病员看作是自己最大的欢乐。为了使伤病员不受饥寒，医院工作人员走家串户，动员老乡借给一些窑洞、被子、毯子和老羊皮，安

排伤病员住进烧着热炕或生着火炉的窑洞里；后勤人员和警卫战士爬山越岭，履冰踏雪，到外地采购小米和蔬菜，尽量让伤病员吃得饱一些、好一些。为解决医院药品和医疗器具的不足，医务人员自己动手，上山采集草药，自己制做医疗器具。如摘除扁桃体的手术刀是请当地铁匠打出来的，经过医护人员精心细磨就可以使用；手术室没有电灯，就使用汽灯；为做好医疗用品的消毒，自己用泥土垒灶，用锅蒸煮；量体温、试脉搏，没有计时钟表，就以自制“砂滤表”代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伤病员数量很大，护理工作的任务相当繁重。伤病员的整个生活，都必须护士来照顾。护士们夜以继日地周转在呻吟的环境中，提心吊胆地看护着病员，她们不停留的忙奔着，没有星期日，没有假期。毛泽东理解护理工作的重要和艰苦，对护理工作非常重视，十分关心护士的培养和训练。1941 年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护士代表大会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①。1942 年毛泽东又题词：“尊重护士、爱护护士”，赠于第二次护士代表大会。② 在毛泽东的关怀与鼓励下，广大护理人员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计名利。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许多八路军战士重上战场。与其他革命战士一样，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精益求精，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是指导革命的卫生战线的主旨。它为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的医务人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体育卫生工作的思想在延安时期得到

---

① 《延安中央医院、第一后方医院纪事》第 19 页。
② 《延安中央医院、第一后方医院纪事》第 26 页。

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思想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体育卫生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为新中国的体育卫生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和一定的物质基础。

# 第七章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什么是宣传工作？毛泽东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工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① 宣传工作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和方式，向人们说明、解释、阐述理论主张、事实以制造舆论，扩大影响，并使其相信跟着行动的一种实践活动。宣传工作的主要方式有：谈话、演讲、对话、作报告、讲课等口头形式；报纸、刊物、书籍、画册、广告、壁报、黑板报、信件、电报、传单、口号等书面形式；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小说、诗歌等文艺形式。可以利用广播、电视、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或训练班、讲习班等多种途径来进行宣传。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政治领域的宣传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思想政治宣传具有鲜明的真实性、严谨的科学性和坚定的革命性，它是团结人民，组织人民，鼓舞与教育人民，揭露与打击敌人，实现革命的既定目标，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锐利武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8页。

毛泽东的宣传工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关于思想理论宣传工作方面问题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实践的产物，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宣传工作思想萌芽于党的创立时期，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宣传工作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的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13年丰富实践，使宣传工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 一　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基本思想

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就宣传工作发表过大量的著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他的远见卓识，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论断，对于团结人民，瓦解打击敌人，发挥了强大的精神威力，有力地指导各条战线的斗争，加速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毛泽东关于宣传工作的基本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宣传工作是党的第一个重大的工作，是一件绝大的事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宣传工作是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47页。

志是这支必不可少的文化军队中的光荣战士和指导员。宣传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其重要性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①

党的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智慧、创造、呼声、愿望、利益、要求。其作用是，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以达到动员、团结、组织群众为实现党和人民近期和长远目标而奋斗。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说：《中国工人》的出版，其任务就是为了使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② 毛泽东在这里不仅仅是指《中国工人》这一刊物的任务，实质上也概括了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就是党的宣传工作应该服务于和服从于党在一定历史阶段所确立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它担负着团结和动员人民，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同心同德，为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宣传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中心任务，无条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力求使这种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尤其是符合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思想。掌握这一思想，是做好宣传工作，取得显著宣传成效的关键。这也是宣传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在1942年9月给陈毅的电报中提出：在宣传方面，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③同年10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27页。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6页。

月，毛泽东给林枫的电报中也指出："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①]在1942年10月28日致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中，毛泽东批评了新华社太行分社、山东、苏北、晋西北等分社在宣传工作中发生的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1948年2月11日还批评了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右"倾错误，要求对宣传工作进行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二）党的宣传工作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

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②] 他希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③]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要不要宣传共产主义，要不要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做过肯定的回答："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④]"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⑤]他主张，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但是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要求宣传人员，服从党的领导，遵守纪律，"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⑥]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45年8月，他针对解放区的一些报纸，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对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所起的作用作了夸大的宣传一事，对党内进行教育，提出了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应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地注意

---

① 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8、97页。
②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6、839页。
③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686页。

扫除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问题。要求党的各级宣传人员要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

宣传工作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毛泽东和党中央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包括担负宣传任务的党员，不经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各地不应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在宣传工作上，也必须严格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

**（三）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讲真话**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精髓，也是毛泽东宣传工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精髓。毛泽东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讲也是这样。"① 宣传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出了，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要求。不偷，就是要诚实，不抄袭别人的东西；不装，就是不要装懂，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不吹，就是报实数，要真实，不要扯谎。②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全党同志的要求，对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来说就更为重要。尊重事实，讲真话，强调宣传内容的真实性，是宣传工作的生命，也是宣传工作能否取得好的效果的关键。通过宣传，群众知道了真理，才会拥护党的主张，才会跟着党走。

**（四）宣传工作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

毛泽东要求党的宣传工作要面向群众，反映群众，善于用群众的典范事例教育群众，使宣传适合群众的要求，不脱离群众。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4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5页。

宣传工作要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这段话透彻地说明了，宣传工作渗透于群众路线之中，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中介，发挥着必不可少的桥梁作用。宣传工作和群众路线是密切不可分的。宣传工作要依靠群众来办。毛泽东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② 宣传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做好。1942 年 3 月，毛泽东指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③ 毛泽东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对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办好党报的高度重视。

### （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优良作风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9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28 页。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94 页。

宣传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说："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① 毛泽东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做了许多调查研究的。他自己也是做过长期的大量的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号召做宣传工作的同志，要以列宁为榜样，要象列宁那样做调查研究、写文章做宣传。他认为做好宣传工作，应当"知已知彼"。就是说，要了解掌握敌友我三方面的宣传情况。一方面要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党的领袖人物的言论，党的文献；另一方面要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历史，熟悉其文献、政策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其言论；再一方面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收集其各种具体材料，"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他们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② 宣传工作担负着动员群众，教育群众，指导群众的作用，"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指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又说："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③

**（六）区别不同情况，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也是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延安时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

---

①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37、802、836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5页。

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④，做到有的放失。应当区别不同情况，不同宣传对象，并且要依据形势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确定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例如，将国际宣传与国内宣传加以区别，将党内宣传与党外宣传加以区别，将对人民的宣传与对敌宣传加以区别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区别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宣传工作的要求。国际国内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毛泽东要求宣传工作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情况变了，宣传的内容、口号、宣传的方式，宣传的策略都要做及时地适当地调整，以取得最佳的宣传效果。

**（七）要以很大的精力抓紧通讯社、报纸的工作**

毛泽东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领导者的很多工作要“通过报纸去做”。① 他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领导同志要加强对当地通讯社、报纸工作的领导，加强对宣传工作和宣传工作人员的指导，改变不注意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要求各地党委重视报纸的作用，应该把报纸“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② 把办好报纸当作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式。

**（八）宣传工作应当具有生动活泼、尖锐泼辣、旗帜鲜明，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人民群众不喜欢枯燥无味的宣传。毛泽东主张：“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③ “把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97 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1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28 页。

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①

**（九）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建设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而又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宣传队伍**

毛泽东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他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③ 毛泽东认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德才兼备的干部，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这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新干部当然也包括宣传干部在内。毛泽东希望这些干部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为培养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宣传工作队伍指明了方向。

**（十）宣传工作中的民主作风**

毛泽东在《1945年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④ 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为了搞好宣传工作，在党的报刊上应当允许批评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1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8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14册，1992年3月第1版，第424页。

与自我批评，这是对人民负责，对革命负责的表现。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①

上述这十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宣传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有机整体。这些思想具体地体现在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对党内的宣传、对友党友军的宣传、国际宣传和对敌伪宣传的丰富实践活动中。

## 二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

毛泽东在延安讲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这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至理名言。毛泽东高度重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

### （一）向人民做宣传的极端重要性

向人民做宣传，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党领导的伟大革命斗争，这是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把向人民做宣传动员工作，看作"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③ 他认为，动员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有了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向人民做宣传"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④解放战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31页。
③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81．480页。

争初期，毛泽东写文章，做报告不断地向人民群众指出，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我们是能够战胜它们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人民，蒋介石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毛泽东富于说服力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胜利信心。毛泽东说："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① 对人民的有力宣传，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推动了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

**（二）对人民进行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经常地向人民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使人民看清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毛泽东特别重视向人民群众进行国内外形势的宣传教育，在他发表的浩如烟海的大量著述中，有许多演说、报告、论文都是首先从分析时局讲起的。例如1935年12月他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就有这样的讲法："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② 接着他全面地论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并告诉全党同志，当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党的政策和策略，工作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的许多报告，其标题就很鲜明醒目地谈到形势问题。如1945年8月13日作的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7年12月25日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向人民群众宣传时局，目的在于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13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卷，第2版，第142页。

现实，科学地预见和把握未来，使人民认识世界的前途与中国的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属于国内外反动派的。认识“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坚定抗战必胜、人民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心。

第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对人民进行广泛的宣传。

1935 年 10 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1937 年 9 月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时党的中心任务，则转变为坚持全民抗战，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党的宣传工作从内容到形式就要围绕中心任务的变化作适当的调整。全民抗战爆发后，宣传工作的进行，首先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白为什么抗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① 使人民群众明白抗战的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从而使亿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抗日战争。宣传工作，单单说明抗战的目的还不够，还要向人民说明争取抗战胜利的步骤和政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就精辟透彻地向人民说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指明了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途径和步骤，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向人民介绍国际国内时局，把握住时局的基本特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工作，这两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在抗战初期通过宣传教育，振奋民族精神，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中间由于敌强我弱及大片国土的沦陷而产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481 页。

的悲观情绪，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解放战争初期，宣传工作则要鼓舞全国人民增强战胜美蒋反动派的必胜信心。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9月27日致陆定一的信中所说："文章的写法宜改变"，"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① 1947年3月，党中央撤离延安，毛泽东高瞻远瞩，他以必胜的信心向延安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做宣传，他当时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还是要回到人民手中的。历史的进程被毛泽东预见得惊人准确，一年零三天，延安奇迹般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第三，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与政策。

党的路线和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也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把党的路线政策向人民作宣传并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是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指出："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强调宣传党的团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81页。

结抗战政策，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宣传三三制，减租减息，精兵简政、整风、生产、对敌斗争、统一领导，拥政受民等各项政策，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做出了贡献。抗战后期，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宣传七大的路线："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①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主张说明了，向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并且完全地坚决地执行，去争取革命的胜利，这是党的各级干部应当学会的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第四，宣传解放区的巨大进步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限制、污蔑攻击的政策，为了驳斥反共顽固势力对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攻击污蔑，有必要经常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解放区的进步，宣传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胜利。毛泽东在他写的文章或作的报告中盛赞解放区是"民主中国的模型。"②"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45页。

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① 解放区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可能做到的。毛泽东在答记者问或写的文章中赞扬八路军虽然在数量上比国民党军少得多，装备差得多，但质量却很高。按其所抗击的日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来说，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来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1945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取得冀南（邯郸至磁县地区）自卫作战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提出要扩大这一胜利的宣传。“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已俘缴三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② 要求各地开庆祝大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挑动内战的阴谋，动员参军参战，粉碎蒋军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要求将有关的消息、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毛泽东亲自对新华社将要发表的消息《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做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

第五、宣传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

宣传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宏扬爱国主义精神。1938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中说：“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琪、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青、潘占魁诸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1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1991 年 9 月版，第 419 页。

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① 号召人民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宣传重大战例和抗日英雄群体，例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等。1944 年 10 月 1 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这篇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介绍了“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② 的辉煌战绩和胜利出击的意义，批驳了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污蔑。

宣传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慷慨捐输的模范事例。宣传爱国侨胞积极参加与支援祖国抗战的典型事迹。爱国华侨陈嘉庚按月捐款支援抗战，直到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1940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8 日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称赞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毛泽东善于发现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先进模范事迹，号召人民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例如在解放区开展的向劳动模范赵占魁（工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农业劳动英雄）、黄立德（机关学校种菜英雄）学习的运动。1944 年五一节毛泽东亲切接见被援予特等劳动英雄的赵占魁、钱志道、李强、沈鸿、陈振夏等并为他们亲笔题词。毛泽东还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91 年 3 月版，第 851 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31 页。

表过重要讲话。鼓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们不要自满，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对延安县人民、山西沁源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4 年 1 月 17 日，他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同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这些宣传活动，鼓舞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巩固解放区，壮大人民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揭露反共顽固派、亲日派发动反共高潮、残酷杀害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教育人民，孤立顽固势力。

以皖南事变为例，当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① 毛泽东为皖南事变一事发表谈话，对亲日派破坏抗战，袭击新四军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表示了极大愤慨。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②提出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等十二条国民党当局应做的事，警告玩火的亲日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停止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1991 年 6 月版，第 1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74 页。

挑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打退了反共高潮，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和赞助。将反共亲日派破坏抗战，袭击八路军新四军的罪行向全国人民作广泛深入的宣传，更加孤立了顽固势力，使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

第七，揭露敌人的暴行，激发对敌仇恨，增强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的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抗日战争中，对敌人罪行的揭露和宣传十分重要。毛泽东提出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蛮掠夺和灭亡中国的罪行。他说：日本侵略者“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指出：“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他提出了要研究沦陷区，“了解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么干”② 的任务，在延安建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并编辑出版了《时事问题丛书》第一集《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书。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对美蒋反动派罪行的揭露。他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55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4～45页。

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①

毛泽东主张在宣传工作中，充分地揭露中外一切反动派的累累罪行，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加速革命胜利的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对人民进行宣传的途径和方法**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谈到抗日的政治动员时说：“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指出国统区的宣传“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又说：“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② 毛泽东的这段话精辟地指明了向人民做宣传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法。这就是说，宣传工作必须适合民众的口味，宣传工作者要深入到民众中去，向民众学习和民众交朋友，在神气上不能和民众隔膜。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单纯背诵，照本宣科，必须联系实际，即联系革命战争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使宣传内容有血有肉，力戒空泛议论。宣传工作不能一阵风，要经常化。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236、123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481 页。

宣传的形式要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毛泽东列举的那些形式，都是很好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当然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采取哪种方式，则要依据需要和可能，从实际出发。

在宣传时机上，毛泽东和党中央曾提出过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来开展宣传工作的指示。例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三八妇女节、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和“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等。在纪念这些节日或重大纪念日期间，展开广泛的宣传，可以采取召开纪念大会、报告会、座谈会；发表社论、纪念文章、宣传口号、传单；出版书刊、画报、黑板报、墙报；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进行。

向人民做宣传，不单是宣传工作人员的责任，各级领导干部也要亲自抓，亲自动手。1943 年 5 月 31 日，为纪念抗战六周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写文章，具体指定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 15 位领导人在 20 天内，写出 5000 字的文章来。从此事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

## 三　党内宣传

毛泽东关于党内宣传的思想，除包括前述对人民宣传的那些基本内容外，还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

### （一）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宣传教育

毛泽东提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员要大力宣传唯物辩证法，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员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二）对党员进行革命理想的宣传教育**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① 他强调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必须使党员明白，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②

对党员进行革命理想的宣传教育，还要引导党员以正确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③

对党员进行革命理想的宣传，还要使党员懂得革命就是为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60—1061、第1079页。

解放生产力，认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 （三）对党员进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宣传教育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要求其党员必须高度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此，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廉洁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实事求是的模范；学习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要以白求恩为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人民极端热忱。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学习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学习吴玉章，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他认为，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人民，我们就能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四）对党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

使党员懂得并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员认识只有全部地而不是残缺不全地、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达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五）对党员进行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宣传教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一致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统一战线中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人民的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① 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坚持无产阶级对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对顽固势力的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国民党蒋介石的两面政策。对反共顽固势力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好应付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

**（六）进行增强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宣传教育**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讲过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的县城都丢掉。他说：“我们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82页。

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①。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还讲过，北伐战争时期，我们有6万党员，后来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有30万党员，后来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120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② 我们一定要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他鼓励全党同志：“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③ 毛泽东这些字字铿锵，充满信心，饱含战斗激情的论断，深深地打动着每个党员的心，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原估计大约用5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任务，只要3年就办到了，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 四　对友党友军的宣传

这里讲的友党友军，主要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从建立到最后破裂期间的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对友党友军的宣传随着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大体包括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260页。

下几个方面。

### （一）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的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计宿怨，首先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希望国民党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从 1936 年 1 月 1 日起，毛泽东为了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使其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反动政策，亲自写信给国民党军政要员，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先后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宋子文、王以哲、邵力子、朱绍良、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深刻阐明：九一八事变后，大好河山，危险万状。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毛泽东批评国民党当权者，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他建议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红军，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共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中，希望他，清夜扪心，能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提醒他，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为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再次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 （二）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宣传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宣传工作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某些进步变化持肯定态度，并给予必要的赞扬；对其妥协动摇的倾向，对其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老政策和实行片面抗战的路线给予必要的批评。

1937 年 8 月 25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提纲和同年 9 月 29 日写的《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几个方面的进步变化。这些进步变化主要有：蒋介石由对日不抵抗政策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关于抗日的谈话；蒋介石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9 月 22 日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所有的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为此赞扬说："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① 毛泽东在 1937 年 12 月 24 日指示："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场与赞勉。"②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表示赞助其实现，对纲领的缺点与不足之处，给以充实与发展，对其错误之处，给以适当批评。③提出，应把它"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53、481 页。

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91 年 3 月版，第 409、50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353 页。

在宣传中，毛泽东同时也指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关系，还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国共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在对日作战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加战斗。军事上的单纯防御，打被动的仗，是国民党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

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前提下，对友党友军的进步表现给以赞勉，对其缺点错误给予真诚的善意的批评，以达到坚持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是完全必要的。

**（三）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对友党友军中的反共顽固势力、亲日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自卫，在思想政治上发动必要的宣传攻势，驳斥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和污蔑，声讨他们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使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巩固，抗战得以坚持。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汪精卫叛国降日，蒋介石实行溶共、限共、防共的政策，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其反共气焰日趋嚣张。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多篇宣言和文章，批判汪精卫，揭露反共顽固派。这些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在日本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场，作卖国掮客。国内投降妥协分子，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散布谣言，煽惑人心，作日寇诱降灭华之内应，气焰嚣张，蠢蠢欲动。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力量与团体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视为仇敌，排击

不休。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更是造谣污蔑，攻击陷害，视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磨擦，挑拨内哄，以造成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毛泽东提出联合一切爱国进步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动员民众，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孤立反共顽固派。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真正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合法地位。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的分子，如沈鸿烈之流。

**（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在全民抗战中，要始终向友党友军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和主张，强调实行这些政策对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具有极端重要性。

向友党友军宣传，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守和执行《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申明的四项保证，表示不仅要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而且在抗战胜利后要合作建国。向他们宣布，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的决定。对友军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一律采取友好态度，对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摩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

**（五）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卖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卖国三位一体的方针，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面加紧向解放区进攻，一面施放和平烟雾，三次打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说："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

制造厂。”① 国民党认为毛泽东不会来，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宣传攻势。1945 年 8 月 16 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写了消息《毛泽东主席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电蒋介石》。8 月 24 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②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亲赴重庆，使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

为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宋庆龄、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等著名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还要接触右派才行。因此，除会见蒋介石及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等人外，还会见了孙科、戴季陶、陈立夫、何应钦、白崇禧、邹鲁、吴稚晖、吴铁城、叶楚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毛泽东向他们表示：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只有和，才能求得双方的一致。和是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是我们今后的方针，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③ 重庆谈判击破了国民党攻击污蔑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国民党和蒋介石陷于被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2 版，第 1160 页。

②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 年 11 月版、第 37 页。

③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 年 11 月版，第 114、128、130、45 页。

如果发动内战，势必失掉民心，导致彻底失败的局面。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民党继续进攻解放区。1945 年 10 月，人民解放军取得冀南自卫战的重大胜利。国民党第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军发动一次政治宣传攻势，开展高树勋运动，希望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站到人民方面来。“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具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①

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的宣传，主要是围绕贯彻党的七大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展开的。这一宣传对延缓全面内战的爆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团结全国人民，争取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反对内战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对友党友军开展宣传工作的策略思想**

第一，动员一切力量，采取多种方式。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做争取友党友军的工作。可以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等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做宣传。可以选派得力代表到友军处进行交友工作。也可以委托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友党友军宣传，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分裂内战之危害，使其不参加反共活动。用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册，1991 年 9 月版，第 421 页。

军队；一切中国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去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可以把这些口号写在我军驻地周围，友军经过的一切地带，以扩大影响，增强宣传效果。

第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毛泽东主张，要利用国民党宣布的纲领、蒋介石的讲话或发布的命令“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①

利用国民党自己公布的纲领、命令、出版物，发挥其一切正确的东西，去批判、驳斥其错误的东西。这些纲领主要是指《总理遗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抗日战争中怎样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提出：“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 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 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② 毛泽东揭露反共顽固派自封为“三民主义信徒”，其实，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5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752 页。

非的假三民主义。反共顽固派污蔑边区为“奸区”应该取消，毛泽东则反驳说：“边区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取消的理由何在？[①] 1939 年 3 月，蒋介石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毛泽东则质问国民党，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用你们的背对着日本人，这是什么至上呢！1945 年元旦，蒋介石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1945 年 1 月 4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则列举蒋介石前后至少七次开出某年某月某日召开国民大会的空头支票，以蒋介石三番五次空言骗人的事实，揭露蒋介石，很有说服力。毛泽东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宣传策略思想，痛击了反共顽固派的要害，使其进退维谷，无法辩驳。宣传的政治效果，产生的威力是很大的。

第三，抓住有利时机，进行猛烈的宣传战。

抓住有利时机，对反共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进行宣传反击战，这是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又联合又斗争”策略方针在宣传工作上的具体运用。

这种有一定声势的宣传反击战曾进行过多次。以 1943 年七、八月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宣传反击战最为典型。

1943 年 3 月，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591 页。

根据地是“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5 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宣传攻势。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胡宗南调动近三个集团军，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人民在做好军事反击准备的同时，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反击战。中央书记处通知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① 毛泽东指出：“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②

1943 年 7 月 9 日，延安各界群众 3 万余人举行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朱德总司令在 7 月 4 日和 6 日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毛泽东 7 月 12 日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反击下，7 月 11 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12 日以后，胡宗南所部原准备进攻延安的一部分军队开始撤走。至此，宣传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的军事进犯被制止。接着《解放日报》又陆续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论时局》、《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章。1943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

---

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册，1992 年 3 月版，第 71、73 页。

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这些文章，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揭露了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亲日派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种种罪恶言行，沉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在宣传反击战中毛泽东指示将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民众大会通电、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① 在毛泽东卓越指挥下，宣传反击战出其不意干净利落地取得了胜利。使蒋介石的阴谋迅速破产。到10月5日以后，对国民党的宣传反击战暂告结束。毛泽东决定：“《解放日报》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②宣传反击战取得胜利后，实行暂时缓和的策略，对于巩固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③

## 五　对外宣传

### （一）加强与扩大对外宣传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外宣传。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不但是中国

---

① 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5、10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92年3月版，第88页。

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侵略反法西斯斗争是相联系的。因此，加强与扩大中国的对外宣传是非常重要的。

开展对外宣传，是组织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仅需要建立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需要联合全世界人民，建立国际反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1938 年 2 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①

毛泽东认为，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伟大的，这种伟大的力量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最后把它打倒。②因此，开展国际宣传，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进行反法西斯侵略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应当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是可以而且可能"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③。

开展对外宣传，是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的需要。毛泽东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④中国的抗战要自力更生为主，但也要积极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对外宣传，呼吁世界

---

①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 1991 年 3 月版，第 847—84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06 页。

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205 页。

各国人民，尽可能的给中国以军火物质、资财、医药、技术人员及其他一切帮助。据1943年8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提供的材料，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8月，苏联对中国援助3亿美元，美国7亿多美元，英国1亿英磅的各种借款。①

通过对外宣传，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切措施制裁日本。日本侵略者疯狂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肆意掠夺我国财富，血腥残害我国同胞，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是世界自有文明以来罕见的最野蛮的兽行。日本侵略者用其暴行证明了他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也是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公敌。通过对外宣传，痛斥揭露日本法西斯惨无人道的累累罪行，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措施制裁日本法西斯。要求各国政府停止对日输出军火、物质、资财，使日本侵略者得不到军火和军事原料的供给。

通过对外宣传，扩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影响，声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毛泽东说："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② 因此，我们有责任使外国人了解解放区，了解八路军、新四军。通过对外宣传，扩大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广泛影响。中国人民的斗争是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在对外宣传中，将声援赞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1941年6月，当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之后，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要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斗争来援助苏联。在苏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92年3月版，第5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54页。

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时，毛泽东发表文章，歌颂苏联红军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这一战役的胜利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也将直接影响到远东。

### （二）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

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步性，指出这一战争是革命的进步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以及合众社记者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的主要经验与教训。向国际友人说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不可能亡国，战争的前途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表达了中国人民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向来访的国际友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基本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1938 年 7 月，毛泽东在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时指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谈到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人民在抗日原则下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边区军队，官兵关系和与人民的关系有一种民主的精神，官兵、军民打成一片，边区教育是抗日的民主的。边区经济以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边区的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使全国人民懂得，这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谈到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1944 年 6 月，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谈到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

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在抗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重大贡献。冲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封锁和欺骗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对争取国际声援和帮助，打败日本侵略者，尤为重要。1943 年 8 月《解放日报》公布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1944 年 6 月和 8 月，毛泽东、叶剑英等向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指出：7 年来，近 50 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 8000 万解放区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抗击了敌伪全部兵力的$\frac{5}{6}$；几乎一切中国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而国民党，实际则从 1938 年 10 月以后，整整 5 年半时间，他们采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总共不过抗击了$\frac{1}{6}$的敌人而已。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

在对外宣传中，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也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提出，要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侵略者。

在对外宣传中，针对英美等国不同时期的对华政策，发表评论，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和政治主张。1941 年 4 月，美国

提出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毛泽东对此表态说："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① 1941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一文，批评了美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军事方面对国民党的援助迅速增加，在政治上成为与中国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对此，中国共产党为联合美国共同抗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提出了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恩来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将与他们国家并肩作战。1942 年 6 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向周恩来表示希望中共在侦察敌情方面给美国提供便利。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1944 年 7 月美军司令部观察组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包瑞德、谢伟思等观察组成员来访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解放区的情况，表示了要与美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态度。但是美国最高当局在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又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赫尔利公开声明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反动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从 6 月 25 日起，《解放日报》发表了多篇揭露、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的社论和文章。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表示，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伟大斗争，是世界上任何反动力量所阻遏不住的。1946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提付国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04 页。

审议。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是中国内战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① 毛泽东戳穿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最终孤立了自己，必将彻底失败。

在对外宣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赞扬国际友人援华的动人事迹。毛泽东赞扬了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赞扬印度友人柯棣华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

毛泽东在与来访的外国友人交谈中，还向他们宣传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光明前途。毛泽东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告诉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原子弹也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1947 年 3 月，胡宗南的军队就要占领延安了，美国记者罗德里克问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前途确实暗谈，将来会怎么样？毛泽东淡然一笑，充满信心地回答：罗德里克，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京来看我。毛泽东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历史的发展，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英明预见是多么正确。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6 册，1992 年，10 月版，第 209 页。

### （三）对外宣传的多种渠道

邀请和欢迎外国记者、作家访问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是对外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会见过许多著名的外国记者和作家。1936 年 7 月到 10 月，埃德加·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访问 92 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了他，并进行了长谈。斯诺将了解到的中共对内对外政策，写成数十篇文章，向国外作了大量宣传报道。斯诺记载苏区之行的专著《红星照耀中国》在国际上十分畅销，影响很大。他的书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罗斯福总统也读了这部书。继斯诺之后，1937 年到 1938 年，中国共产党又热情接待了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 10 多位外国人士来解放区访问，形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热潮。他们撰写了大量文章、著作，向国际上做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情况的报道。1944 年 6 月 9 日，由驻重庆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 21 人，在团长谢保樵、副团长邓友德率领下到达延安，在延安等地访问了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对来到延安感到兴奋。尽管蒋介石派人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并派一批人同来监视这些记者，进行破坏工作，但是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记者所进行的工作，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有利于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封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

接待来访的美国军人，也是让外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一个渠道。1937 年至 1938 年，在美国总统身边任职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解放区的美国军人。毛泽东同他作过两次长谈。卡尔逊将了解的情况写信报告了白宫。他

告诉美国总统，中共控制的地区没有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失败主义和腐败现象。共产党人渴望与美国合作打败日本。罗斯福总统对这些信极感兴趣。卡尔逊回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和著作，介绍他在中国的见闻。1940 年他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出版。他的著述引起了美国决策人物的重视。1944 年 7 月，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欢迎他们来解放区访问，并表示在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条件下，欢迎美国给予援助。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 4 个月中，见过数十次面，进行过多次谈话。美军观察组发回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① 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接见过跳伞获救的美国飞行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1945 年 9 月，毛泽东在重庆曾亲切地会见过三位美国第 14 航空队的士兵，并同他们亲切交谈，一起照像，共进晚餐。三位美国士兵问：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泽东说，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通过会见美国军人和外国友人，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为扩大对外宣传，毛泽东还提出了"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② 的主张。毛泽东要求

---

①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59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1991 年 3 月版，第 617 页。

“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① 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提出：“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对敌军民宣传，我们欢迎盟国合作并交换经验。”② 这个指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愿同盟国进行宣传合作的问题，并强调在合作中，要有正确的立场，一方面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

发挥新华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社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是尤为重要的。1941年8月由新华社主办《中国报道》的外文宣传刊物。该刊最初分别用英、俄、德、法文撰写，从第5期开始改为英文刊物。每月一期，油印后寄香港保卫中华大同盟办事处对外转发，或通过在重庆的外国记者转发到国外。这是抗战时期对外宣传的一条渠道。抗战后期，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新华社建立了英文广播部，负责播发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1944年9月1日，新华社正式开始英文文字广播。在延安出版发行的《解放日报》也经常刊登有关国际问题的社论或重要文章。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2月8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③ 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

---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3月版，第6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1991年3月版，第316页。
③ 《周恩来年谱》第403页。

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行销世界各大城市，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面目。

## 六　对敌宣传

这里叙述的主要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对日军、伪军开展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实践活动。

加强对敌军的宣传，这是决定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指出：对敌宣传是“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使其弃暗投明的重要方法，这也是缩短战争时间，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付日本侵略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给以歼灭的打击”，“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①] 对敌宣传，就担负着从精神上瓦解敌军，促进抗战迅速胜利的重要作用。

### （一）对日军宣传的主要内容

激发日军士兵厌战怠战思乡思家情绪和悲观情绪，动摇其军心，懈怠其意志，削弱其战斗力。在散发给日军的各种宣传品中，要提出一些足以刺激打动日军官兵情绪的口号、言论。例如：到中国打仗，离开家乡父母妻子，战死在中国的沙场上，尸首无人收殓，多么悲惨啊！你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啼饥叫寒，时刻都在盼望你们回去；在中国战场上打仗，你们得不到一点好处，只有白白地牺牲你们年轻的生命；你们生在日本，死在中国，多么不幸啊！

---

①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465、503页。

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②而是实行对"被俘的日本的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意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①

向日本官兵宣传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必胜。用日本与中、美、英等国人口、资源、武器的统计表，用搜集到的对敌不利的消息，用特刊、小册子多种形式说明日本必败的理由。对日军进行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向他们揭示日军必败、中国人民、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必胜的前途。

**（二）对伪军宣传的主要内容**

对伪军的宣传，目的在于努力争取他们，使之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抗日事业，孤立日本侵略者，打破其以华治华的阴谋，使日本在华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

向伪军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反对替日本当炮灰；暴动反正摧毁据点，杀死日本鬼子到抗日军队中去；不替日本作战，不替日本镇压中国人民，等等。

向伪军宣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伪军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予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予以坚决的打击。"② 这自然包括当了伪军的中国人。毛泽东规定了对伪军的政策"除为群众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381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6页。

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①

对伪军进行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宣传教育，使其认清形势，选择有利时机，迅速发动反正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

**（三）对敌伪宣传的策略和方法**

首先要加强对敌伪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设立敌军工作部，在地方党委中设立敌伪军工作委员会，要求选派得力干部担负此种工作。在接近敌伪地区，设立敌伪工作站。

为了开展好对日军的宣传，毛泽东要求组织抗战军民学日语，对日宣传品的文字是真正的日本文。他说：“所有的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的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②

毛泽东强调对日军俘虏要多加宣传优待。他说：“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③ 对负伤或患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6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3月版，第61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1991年6月版，第26页。

的日本士兵给以特别注意和治疗。对愿在中国工作的给予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安排其进适当学校进行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俘虏政策感召下，日军被俘士兵杉木一夫、香川孝志、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等许多人宣誓参加了八路军，并组织了反战组织，和中国人民一起，投入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斗争。1941 年 11 月，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森健、中小路静南等六名反战人士当选为各级议员。多次见到毛泽东的日军俘虏杉木一夫后来说：我们就是在这种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得到了新生。

收集敌军的各种文件，精细地研究敌人和敌人的宣传，以对付敌军。毛泽东认为，日本宣传战的基本方针，是分裂中国的团结，“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①] 使中国从联共抗日而为反共降日。其宣传战的主要内容是所谓“共同防共”“中日亲善”“建立东亚新秩序”。其宣传方式、方法为：虚妄夸大、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软硬兼施、利用汉奸、诲淫诲盗、利用中国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等。并动员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及庞大的宣传工具与宣传机关，肆意散布其反动谬论。因此，我们要广泛而深刻地展开反敌伪的宣传战。在对敌宣传中，要善于利用日本消息本身的前后矛盾，以揭破敌方消息之欺骗性和证实我方宣传之真实性。善于抓住反“扫荡”的时机，遍写标语与广发传单。

从伪军的特点考虑，对待伪军有必要实行“德威兼施”的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人民军队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都是不利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2 版，第 455 页。

## 七　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毛泽东极为重视发挥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和出版社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1937 年 1 月，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改为《新中华报》，博古任报社与通讯社的社长。毛泽东极为重视和关心新华通讯社的工作，几乎两三天就要到新华社来一次，细心地询问有什么重要消息，并对通讯社的同志畅谈他对时局的看法，给新华社以政治方针的指导。《新中华报》于 1939 年 2 月 7 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为 3 日刊），到 1941 年 5 月 15 日停刊，共出了 230 期。《解放》周刊，1937 年 4 月 24 日在延安创刊。由张闻天总负责，博古等七人为编委，1941 年 6 月 15 日停刊，共出了 130 期。上述报刊，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抗战、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 年 3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改为《解放日报》。5 月 16 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博古担任社长。该报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到 1947 年 3 月 27 日停刊，共出 2130 期。《解放日报》自始至终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鼓励。他亲自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题写了《敌情》等专栏的刊头。毛泽东要求："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① 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中国共产党的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54 页、第 56—57 页。

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仁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之诚，以告国人。”① 这篇发刊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使命，也确定了办好《解放日报》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不仅从宣传方针和政策思想上指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工作，而且亲自为新华社《解放日报》撰写了许多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稿等。这些文章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深刻的指导性、强烈的感染力，是党的宣传工作的珍贵文献，是值得宣传工作者学习借鉴的典范。毛泽东写的著名社论主要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1941 年 5 月 18 日）、《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 年 9 月 7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 年 10 月 12 日）、《历史教训》（1942 年 10 月 14 日）、《评柏林声明》（1942 年 10 月 16 日）、《质问国民党》（1943 年 7 月 12 日）、《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 年 10 月 5 日）、《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 年 4 月 27 日）等。写的主要评论有：《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944 年 10 月 11 日）、《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1945 年 3 月 8 日）、《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 年 7 月 10 日）、《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 年 7 月 12 日）、《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945 年 8 月 13 日）、《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 年 8 月 16）等。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写了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54 页、第 56—57 页。

许多篇新闻稿，并亲自为别人撰写的社论、新闻稿作了缜密的修改，使之更臻完善。例如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就是由毛泽东修改并作重要补充的。毛泽东增写了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军事失利的重要原因，他写道："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呵，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① 这段话写得生动、尖锐、辛辣、活灵活现地勾画了国民党消极抗战的丑态。使文章的战斗性说服力明显地增强了。

毛泽东不仅亲自为《解放日报》撰稿和修改文稿，还为该报做征稿工作。他指定一些同志负责征稿，对应征件字数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彭真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范文澜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邓发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蔡畅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等等。毛泽东要求"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②

对《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批转各地报刊转载或印发，以充分发挥党报的重要作用。如1943年10月5日，他代中央宣传部草拟了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电："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06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1—102页。

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①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发表的好文章，给予鼓励和赞扬。1941年8月26日，他对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高克林所写《鲁忠才长征记》一文作了指示，表扬这篇文章是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值得大家学习。毛泽东说：“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②

毛泽东对新华社、《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延安中央印刷厂的职工，在宣传工作战线上的辛勤耕耘和突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勉。1942年11月23日，《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松在延安病逝，毛泽东亲笔写了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③ 1946年4月8日，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得到博古、叶挺、王若飞、邓发等同时遇难的消息，难过得流泪，三夜没有睡。毛泽东在《向四·八遇难烈士致哀》的悼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④ 周恩来称赞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中国共产党的光辉”⑤。这是对博古等遇难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功绩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对新华社、《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是，主要靠你们。别

---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8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③ 穆欣：《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新闻界大事记要》。
④ 1978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⑤ 《周恩来选集》（上）第233页。

的方面来的东西也有一些，但是不多，主要还是靠你们。[①] 毛泽东还多次到延安中央印刷厂看望职工，1939 年 12 月他亲自参加该厂的年终总结联欢晚会，在工人们盛情欢迎下，毛泽东高兴地为大家唱了一首民歌，为晚会祝兴。

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是当时党的宣传工作迫切需要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广播宣传的发展。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无线电广播机，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克服了许多困难，因陋就简，将广播电台安装起来。1940 年 12 月 30 日，以 XNCR 为呼号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第一个人民广播电台宣告诞生。1941 年 1 月，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后来因为发射机发生故障，口语广播电台停播了两年。1945 年 9 月初，又恢复播音，每日播音两次共两小时。新华广播电台，把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向四面八方，在国内外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泽东亲自视察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7 年 3 月他还指示新华社对内对外新闻广播绝不能中断。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克服一切困难，虽然在战争的环境下经过多次转移，但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始终没有中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报纸、刊物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他为许多刊物写过发刊词和重要文章。如 1939 年 1 月 1 日创刊的《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 10 月创刊的《共产党人》，1940 年 2 月 7 日创刊的《中国文化》等刊物，都是由毛泽东撰写了创刊词。毛泽东希望这些刊物能够办得好，深受群众欢迎。

---

① 刘云莱：《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5 页。

他在《中国工人》杂志的创刊词一文中写道：《中国工人》杂志，“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28页。

# 后　记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毛泽东思想影响了几代人。在当今中国，每一个成年人检视自己的言行，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发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影子。不论时代和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看来这种影响还将长久地持续下去。要了解昨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明天的中国，都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不能不研究毛泽东思想。

本书由谢荫明主编，并拟定编写大纲，经毛泽东在延安丛书主编强晓初审定通过后，由6位同志分工撰写而成。各章执笔人分别是：导论，谢荫明；第1、2章，赵晋；第3章，王宏；第4章，钟碧惠；第5章，李陆中；第6章，谭凯；第7章，李兆荣。全书由谢荫明修改并最后定稿。

编　者

1993年6月